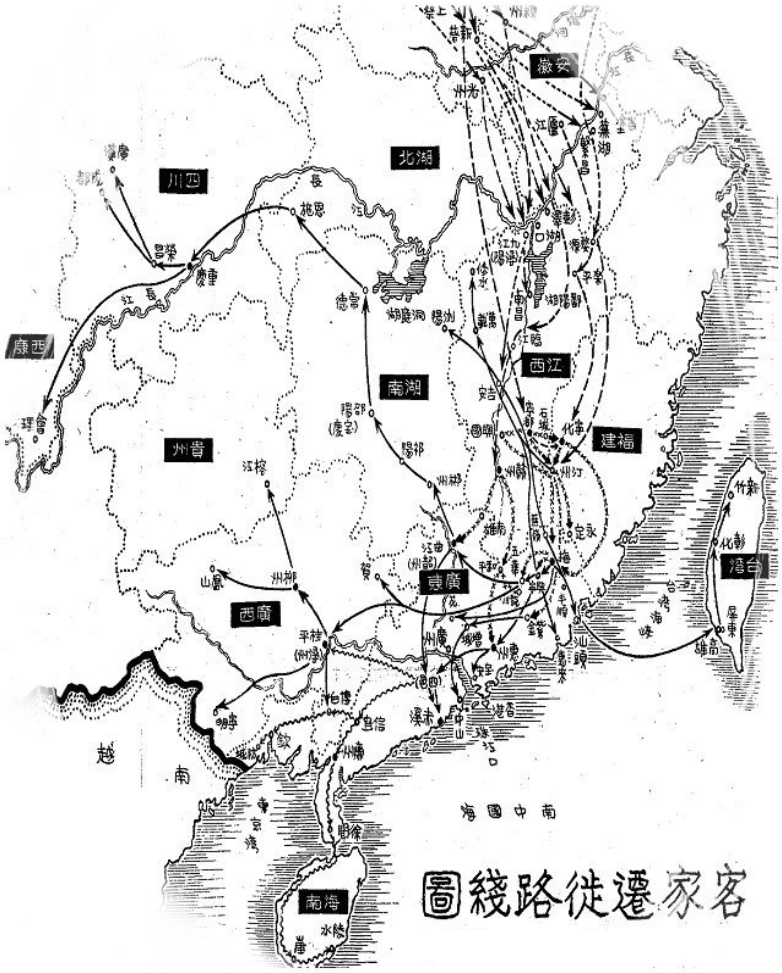
戰後臺灣的客家成分
與中原客家的形塑歷程
（1945-1987）



研究主持人：林正慧

完成年月：2011 年 11 月

本報告係接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完成

戰後臺灣的客家成分與中原客家的形塑歷程（1945-1987）

目次

一、前言

二、華南「中原客家」的形塑歷程

（一）徐旭曾〈豐湖雜誌〉以「客人」自稱
（二）19 世紀西人參與的客家溯源
（三）論證客方言為中原正音
（四）人種學影響下「客家係漢種」之論辯
（五）進化論影響下西人對客家的認識
（六）羅香林的客家再形塑

三、中原客家的形塑及其內容

（一）清治時期
（二）19 世紀中葉西人對臺灣 Hakka 的認知
（三）日治時期

四、戰後新成分客方言人群的加入

（一）半山客家
（二）外省客家
（三）本外省客家的互動

五、中原客家的論述內容及其傳布

（一）戰後初期的客家論述

（二）《苗友》（《中原》月刊）及同鄉會刊物中的「中原客家」論述
（三）同鄉會刊物之「中原客家」論述
（四）1970 年代世界客屬總會與「中原客家」論述
（五）1980 年代以來的客家專著

六、中原客家論述的影響

（一）層累堆疊的誤解
（二）中原客家文化質素的雜揉融合
（三）客家族群處境的劣勢化與客語的隱形化

七、結語

徵引書目

表次／圖次

圖 2-1 1867 年西洋文獻中 Hakka 與客家之對應

圖 2-2 客家遷徙路線圖

圖 3-1 明治 30 年認為六堆為「喀家族」

圖 3-2 臺灣人種分布圖（明治 31 年）

表 3-1 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人口普查的「種族」區分（1905-1935）

圖 3-3 臺灣言語分布圖（明治 40 年）

表 4-1 戰後初期來臺外省客家簡歷

表 4-2 戰後以來外省客家所組之同鄉會

圖 5-1 1945-1998 年客家關係書目統計圖

圖 5-2 《苗友》、《中原》封面題詞

圖 5-3 《苗友》創辦人謝樹新

圖 5-4 《苗友（中原）》雜誌客家資料統計圖

表 6-1 純客住縣與非純客住縣

戰後臺灣「中原客家」的形塑歷程（1945-1987）

林正慧*

一、前言

在戰後臺灣的研究範疇中，客家相關研究多聚焦於 1980 年代之後的客家運動，或與之相關的臺灣客家意識覺醒的課題。目前學術界其實也很清楚，在臺灣，1980 年之前的客家論述是傾向中原論述，1980 年之後對客家的論述中，才逐漸出現臺灣。[1]「新个客家人」運動在 1980 年代蔚然而興，由「還我母語」運動中取得跨越黨派的動員，領導者揭櫫「新義民精神」，以及「新的客家人」，其目標是努力塑造「臺灣客家人」的族群認同。論者認爲此後客家族群開始嘗試超越過去結構式的思維，以建構式的途徑作「後羅香林」式的自我靈魂搜尋。[2] 然而這個臺灣客家運動所要跨越的「結構式思維」，也就是中原客家的認知，究竟如何形成，其內涵又爲何，以及對臺灣目前的客家成分有無或深或淺的影響，至今仍乏深入的解析。加之，如楊長鎮也提及，客家運動現階段的對象已從「外來政權」轉爲「自稱臺灣人的 Holo 人」。這種轉向大抵有兩種傾向，一種是不再討論或至少不再重視關於「臺灣人」的認同，而以批判「Holo 沙文主義」爲首要職責。另一種則是乾脆拒絕臺灣人意識，而回歸或再強化中原客家意識，認爲本土化或臺灣認同的發展是對客家不利的因素。[3] 換言之，中原客家的認同其實也仍潛伏於臺灣客家運動後的臺灣客家族群中。因此，其來由與形塑過程實值進一步了解與探究。

相對來看，針對 1945-1987 年期間客家族群的相關課題卻少有論述或研究，但由於爲與 1987 年之後的客家運動作一對照面，其實也有一些學者爲

---

* 國史館協修。

1 楊國鑫，〈臺灣的客家問題、客家運動與客家學〉，臺灣客家研究學會、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等主辦，「臺灣客家運動 20 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 年 12 月 8、9 日，頁 12。

2 施正鋒，〈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的客家運動〉，臺灣客家研究學會、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等主辦，「臺灣客家運動 20 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 年 12 月 8、9 日，頁 5。

3 楊長鎮，〈認同的辨證——從客家運動的兩條路線談起〉，網址：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274956510474，檢索日期：2010 年 8 月 2 日。

論述戰後羅香林客家學的引入臺灣，而有相關的討論。如楊長鎮的〈民族工程學中的客家論述〉，其實已觸及此一課題，在該文「羅氏客家學與當代臺灣客家運動中的客家論述」一節中，其實相當清晰地論述出此期間各階段的脈絡，如《苗友會刊》（後更名《中原雜誌》）的影響、「世界客屬總會」的運作等，並認爲羅香林的客家論述也藉此延續或擴散至戰後的臺灣，以客家這個成分參與了「中華民族工程學」在臺灣的建構。[4] 此後，部分研究者爲處理當代的客家認同課題時，爲交代背景，或做爲參照，在楊長鎮的基礎上稍作申述。如黃育嵐〈東部客家？花蓮玉里二個客家社區的族群關係與認同之研究〉[5] 及林吉洋〈敘事與行動：臺灣客家認同的形成〉[6] 兩篇碩士論文，二者其實未脫楊長鎮論述的基本架構，即戰後羅香林的客家論述藉由《中原雜誌》在臺灣散播，以及國家「世界客屬總會」的成立，以跨國族運動的面貌，將臺灣客家繫屬於中國客家之中。林吉洋另外也注意到了以同鄉會爲主的民間社團實質上扮演客家認同敘事傳遞與維繫客家族群認同於中華民族認同之內的重要中介角色。整體來看，現有對戰後以迄臺灣客家運動開展前的客家歷史，似已有清楚的敘事理路，但也僅停留在鳥瞰性的說明，或概論性的論述，目的只在藉以舖陳日後臺灣客家運動的開展，或以資對照說明。

論者皆謂，羅香林的中原客家論述參與了「中華民族工程學」在臺灣的建構。[7] 或言其客家源流說構成了臺灣早期客家研究傳統，且持續影響至 1990 年代才逐漸受到臺灣客家論述的挑戰。[8] 客家這種遷徙的記憶、對中原世胄的情懷，曾經深深地烙印在臺灣族群身上。[9]

有趣的是，被認爲是戰後臺灣中原文化論述主要宣揚者的羅香林，1949 年後學術發展的重心在香港，而非臺灣。那麼，第一個疑問是，戰後臺灣的中原客家論述是由誰引介？如何宣揚？爲何能在威權體制下進行以單一族群爲主的論述？而此戰後以來持續發聲的中原客家論述又爲何在 1980 年代

---

[4] 楊長鎮〈民族工程學中的客家論述〉，網址：http://taup.yam.org.tw/PEOPLE/961116-3.htm；檢索日期：2010 年 8 月 2 日。

[5] 黃育嵐，〈東部客家？花蓮玉里二個客家社區的族群關係與認同之研究〉（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1 月），頁 87。

[6] 林吉洋，〈敘事與行動：臺灣客家認同的形成〉（新竹：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7 月）。

[7] 楊長鎮〈民族工程學中的客家論述〉，網址：http://taup.yam.org.tw/PEOPLE/961116-3.htm；檢索日期：2010 年 8 月 2 日。

[8] 林吉洋，〈敘事與行動：臺灣客家認同的形成〉（新竹：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7 月），頁 22、24。

[9] 張維安，〈族群記憶與臺灣客家意識的形成〉，收入莊英章、簡美玲主編，《客家的形成與變遷》（下）（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0 年 12 月），頁 727。

末開始面臨挑戰而逐漸式微？綜之戰後以來到 1980 年代的漫長時間中，羅香林的中原客家論述究係如何在臺灣落地生根，以致發揚了好長一段時間，又產生了哪些影響，是本文想要討論的主要內容。

4 戰後臺灣的客家成分與中原客家的形塑歷程

二、華南「中原客家」的形塑歷程

何謂「客家」？以及客家是如何形成？等課題，至今似乎在學術論辯中，仍未有普遍被接受的定論。回到歷史的脈絡來看，「客」或「客家」成爲族群認同標幟，以及客家成爲研究課題皆有其時空背景與歷史脈絡。曾有學者指出，「客家」一詞是十七世紀才出現，以前的地方志並未提及此名詞，後來的文獻則不僅出現「客家」，且常是「土客」並提，[1] 造成此現象，實與明清時期人口流動的現象有關。

明清時期，閩粵贛邊區人口飽合，加上清初遷海復界之後，大量客方言人群向粵東沿海或珠江三角洲一帶流徙，在互動的過程中，客方言人群的流寓與耕佃身份，漸與周邊的廣府或福佬方言人群面臨文化差異，以及現實的經濟資源的爭奪。乾嘉之後，流徙至廣府方言地帶的客方言人群，由於人口激增，勢力擴展，漸形成與操廣府方言的人群相對競爭的局勢。廣府人常「褊心者或鄙夷之，以爲蠻俚，播之書史」，[2] 以匪、賊，或蠻、獠等非漢族稱之。

（一）徐旭曾〈豐湖雜誌〉以「客人」自稱

嘉慶年間掌惠州書院之徐旭曾所作之〈豐湖雜記〉，一直被認爲是最早對客家方言人群之來源、範圍、文化特徵有清楚論述者。由於東莞、博羅發生土客械鬥，徐旭曾乃召集門人，告以客人來源及其語言習俗所以不與其他漢人相同之因，而此亦被視爲是一篇客家人宣言，甚或是客家民系形成的標誌。[3] 此文中，呈現出客家方言人群的最初輪廓，對於了解中國歷史發展脈絡下的客家，有初步的還原作用。其中已表明，「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舊族」，於宋元之際南遷，在「閩、贛、湘、粵邊境，毗連千數百里之地」有清楚的分布範圍，「其讀書之音，則甚正」，以及「粵之土人，稱該地之人爲客，該地之人亦自稱爲客人」。[4]

---

[1] 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21。
[2] 章太炎，〈客方言序〉，收於羅翽雲，《客方言》，頁 5。
[3] 嚴忠明，〈「豐湖雜記」與客家民系形成的標誌問題〉，《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5：9（ 2004 年 9 月），頁 36-39。
[4] 徐旭曾，〈豐湖雜記〉，收於《和平徐氏族譜》，羅香林，《客家史料匯篇》（臺北：南天書局，

由以上所言觀之，可知客方言人群的自覺，其實是源自於長期以來廣東省內廣、惠二屬土客之間，由於生存資源的爭奪，以及語言、文化、習俗間的差異而造成的衝突而產生的族群邊界。[5] 其所論述之內容實已爲日後羅香林客家研究基本定調，如強調客家乃中原衣冠舊族、語言爲中原正音等。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一、清中葉時的博羅、東莞地區，土客關係緊張；二、在今日被視爲是客家人的大本營的閩粵贛三省邊區，已有一方言人群出現，其先祖約在元代落居於今閩粵贛邊區；三、該方言人群自視爲「客人」，此時尚未見有「客家」自稱；四、「客」之得名，實因別於「粵之土人」，且經過一個由他稱而自稱的過程；五、土客之別，在於彼此風俗語言之不同，「客者對土而言，土與客之風俗語言不能同」，方言分野明顯，以致「則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閱數百年，亦猶諸今日也」；六、其時已認爲客之語言，近中原正音，由此，可以了解至少在清朝中葉的嘉慶年間，廣東省境內客方言人群已被明顯的區別出來。

由上可知，嘉慶年間博羅一帶的客方言人群已以「客人」自稱，但尚未有「客家」之稱，那麼，客方言人群係於何時開始以「客家」自稱呢？

（二）19 世紀西人參與的客家溯源

在鴉片戰爭之前，雖然清政府實施嚴厲的禁教政策，且僅限於廣州正口通商，但由於 19 世紀上半葉的西方，海外傳教運動興起，西方宣教組織已經多方嘗試入華傳播。1807 年，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馬禮遜牧師（Rev. Robert Morrison）抵達廣州，揭開近代西方基督教新教到中國傳播的序幕。但由於當時傳教士們只能在廣州外國人區域和澳門活動，更多的是在南洋的傳教基地從事學習漢語、翻譯聖經、撰寫傳教手冊、創辦中文刊物等活動，很少能夠深入到中國內地。[6]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他們所接觸的華人主要以說粵方言的廣府人爲主。[7]

到了 19 世紀中葉，來到開港後之廣州以及被割讓給英國之香港的外國人，除了很快了解當時的廣東省內存在三種不同的方言人群，而且十分明顯

1992 年），頁 297-299。

[5] 黃宇和，《兩廣總督葉名琛》（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年），頁 3。

[6] 朱峰，《基督教與海外華人的文化適應──近代東南亞華人移民社區的個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9 月），頁 7-8。

[7] 莊初升、劉鎮發，〈巴色會傳教士與客家方言研究〉，《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3 卷第 7 期（2002 年 3 月），頁 1-8。

的，其中一存被稱爲客的人群，與自稱爲本地人的人群，正處於一種反目與對立的險惡狀態。

以客家人爲主體的太平天國運動具有歷史學和民族學的雙重意義，它既深刻影響了近代中國歷史的進程，且引起西方人對華南一帶被稱爲客的一群人的濃厚興趣，進而推展了客家的建構歷程。

日人飯島典子在追溯 Hakka 名稱登場歷史時，宣教士 Eitel 於 1866 年 1 月回報差會的一份關於博羅的報告書，其中提到了 Hakka 以及他們的方言，而將之推測爲 Hakka 名稱的登場，故將 Hakka 的定名訂在 1860 年代。[8] 然而，在香港傳教的巴色會傳教士韓山文（Rev. Theodore Hamburg，或譯韓山明）於 1854 年據太平天國後期領導人洪仁玕口述，撰成《太平天國起義記》（*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一書，該書在論及洪秀全的誕生和童年的時候，也對客家風俗詳加載述。[9] 由該書亦可了解，嘉應州移住廣州府（花縣），及其再西移廣西的一群移民，不僅被廣州府的本地人稱爲「客家」，亦被廣西人稱爲 Hakkas。廣西的本地人與客家人之間關係不佳，且早在道光末年即在貴縣發生嚴重衝突。[10]

有趣的是，於太平天國己未九年（1859）刊印的，由洪仁玕撰寫的《資政新篇》中，已直稱與自己同方言的人爲「客家」[11]，則似乎可表示，客家這一名詞已成爲客方言人群可以接受的自稱。進而我們可以了解，到了 1850 年代，不僅西人認爲客方言人群的名稱 Hakka 已登場，且已與客家產生對應關係。然而，我們也必須了解，族群自稱的轉變，不可能在同一個時間點處處皆然，應是由點而面，逐漸擴散，進而改變不同地域的客方言人群對自我的定名，因此我們雖於 1850 年已看到以「客家」自我認同的說法，但此後文獻上的「客家」書寫仍不常見。

發生在清咸同年間以客方言人群爲主的太平天國之役，以及傷亡慘烈的土客鬥爭頗引起西方世界對客方言人群的關注。巴色會傳教士 Ernest J. Eitel[12] 於 1867 年，開始於 *Notes and Queries on Chna and Japan*（中日釋疑），

---

[8] 飯島典子，《近代客家社會の形成：「他称」と「自称」のはざまで》，頁 62-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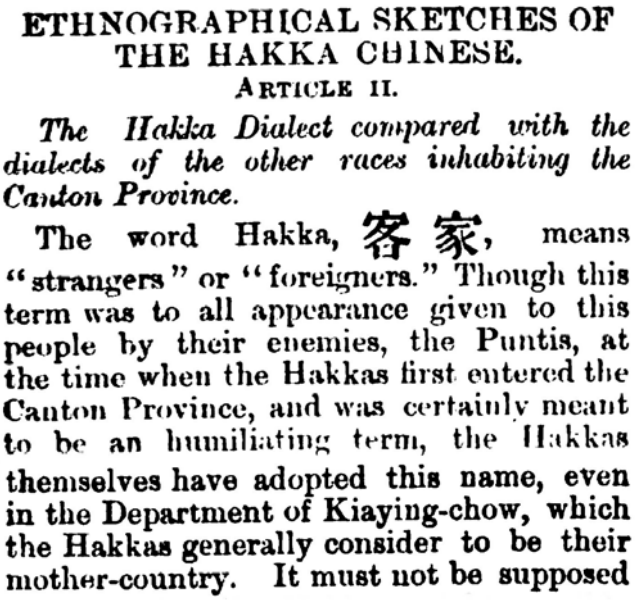
[9] 「李志剛，〈香港客家教會（巴色會）之設立及其在廣東與北婆羅洲之傳播〉，《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社，1994 年），頁 244。

[10] 洪仁玕述、Theodore Hamburg（韓山文）著；簡又文譯，〈太平天國起義記〉，收於王重民編，《太平天國》（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837、868-869。*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p. 4.

[11] 洪仁玕，《資政新篇》，收於王有立編，《太平天國官書十種》（臺北：華文書局），頁 276。

[12] 歐德理（Ernest John Eitel）是德國巴色會傳教士，1862 年到香港，旋入嶺南內地，在寶安縣傳

分 6 期連載“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客家人種誌略），該文中，並已將「Hakka」與「客家」以等同之意涵並列，或許可以解釋爲二個名詞的內涵已趨近，至少就當時西方人的認知而言。[13]



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

ARTICLE II.

The Hakka Dialect compared with the dialects of the other races inhabiting the Canton Province.

The word Hakka, 客家, means "strangers" or "foreigners." Though this term was to all appearance given to this people by their enemies, the Puntis, at the time when the Hakkas first entered the Canton Province, and was certainly meant to be an humiliating term, the Hakkas themselves have adopted this name, even in the Department of Kiaying-chow, which the Hakkas generally consider to be their mother-country. It must not be supposed

圖 2-1　1867 年西洋文獻中 Hakka 與客家之對應

資料來源：E. T. Eitel, “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 Article II., The Hakka Dialect compared with the dialects of the. other races inhabiting the Canton Province,” *Notes and Queries on Chna and Japan*, Vol. 1, No. 6 (1867/6), pp. 65.

Eitel 於該文中，已清楚識別出當時廣東存在本地（Puntis，即廣府人）、客家（Hakkas）、福佬（Hoklos）三個方言人群。值得注意的是，Eitel 在該

教，與客家人相處了四年，學會了客家語言。1865 年，歐德禮因與英國女子瑪利安尼的婚姻遭巴色會黎力基牧師、韋永福牧師反對，乃轉為倫敦傳教會服務，被派往博羅，專事客家教務。歐德禮比較關注客家問題，當與他的這些經歷極有關聯。1879 年，歐德禮應港督軒尼詩（John Pope Hennessy）之聘，擔任香港政府視學，還曾任《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編輯。歐德禮在教務及公務之餘，致力廣東語言歷史及民俗研究，特別是在客家研究方面。他的〈客家人種志略〉（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Hakka Chinese）和〈客家歷史綱要〉（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Hakkas），「為西方學者對客家研究之最早出者」。譚樹林，〈近代來華基督教傳教士與客家源流研究──以歐德禮、畢安、肯比爾為中心〉，收入特木勒編，《多元族群與中西文化交流──基於中西文獻的新研究》，頁 181；趙春晨、雷雨田、何大進，《基督教與近代嶺南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184。

[13] E. T. Eitel, “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 Article II., The Hakka Dialect compared with the dialects of the. other races inhabiting the Canton Province,” *Notes and Queries on Chna and Japan*, Vol. 1, No. 6 (1867/6), pp. 65-67.

文中雖指出客方言接近北京官話，卻認爲客家與漢族分屬不同種族。[14]

1873 年，Eitel 又在《中國評論》上發表“An Outline History of Hakkas”（客家歷史綱要），值得注意的是，Eitel 在本文中指出，在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之前，沒有歷史學家曾經提過 Hakkas，甚至在 Hakkas 本身的文學創作中也沒有關於這個種族以往歷史的任何記載，所以他寫作這篇文章的目的旨在「爲這個非凡的種族編寫一部早期簡史」。由於缺乏歷史文獻，Eitel 由客家人的族譜及口頭傳說，建構了一幅清楚的客家南遷過程，主張「五波說」。第一波是紀元前三世紀，受秦朝壓迫的山東人，移居到河南、安徽、江西等地；第二波是晉朝治下，移居到江西東南山地和福建省境；第三波是唐朝末期，移居到福建山地和江西、廣東兩省的邊境；第四波是在南宋，因舉兵勤王被逐而移居到廣東邊境；第五波是明末，因動亂而由福建一帶移居到廣東方面及海南島和臺灣等地。[15]

另一個巴色會傳教士 Charles Piton。[16] 於 1868 年在《教務雜誌》上發表 “The Hai-Kah in Chekiang Province and the Hakka in Kwanttung Province”，之後又撰寫“On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Hakkas”（客家源流與歷史）一文，指出根據客家族譜，客家祖先原居福建寧化石壁村，唐末時因黃巢之亂而南遷，與 Eitel 一樣也主張客家方言與漢族方言極爲相似，但駁斥 Eitel 稱客家與漢族不同種屬之說法，主張客家人是「漢族的真正子孫」。[17]

由以上的討論可以了解，西人對客家的認識和探究始於近代來華的傳教士，尤以巴色會傳教士爲主。傳教士們因爲身處土客衝突的氛圍中，在客家地區傳教的立場，對客家頗感興趣。而其所立論之基礎，主要因是直接採訪了解，以及客家地區的族譜資料等。而且值得注意是，在這些傳教士積極爲文追索客家源流，多方贊揚客家族群的優良美德之際，有一段時期中，其實在地的客家士子似乎仍沈默無聲，而傳教士們對客家源流的探討及相關論述內容，也成爲日後客家知識階層發揮客家族群立論的主要依據。

---

[14] 湯錦台，《千年客家》（臺北：如果出版社，2010 年 7 月）。

[15] E. J. Eitel, “An Outline History of Hakkas,” *China Review*, vol. II, No. 3 (1873), pp. 160-164.

[16] 瑞士人，1864 年來華，初在香港，後轉廣東客家地區傳教。著有 *La Chine: sa religion, ses moeurs, ses missions*（中國宗教、風俗與差會，1902）一書。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年），頁 387。

[17] Charles Piton, “On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Hakkas,” *China Review*, vol. 2, No. 4 (1874), pp. 222-226；譚樹林，〈近代來華基督教傳教士與客家源流研究──以歐德禮、畢安、肯比爾為中心〉，收入特木勒編，《多元族群與中西文化交流──基於中西文獻的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 1 月），頁 183-185。

（三）論證客方言為中原正音

光緒 6 年（1880）廣東鎮平人黃釗著《石窟一徵》，全書九卷中有方言二卷，「客語之有成書，實自此始」。[18] 特闢兩卷的篇幅闡述家鄉語言，這種體例在當時的志書上相當罕見，因此羅香林認爲這是方志學的一個創例。然其全書中，多強調鎮平縣之風土文化，「客家」意識並不彰顯，未有提昇「客家」的歷史文化目的。[19]

稍後有廣東大埔人林達泉撰〈客說〉，強調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遺，或於漢末之亂，或於東晉、南宋渡江而來，由於膏腴盡爲土著所占，故客家所居地多磽瘠，「間嘗按之史冊，詳爲稽核，客之源流，殆託始於漢李，盛於東晉六朝，而極以南宋，何以明之，客之先皆北產也，居豐鎬河洛齊魯之交，或爲帝王之胄，或爲侯伯之裔，或爲耕鑿之民」，「客之村落，依山倚壑，男女皆耕織無敢自惰，又種竹樹以爲樵販，無不盡之地利，其壯者則多傭力四方，以營於衣食」，[20] 由此可知當時客方言人群處境之艱困，林達泉並強調客之語言多合中原之音韻，積極證明客乃中原士族之後。

查梅縣歷代方志，康熙《程鄉縣誌》、乾隆《嘉應州志》，並無以「客」做族稱。「客家」一詞的記述，在光緒 24 年（1898）由溫仲和編纂的《嘉應州志》中才首次出現。光緒《嘉應州志》最值得重視的部分是專闢〈方言〉篇討論「客話」：

> 嘉應州及所屬興寧、長樂、平遠、鎮平四縣，并潮州府屬之大埔、豐順二縣，惠州府屬之永安、龍川、河源、連平、長寧、和平、歸善、博羅一州七縣，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然各因水土之異，聲音高下亦隨之而變，其間稱謂亦多所異同焉。廣州之人謂以上各州縣人為客家，謂其話為客話。由以上各州縣人遷移他州縣者，所在多有。大江以南各省皆占籍焉。而兩廣為最多。土著皆以客稱之，以其皆客話也。[21]

由上可知，光緒《嘉應州志》已清楚表明，「客家」一詞是廣州之土著先稱之，並謂其話爲「客話」，而溫仲和在此志書中專篇討論客家與客話，並清楚區劃出客家分布的範圍，似乎也意味著，身爲客方言原鄉之嘉應州士

---

[18] 曾運乾、朱希祖，〈審查客方言報告書〉，《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 1 卷第 4 期（1933 年 4 月），頁 22。

[19] 唐立宗，〈清代廣東方志的「客民」、「客匪」與「客家」論述〉，「第四屆青年學者論壇」（北京，2005），頁 97、103。

[20] 林達泉，〈客說〉，《林太僕文鈔》卷上，收於溫廷敬輯，《茶陽三家文鈔》（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頁 133-135。

[21] 溫仲和，《嘉應州志》，卷七，頁 121-122。

人，也已將客家或客話用以表述我族，亦即已接受「客家」爲自稱。

各地志書的撰述，其知識應是層累堆疊，乾隆《嘉應州志》毫無與「客」相關之論述，多僅強調當地風土文化，即僅有地方意識；而光緒《嘉應州志》則已明顯出現前志所無的「客家」自我意識。有論者言，光緒《嘉應州志》的出版，是族群意識強烈的客家士子利用官方史志的地盤，建立起自己認同的文化和歷史陳述的一個典範。[22] 而此一典範也昭示著，原本由嘉應州外移因土客衝突而產生的「客家」認同，已輻射回客方言的大本營，換言之，有可能在當時，「客家」已成爲由嘉應州至兩廣南部絕大多數客方言人群所能接受的族群名稱。亦即，文獻上的「客家」書寫會比較頻繁且在不同地域中出現。

唐立宗就清代廣東地方文獻的爬梳了解，認爲在《嘉應州志》出版前的清光緒年間，粵東地區的志書中，以「客家」立場的書寫尚未出現，「客家」意識尚處於萌芽階段，到了十九世紀末《嘉應州志》的出版，客家文化才被比較直接且正面地表述，換言之，「客家」意識直到十九世紀末才形成出想像的實體概念。[23]

綜而言之，由以上黃釗《石窟一徵》、林達泉〈客說〉、溫仲和《嘉應州志》的論述內容，其敘述模式，都無一例外地把自己認同的文化與想像的中原文化掛鉤，[24] 一如嘉慶年間徐旭曾在〈豐湖雜記〉中的論說。如果說清嘉慶至光緒年間，華南一帶的客家士人，已有「客人」的身份意識，且積極論證「客」與中州之淵源，其所論證的依據，多爲源於族譜記載的遷徙歷史及方言。然而，到了光緒末年以後，在這種遷徙與方言的論述上，又疊加了以血統爲基礎的種族觀色彩。[25]

（四）人種學影響下「客家係漢種」之論辯

人種學意義的民族觀念在 19、20 世紀之交傳入中國，很快就形成以血

---

[22]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頁 74。

[23] 唐立宗，〈清代廣東方志的「客民」、「客匪」與「客家」論述〉，「第四屆青年學者論壇」（北京，2005），頁 104-105。

[24]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頁 76。

[25]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頁 77。

統界定族群的傳統，在種族觀念的影響下，清末由清廷頒令各地編撰的鄉土志和鄉土教科書中多有關於人種之之篇章，形成以「種」來區分人群，涇渭分明地劃清「漢種」與「他種」，於是各書編纂者皆力圖證明我族是「純粹」的「中國種」或「漢種」。在種族理論被這樣用來區分人群種類時，意味著某方言群體需力陳自己是「漢種」，或者同時也將別的方言群體劃爲「他種」。

如光緒 27 年（1901）《興寧縣鄉土志》之〈人類篇〉中，即言「邑中人類，本中原衣冠舊族。宋南渡時，播遷轉徙，多由閩贛而來，語言風俗，與土著異，故當時土著稱爲客家」，「無改其語言風俗，示不忘本也」，……「至於猺本槃瓠種，散處嶺表間，所在多有……」。[26] 除申明客家爲中原舊族，有中原正音外，也表明自己與猺等非漢種有所差別。

由於鄉土教科書作爲新式教材的性質，一旦出版流傳，便更容易引發出更大的社會反響。而以往的粵客之爭，也在種族觀念的影響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從方言之別轉變爲人種之分，論辯轉而在新式的鄉土教科書上重演，所引起的波瀾與衝突更爲強烈。[27]

光緒 33 年（1907），上海國學保存會出版了由黃節編撰的《廣東鄉土地理教科書》，其中人種一章，以圖表形式，將客家劃出「漢種」之外，與「福佬」和「蜑族」並列爲「外來諸種」。此舉即引起一些客家士子的抗議，並展開組織性活動，由丘逢甲、黃遵憲、鍾用龢等人爲首，聯絡南、韶、連、惠、潮、嘉各屬客人，設立「客家源流研究會」，另有嘉應勸學所發起「客族源流調查會」。持續的輿論和組織力量，迫使上海國學保存會在報紙上刊登「擬於再版時改正，其餘未經集罄之書，概行停售」之啓事。到了光緒 24 年再版時，則乾脆將圖表上有關客家部分全部刪去，以避開這個敏感的話題。[28]

就大陸學者陳春聲對韓江流域潮州人與客家人的研究來看，他認爲在近代以前很長的時間裡，從歷史文獻上，看不出「客」作爲一個與「潮州人」相區隔的族類概念。因此傳統上，中國人分別一個人或一群人，多以其郡望或籍貫別之，而非族類的概念。但上述 1907 年《廣東鄉土地理教科書》所引起的爭論中，福佬與客家同被視爲非漢種，韓江流域才明顯浮現出被稱爲

[26]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頁 77-82。

[27]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頁 78、82。

[28]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頁 82-83、87、95。

「客家」和「福佬」的兩個方言人群，出現了明顯以方言作爲分類標誌的表達方式。[29]

民國 6 年（1917），興寧人羅翽雲主持志局，「尤著重輿地戶口與方言之調查，及人物藝文與史蹟之實錄」，由此也可看出二十世紀初的客家學者，除了以往強調南遷歷史，及方言與中原關係之外，也開始嘗試運用種族的論述，澄清以客家爲非漢的污名。[30]

有論者言，客家士子在 1907 年《廣東鄉土地理教科書》論爭中取得勝利，並非偶然，不僅表現出客家士子已建立起非常強烈的族群認同意識，也逐漸顯現出他們在廣東政治社會的實力。自辛亥革命以來，不論是實際參與革命，或在民國成立以來的廣東軍政方面，客家人的地位逐漸提升，而此一現象，多少與客家人認同意識的昂揚有關。[31]

1920 年，西人烏爾葛得主編，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世界地理課本，在廣東省的敘述中，有「山地多野蠻部落，如客家等是」之句，因而引起客籍學人的不滿。當時在北京、上海、廣州分別有客籍人士組織「客家大同會」，並且向商務印書館提出交涉，要求立予更正，並制止該書發行。1921 年夏，廣州大同會方面，派饒芙裳、姚雨平、黃鍊百等人，至香港與客屬人士廖新基、李瑞琴、黃茂林、賴際熙等人會商，決定組織旅港客屬團體，俾與國內各地客屬大同會，互通聲氣，共策進行以及「響應北京上海廣州三處客屬大同會，向商務印書館，嚴重交涉」。一面在各報章雜誌，發表客族之種種優良傳統，及闡述客家人物在歷史上之偉績。不久，商務印書館允予更正，這場風波始告停息。這場風波，讓旅港客屬人士決定成立永久性團體，「俾同系人士，得聚集一堂」，以「崇正黜邪」爲宗旨，成立「崇正工商總會」。1925 年，更名爲「崇正總會」。[32]

綜上可知，自晚清至 20 世紀 30 年代，因應一而再，再而三對客家人多所貶抑的污爲非漢的風波當中，客家士子逐漸凝聚對族群的認同意識，乃至

---

[29] 陳春聲，〈地域社會史研究中的族群問題──以「潮州人」與「客家人」的分界為例〉，《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3 卷第 2 期（2007 年），頁 74。

[30] 唐立宗，〈敬恭桑梓：近代廣東志書的編纂活動與「客家」途述〉，「第四屆青年學者論壇」（北京，2005），頁 104。

[31]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頁 95、251。

[32] 乙堂（羅香林），〈香港崇正總會發展史〉，收入香港崇正總會編，《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1950 年 12 月），頁 2-3；陳向榮，〈本會四十年大事記〉，《檳榔嶼客屬公會四十週年紀念刊》，頁 94。

逐漸有將實力加以組織化的情形，而終成就了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客家大同會」，以及成立於 1921 年的「崇正工商總會」。

1930 年 7 月，廣東省府建設廳編《建設週報》第 37 期，一篇關於客家風俗的短文，謂「吾粵客人，各屬皆有，……分大種小種二類；大種語言啁啾，不甚開化，小種則語言文化，取法本地人」，經客人抗議後，省府主席陳銘樞出面調處，始以降調週報編者，並更正內容及道歉後，紛爭方息。[33] 此事告一段落之後，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古直撰寫〈客人對〉一文，對本地人稱客家人爲蠻族的做法，予以嚴厲的批評。

民國 21 年（1932），廣東大埔人鄒魯接掌廣東中山大學校長，致力推動以學校力量纂修通志，鄒魯並自兼通志館館長。有論者認爲當時鄒魯決心「編纂適應時代的省志」，以及援引大批客家菁英進入中山大學或擔任廣東通志館纂修，係由於其重私誼之觀念，及強烈的客家意識。而這次鄒魯等人主掌的修志，是廣東自有通志以來，首次正面地表述客家，[34] 不同於以往廣東志書的詮釋權皆握於廣府人之手，也進一步顯現客家逐步上升的政治實力。

（五）進化論影響下西人對客家的認識

1912 年，在廣東梅縣傳教達數 10 年之久，自稱「中國通」的英國傳教士 George Campbell 在英國長老會與美國浸信會在汕頭舉行關於宗教的會議上，發表了“Origin and Migrations or the Hakkas”（客家源流與遷移）一文。主張客家南遷三波論，[35] 認爲客家具有優秀的「種族特性」及「民族革命」傳統，是由他們的祖源地文化和遷徙歷程以及其他「種種經歷」養成的，故而成爲「中華民族裡最顯著、最堅強有力的一派」，並且預言客家必將對「中華民族的奮發和進步」作出更大的貢獻。[36] 論者認爲 Campbell 此文的理論價值，在於運用達爾文的自然進化論考察客家的歷史，從中發現客家的遷徙活動也是驗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法則的論據，並且認爲它和「種族特

[33] 參見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1992 年），頁 5-10。
[34] 唐立宗，〈敬恭桑梓：近代廣東志書的編纂活動與「客家」途述〉，《》，頁 110-112。
[35] 第一波是由四世紀的大饑饉和五胡亂華所引起的；第二波是始於九世紀震撼唐朝政權的黃巢之亂，其中光啟元年，約有五千人移往於福建的西部山中。以後定居有四百年至形成了客家的民系。第三波是始於趙宋南渡至元之滅宋。
[36] 張英明、周璐，〈西方學者早期對客家與太平天國關係之研究〉，《廣東教育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6 期（2005 年 12 月），頁 80。

性」的養成具有因果關係，故而引起西方人類學界的高度重視。[37]

1924 年，美國地理學家 Ellsworth Huntington（韓廷敦）的新著《種族的品性》在美國出版。該書主要以 Campbell 的〈客家源流與遷徙〉爲資料基礎，專門安排了四章的篇幅，用自然淘汰和人口移殖的原則來解釋中國的民族性。肯定了 Campbell 對客家優秀的「種族特性」的評價，即「客家是中華民族裡的精華」。支持 Campbell 的客家南遷三波論，並說爲遷徙的過程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過程。經遷徙的淘汰作用，故而養成了客家優秀的「種族特性」。[38] Huntington 的《種族的品性》出版以後，由於客觀上適應了漢族客家民系的建構及其崛起的需要，故而深受客家文人和中國學術界的關注和歡迎。

Campbell 與 Huntington 等人的論說內容，對中國學術界和客家學人產生了深遠影響。首先，它推展了中國學術界對「粵東人種」亦即客家問題的重視以及研究工作的展開。北京學術界開始熱心提倡客家研究。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率先將「粵東人種」問題列爲本所重點研究項目之一，並委由 1930 年從清華大學史學系畢業的羅香林返回嶺南故鄉，實地考察「粵東人」問題，並負責編輯《客家史料叢刊》。從此以後，客家研究從嶺南客家文人圈走向學術的殿堂，至今仍影響深遠。[39]

（六）羅香林的客家再形塑

自晚清至 20 世紀 30 年代，歷史因侮辱客家人而引起的風波，刺激了大量爲客家源流辨護的論戰式文章的湧現，相關的研究也陸續興起，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就是在這樣的政治社會背景和文獻積累的基礎上產生的。羅香林從民俗研究開始，視野擴展到民族學研究領域，建立起客家研究的整套學術話語和研究範式，就是在這樣一種客家人政治和文化影響力迅速提升的環境中進行的。[40]

---

[37] 張英明、周璐，〈西方學者早期對客家與太平天國關係之研究〉，《廣東教育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6 期（2005 年 12 月），頁 80。

[38] 張英明、周璐，〈西方學者早期對客家與太平天國關係之研究〉，《廣東教育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6 期（2005 年 12 月），頁 81。

[39] 張英明、周璐，〈西方學者早期對客家與太平天國關係之研究〉，《廣東教育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6 期（2005 年 12 月），頁 82。

[40]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頁 256。

如前所述，由於原居閩粵贛邊區的客方言人群的南下流徙，使之錯落散居於不同語群與文化的廣府民系之中，兩種不同方言人群接觸之後，彼此文化的隔閡，加上現實資源利益的爭奪，土客關係日益惡化，至遲到了清中葉，客方言人群已有族群自覺，初時自稱客人、客話，之後方有「客家」之自稱。客方言人群的族群意識起於被污名化的過程，是以選擇標榜中原血統，強調其中州正音，對抗當時其他族群所賦予的非漢蔑稱。客家族群意識形成於受辱的過程，直至清末民初一仍如此，而這也是羅香林客家學產生的環境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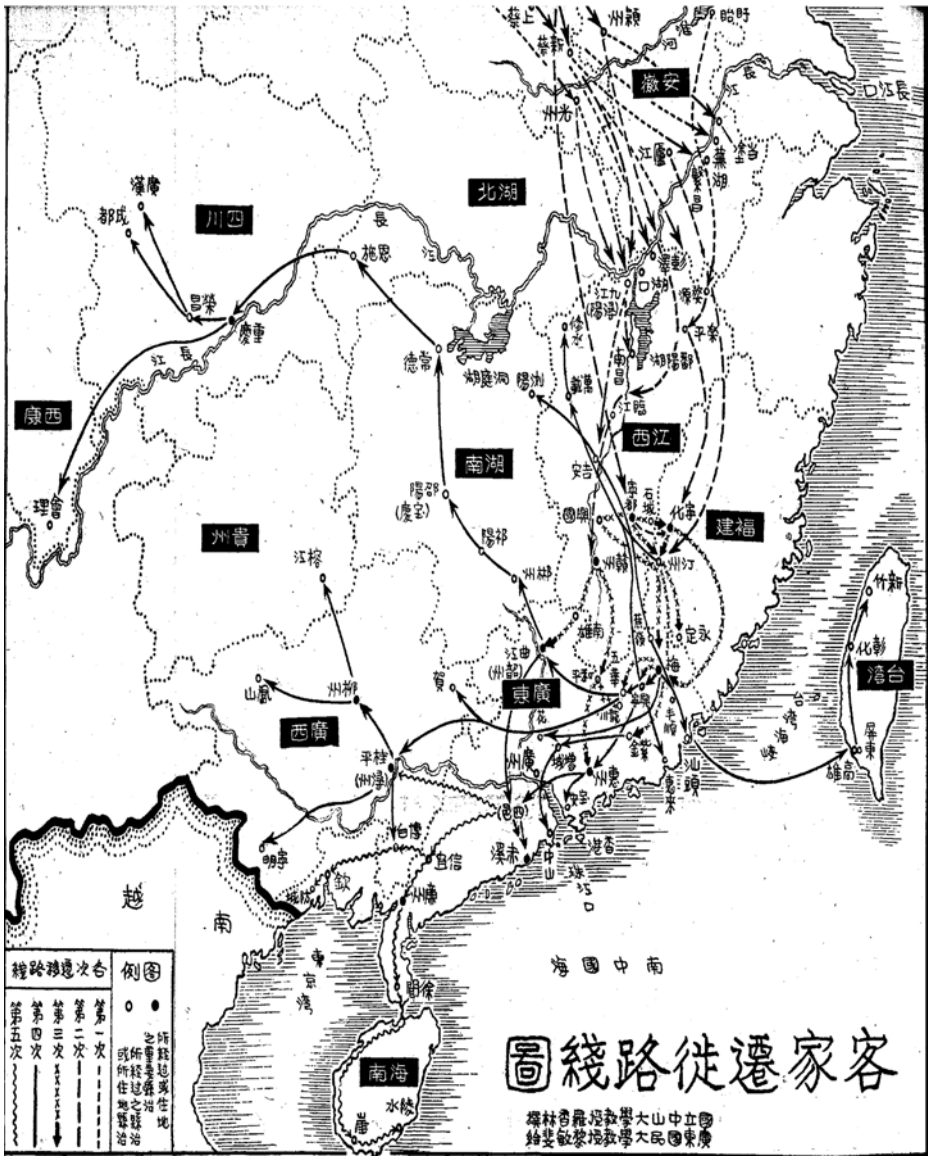


圖 2-2 客家遷徙路線圖

資料來源：羅香林，〈客家源流考〉，收入香港崇正總會編，《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1950 年），附圖。

1933 年，羅香林正式提出客家研究或客家學之詞，其 1933 年刊行的《客家研究導論》建立客家學之初步系統，考察客家的源流與分布、所處的自然環境、語言與特性，以及客家與近代中國的關係等。首先系統地梳理了 19 世紀以來中英文文獻對於客家的描述與研究，提出客家五次南遷路線，將客家描述成一個具有中原血統、在不同時期的遷移之下南來的「民系」，並以行政區域劃分純客縣與非純客縣，及強調客家人是正統的漢人等觀點。羅香林的客家研究除了透過討論客家民系與漢民族之間的關係，探討客家人的血統問題外，亦運用族譜來考證「客家民系」實屬漢民族的一支，帶動族譜學的相關研究。[41]

日人飯島典子在評介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時提到，本書將當時混沌不明的客家像加以體系化，是客家研究的經典之作。從該書的內容來看，貢獻在於：一、他將以前的先行研究加以整理與介紹，特別是西洋人對客家的相關研究，對日後的研究助益不少；二、駁斥客家＝少數民族論；三、整理出客家之概論，如客家源流、地理分布、客家語的音韻學等，是後世研究重要的基石。然也留給後世尚未釐清的課題，是本功罪相半的書。[42]

1950 年刊於《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的〈客家源流考〉在內容和篇幅上是屬《客家研究導論》第二章的擴大。羅香林早年認爲客家是「晉代漢民族的大遷移」，然而在〈客家源流考〉中則認爲，夏朝才是中華民族發展的開端，所以將客家推源於中華民族。至於客家的遷移，則視之爲「中華民族中客家的遷移」，而非漢族的遷移。此外，在內容上也做了相當程度的增補。

民初以來客家在黨政軍方面漸具實力，已能充分掌握自我族群的論述權，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與〈客家源流考〉，從各種不同面向討論客家之源流、居地、特性等，集清至民初以來客家士子正名論述之大成，加上以學術論證，取得許多看似客觀的資料加以印證，進而成功地在 20 世紀塑造了客家人正面的歷史和形象，羅香林從此成爲客家研究的奠基人，其兩部著作也被視爲客家學的經典之作。[43]

---

[41] 陳麗華，〈香港客家研究綜述〉，收入劉義章主編，《香港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9 月），頁 1-18。

[42] 飯島典子，《近代客家社會の形成：「他称」と「自称」のはざまで》（東京都：風響社，2007 年），頁 19-20。

[43] 陳支平主編，《邊際族群：遠離帝國庇佑的客人》（合肥：黃山書社，2006 年），頁 283；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頁 251。

由本文前述客家的形塑歷程可知，客家意識之形成經歷過由「他稱」而接受爲「自稱」，以及由「客」而「客家」的過程。自晚清至 20 世紀 30 年代，歷史因侮辱客家人而引起的風波，刺激了大量爲客家源流辯護的論戰式文章的湧現，隨著土客械鬥把敵我之分推至極端，客家人的自我意識也變得空前高漲。隨著他們逐漸掌握著書、撰文、修志等文化資源，即開始對自己的身份和先祖源流作出正名的表述。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就是在這樣的政治社會背景和文獻積累的基礎上產生的。[44]

就族群理論而言，約有「原生論」（或稱本質論，primordialism），以及「建構論」（constructuralism）二種看法，前者主張認同建立在共同的血緣、生物上的特徵或是文化特質，認爲文化是與生俱來的，既存社會之中，族群認同是在人們出生時被根本賦與的一種不可化約的情感認同。因此認爲認同是天生的，而且是固定不變的；後者則主張認同都是經過想像、塑造，甚至是捏造出來的，不論其建構基礎爲共同的記憶、經驗或是歷史。因此認爲認同是人爲的，會隨著情境變動而具高度的可塑性。[45]

若以此兩種主張來看羅香林的客家論述，可以發現他所論說的客家歷史或民系特性，以及他所使用的方式，都有明顯的建構痕跡。一如一位大陸學者所言，羅香林建構客家的方式，與清末民初學人的國族建構有著如出一轍的雷同之處如：其一，二者的出發點一致，都是從中華民族的構成與演進出發，以建構國族歷史；其二，二者的做法相似，都是強調共同源頭的歷史記憶，以增強凝聚情感的作用；其三，二者的目的相同，都是借助於一個歷史符號，來加強社會群體的血緣認同意識。不同的只在於外在的名詞，即一爲「民族」一爲「民系」，一爲「國族」一爲「客家」，一爲「黃帝」一爲「中原仕宦」。二者有著相同的論述框架，即將已逝的歷史人物，扯出原有的時空脈絡，重行編入一組以「國族」爲中心的社會記憶之中。[46]

綜上可知，羅香林以來的客家論述，看似以原生論的理論基礎在詮釋，即論述的依據多爲想像中的共同原生特質，並以一些共同的文化象徵，或共同的族群源流加以連繫我族，成爲其「原生情感」重要的凝聚紐帶。這些表

---

[44]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頁 72-73、256。

[45] 施正鋒，〈戰後吳濁流的認同觀──情境條件下的臺灣人認同〉，收入氏著，《臺灣人的民族認同》（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 年 8 月），頁 75-76；高怡萍，〈客家族群意識與歷史的文化建構──客家社區在原鄉與移民地之比較研究〉，《客家文化研究通訊》3（2000 年 7 月），頁 54。

[46] 陳世松，〈中國近代以來學術建構對客家研究的影響──以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為例〉，《社會科學研究》，2007 年第 6 期，頁 163-164。

面上看起來像是本質性的論述，其實是經過挑選的文化元素，而其以以客家歷史的重建來塑造客家人的集體認同，可說是建構論的經典。[47]

[47] 施正鋒，〈客家人由中國遷徙臺灣──臺灣客家族群認同的打造〉，收入氏著，《臺灣人的民族認同》（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 年 8 月），頁 157-158；張侃，〈胡文虎與馬來西亞客家社團關係初探〉，收入林金樹主編，《中華心．客家情──第一屆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吉隆坡：馬來西亞客家學研究會，2005 年），頁 43-76。

20 戰後臺灣的客家成分與中原客家的形塑歷程

三、清與日治時期臺灣對「客家」之認識

（一）清治時期

若就目前所能掌握的清代文獻做一歸納可知，清代官方的角度，對臺島的原住民族，以向化程度加以分類，如《安平縣雜記》所言：「土著者，熟番與生番而已」。[1] 而對來臺漢人，則以籍貫別之。清代官方在行政治理上，多以祖籍地識別漢人，籍貫理論是過往中國對人群分類的主要實踐，也是現代族群分類概念未興起之前的主要記錄。[2] 當時來臺的漢人，主要爲閩粵二籍，若再細分，則在閩有漳、泉、汀，在粵則有惠、潮、嘉，彼此素分氣類，如《重修臺灣府志》在敘及「義民」時，於附考中，收錄有轉引自《理臺末議》的一段文字：

> 雖在臺地者，閩人與粵人適均；而閩多散處、粵恆萃居，其勢常不敵也。……粵莊在臺，能為功首，亦為罪魁，今始事謀亂者既已伏誅，則義民中或可分別錄用，以褒向義。[3]

又如道光年間，閩浙總督孫爾準言「臺灣所屬，係閩、粵兩籍居住．閩、粵、漳、泉，各分氣類，每因械鬪滋事」。[4] 以及吳子光《臺灣紀事》中稱：

> 臺地人民，籍有閩、粵。閩莊多依海堧，粵莊多近山而貧。故設隘禦番之舉、出險亨屯之役，粵民頗有得力處。閩籍最殷富，紳士急公嚮義，歷著成績，得之似可當一面之寄。房謀杜斷，因勢利導，是在平章軍國者加之意而已。[5]

此外，在清代臺灣文獻中，我們也常看到「客民」、「客子」、「客庄」之書寫。如藍鼎元〈粵中風聞臺灣事論〉中所言：

> 廣東潮惠人民，在臺種地傭工，謂之客子。所居莊曰客莊。人眾不下數十萬，

---

[1] 《安平縣雜記》，頁 23。

[2] 楊聰榮，〈從族群關係史看臺灣客家的分類範疇與獨特性〉，發表於「臺灣史學客家研究研討會」，2004 年 5 月 26 日。

[3] 〈義民/附考〉，《重修臺灣府志》，卷十一，武備（三），文叢第 105 種， 362。

[4] 〈孫爾準奏查辦械鬥完竣、籌議善後事宜摺〉，《福建通志臺灣府》，文叢第 84 種，頁 33。

[5] 吳子光，〈呈諸當事書〉，《臺灣紀事》，文叢第 36 種（1875 年原刊），頁 79。

> 皆無妻孥，時聞強悍。然其志在力田謀生，不敢稍萌異念。往年渡禁稍寬，皆于歲終賣穀還粵，置產贍家，春初又復之臺，歲以為常。[6]

而這些文獻上的「客」，常成爲研究者追索清代臺灣客方言人群之線索之一。清初臺灣方志中的「客」，雖已具有指涉有同樣的祖籍、維生方式和文化形態的一群人的性質，但其共同性只是文獻上的表現而已，其內部卻可能存在語言、文化的異質性。[7] 康熙末年朱一貴亂平之後，閩浙總督覺羅滿保「題義民效力議效疏」，對清領臺之初渡臺粵民之人群屬性留下非常珍貴且細緻的記錄：

> 查臺灣鳳山縣屬之南路淡水，歷有漳、泉、汀、潮四府之人，墾田居住。潮屬之潮陽、海陽、揭陽、饒平數縣與漳、泉之人語言聲氣相通，而潮屬之鎮平、平遠、程鄉三縣則又有汀州之人自為守望，不與漳、泉之人同夥相雜。六十年四月二十二日，賊犯杜君英等在南路淡水檳榔林招夥豎旗搶劫新園，北渡淡水溪侵犯南路營，多係潮之三陽及漳、泉人同夥作亂。而鎮平、程鄉、平遠三縣之民，並無入夥。三縣義民……糾集十三大莊、六十四小莊，合鎮平、程鄉、平遠、永定、武平、大埔、上杭各縣之人，共一萬二千餘名於萬丹社，拜叩天地豎旗，立「大清」旗號，供奉皇上萬歲聖旨牌。[8]

就以上覺羅滿保的觀察可知，當時粵籍移民當中，存在著不同方言人群的分類情形。其中，其所言之「潮屬之鎮平、平遠、程鄉三縣」即今我們所認知的客方言人群，但同屬粵省之「潮屬之潮陽、海陽、揭陽、饒平數縣」之人則與「漳、泉之人語言聲氣相通」，屬於閩南方言系統。

「客」在中國文字的使用上有其原本含義，在近代帶有族群定義，以方言群爲邊界的客家意識尚未形成之前，清代臺灣文獻上的「客」是否能等同於使用用客方言的族群，或可由原籍廣東嘉應州，於清道光年間隨父渡臺謀生而家於淡水的吳子光，在同治年間仍不解爲何閩粵贛三省邊區居民之方言，會被稱爲「客籍語」的情形中略窺一二：

> 至閩、粵、江右三省，本鄰境也，若閩之延建邵汀、粵之嘉應大埔豐順龍川、江右之南贛等處，謂為客籍語，不知何據。豈因戶有主客之分，主則土著、客

---

[6] 藍鼎元，《平臺紀略》（文叢第 14 種，1958 年），粵中風聞臺灣事論，頁 63。

[7] 李文良在〈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文中雖觀察到清初志書中的「客」內部存在語言、文化的異質性，但卻又直接將方志中的「客」直接指稱為客家，似乎有些矛盾。李文良，〈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頁 144。

[8] 覺羅滿保，〈題義民效力議效疏〉，收於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文叢第 146 種，1962 年；1764 年原刊），頁 343-344。

則行國，本其始言之，後遂一成不變歟？[9]

由以上吳子光對「客籍語」的疑惑可知，雖然嘉慶年間在粵省惠州地區已有徐旭曾之客方言人群的自我認同宣言產生，但遲至同治年間，自客方言原鄉渡海來臺的吳子光卻仍無法了解爲何「客」可以用以指稱方言人群。

文獻中「客」之書寫，一直以來都只是官方或漳、泉移民的他稱，是當時官員或閩人以粵人隔省流寓，由粵至閩屬臺灣墾殖，故稱其爲「客」，乃以省籍差異使然，不必然以方言爲判定的標準。故粵省內不論客方言或福佬語系的人群，由於同屬粵籍，皆一律被視爲「客民」。[10] 清代臺灣，被指稱爲「客」的粵民，其自我認同的邊界仍是省籍，故時以「粵人」或「粵民」自稱。如乾隆 52 年（1787）下淡水地區的山豬毛義民，向閩浙總督常青連名呈稱懇准令隨征時，即自言：「粵民等祖父，自康熙六十年、雍正十年，逆匪朱一貴、吳福生等先後倡亂，屢從征勦，皆邀議敘職銜」。[11]

（二）19 世紀中葉西人對臺灣 Hakka 的認知

其實，客家意識在華南的形塑過程中，臺灣方面也一波又一波地接受了這種對方言人群的新的認識。第一波應是 19 世紀來臺遊歷的西人。19 世紀中葉臺灣開埠的年代，西方知識體系已逐漸形成一套對華南 Hakka 人群的認知。帶著這樣的認知，來臺的西方人士對於在臺漢人，不再像以往一樣，以廣東移民（Canton emigrants 或 Canton settlers）來稱述，[12] 而多以 Hakka 來表述。

19 世紀中葉來臺的西人，以華南新生成的 Hakka 認知來理解臺灣客方言人群，留下了許多相關記述，對他們對 Hakka 的描述可以看出，這種對 Hakka 的認知可能形成不久，尚未成熟穩定，常有各執一詞，相互矛盾的情形。

由當時西人留下許多對臺灣 Hakka 的記述資料中，可看出除了深刻的在地觀察，例如就 Hakka 的分布，來臺的外國人點出了中壢、竹塹、貓裡、月眉、南庄、大湳、新民庄、保力、巴塱衛等 Hakka 聚落，也提到當時臺島

---

[9] 吳子光，《臺灣紀事》（文叢第 36 種，1959 年），頁 97，犵狫客民。
[10] 藍鼎元，《平臺紀略》，頁 2。
[11]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文叢第 102 種，1961 年），頁 573，九月初七日至十二日。
[12] "Notices of Moder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May 1835-April 1836), pp. 496-497.

Hakka 的生業方式，除了種稻植蔗外，另還有木炭、茶葉、樟腦和石油。他們也觀察到臺灣的 Hakka 和福佬關係不睦，與平埔關係緊張，與高山的原住民則存在中介交易、軍火提供，及互通婚姻的複雜關係。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看到當時來臺的西人常以華南生成的 Hakka 認知來理解或描述臺灣的 Hakka。例如提到「Hakka，即爲客人（guest people）之意，來自中國北方，但較晚遷至南方各省」。[13] 或說「Hak-kas 是吃苦耐勞、勤奮、愛冒險的種族（race）」。[14] 甚至將 Hakkas 別於 Chinese（漢人，指閩南移民），[15] 從當時西人的記述中，可以發現，他們較少清楚地將說閩南方言的福佬標示出來，多逕以 Chinese 稱之，如此一來，常常被另外提及的 Hakkas 與漢人身份間的關係，就顯得曖昧而尷尬，這似乎也是緣於對華南土客衝突廣府人對客方言人群非漢種貶抑之詞的影響。以上這些 19 世紀中葉來臺西人對 Hakka 的記述內容，明顯不是臺灣在地的觀察與了解，而是一種移植的認知。因此，若未能充分了解 19 世紀中葉來臺西人對 Hakka 的記述，有部分面向係受華南土客衝突而生成的知識觀所影響，而逕以爲是他們來臺後在地的觀察，則可能造成許多誤解。

（三）日治時期

日本治臺後，也經歷與華南同步，逐漸認識客家的歷程。早在領臺之初，即了解客家爲一方言人群之性質名詞。

明治 28 年（1895）由日本參謀本部出版的《臺灣誌》中，提及臺灣的四個種族中，有被稱爲客家（ハーカ，或寫作哈喀）者，認爲不屬於漢民族，是中國的一種化外之民，其居處位於生番地與漢人之間，漢人因此稱之爲「內山的客人」。[16]

明治 29 年由小川琢治撰寫的《臺灣諸島誌》中，也提到臺灣「支那移住民中有客家種族 Hakkas（一名客仔，或哈喀）」，被其他支那人視爲不

---

[13] Hellmuth Panchow, “Die Bevölkerung Formosas” [The population of Formosa], Aus allen Welttheilen XXVII (1895), pp. 33-40; 65-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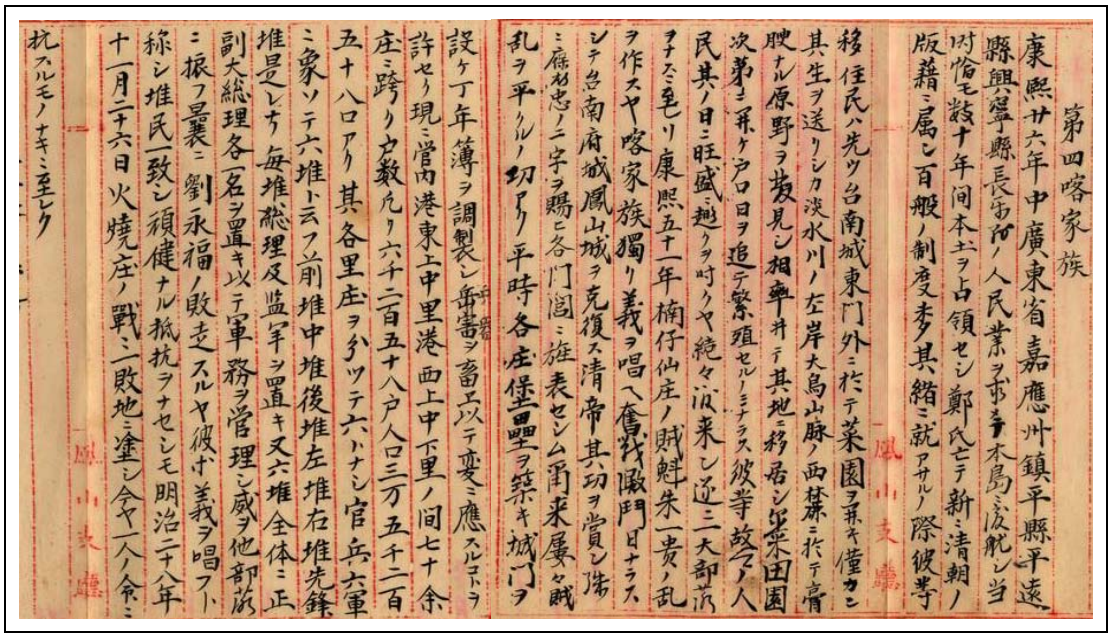
[14] Thomson, J., F.R.G.S.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A series of two hundred photographs, with letterpress descriptive of the places and people represented.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Low, and Searle, 1873-1874.

[15] Le Gendre, C.W.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1).

[16] 參謀本部，《臺灣誌》（東京：八尾書店，明治 28 年 7 月），頁 80-81。

同的種族。並引述中國布教的西人ピントン（應即 Charles Piton）對客家的記述，提及客家多住居廣東地方，被當地土著人民視爲外來的種族而加以排斥等。[17] 顯見受華南土客相關及西人對 Hakka 撰述資料的影響。

同年（1896）由權藤震二著《臺灣實況》中，提及臺灣住民種類時，則言漢人中有「廣東、福州、廈門、喀家」等。[18] 在 1897 年的總督府公文類纂中，也以「喀家族」一詞形容在南臺灣的六堆聚落。[19]


第四喀家族

康熙廿六年中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平遠縣興寧縣長宇所ノ人民業ヲ求テ本島ニ渡航シ当時僅ニ数十年間本土ヲ占領セシ鄭氏亡テ新ニ清朝ノ版籍ニ属シ百般ノ制度多其緒ニ就アサルノ際彼等移住民ハ先ツ台南城東門外ニ於テ菜園ヲ開キ僅カニ其生ヲ送リシカ淡水川ノ左岸大島山脚ノ西麓ニ於テ膏腴ナル原野ヲ発見シ相率テ其地ニ移居シ水田園次第ニ開ケ戸口日ヲ追テ繁殖セルノミナラス彼等故々ノ人民其ノ日ニ旺盛ニ趨クヲ吋クヤ絶々汲来シ逆ニ大部分ヲナシ乾隆ノ康熙五十一年楠仔仙庄ノ賊魁朱一貴ノ乱ヲ作スヤ喀家族獨リ義ヲ唱ヘ奮戦激闘日ナラスシテ台南府城鳳山城ヲ克復ス清帝其功ヲ賞シ褒忠ノ二字ヲ賜ヒ各門閭ニ旌表セシム爾来屢々賊乱ヲ平クルノ切アリ平時各庄堡ニ壘ヲ築キ城門ヲ設ケ丁年簿ヲ調製シ番害ヲ畜ニ以テ変ニ應スルヲトヲ許セリ現ニ管内港東上中里港西上中下里ノ間七十余庄ニ跨リ戸数凡ソ六千二百五十八戸人口三万五千二百五十八口アリ其各里庄ヲ分ツテ六ハナシ官兵六軍ニ象ソテ六堆トシテ前堆中堆後堆左堆右堆先鋒堆是レナリ毎堆総理及監軍ヲ置キ又六堆全体ニ正副大総理各名ヲ置キ以テ軍務ヲ管理シ威ヲ他部族ニ振フ曩ニ劉永福ノ敗走スルヤ彼ハ義ヲ唱フ稱シ堆民一致シ頑健ナル抵抗ヲナセシモ明治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火焼庄ノ戰ニ敗地ニ塗シ今ヤ一人ノ余ニ抗スルモノナキニ至レリ

圖 3-1　明治 30 年認識六堆為「喀家族」

資料來源：〈鳳山縣管內治政一班（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冊號 9785，文號 8，明治 30 年（1897）。

無獨有偶，同年由臺灣事務局出版的《臺灣事情一斑》中，也以「客家族（粵族）」之詞論述在南臺灣的六堆聚落，文中並提及閩族粵族彼此忿恨纏綿，以及今後應著重啓誘六堆爲日本帝國所用。[20] 1898 年出版的《臺灣紀要》中有一附圖，由圖中可看出在認定上將「粵人」等同於「客家」。

---

[17] 小川琢治，《臺灣諸島誌》（東京：東京地學協會，明治 29 年 2 月）。
[18] 權藤震二，《臺灣實況》。
[19] 〈鳳山縣管內治政一班（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冊號 9785，文號 8，明治 30 年（1897）。
[20] 臺灣事務局，《臺灣事情一班》，下卷（臺北：臺灣事務局，明治 31 年 7 月，1898），頁 244-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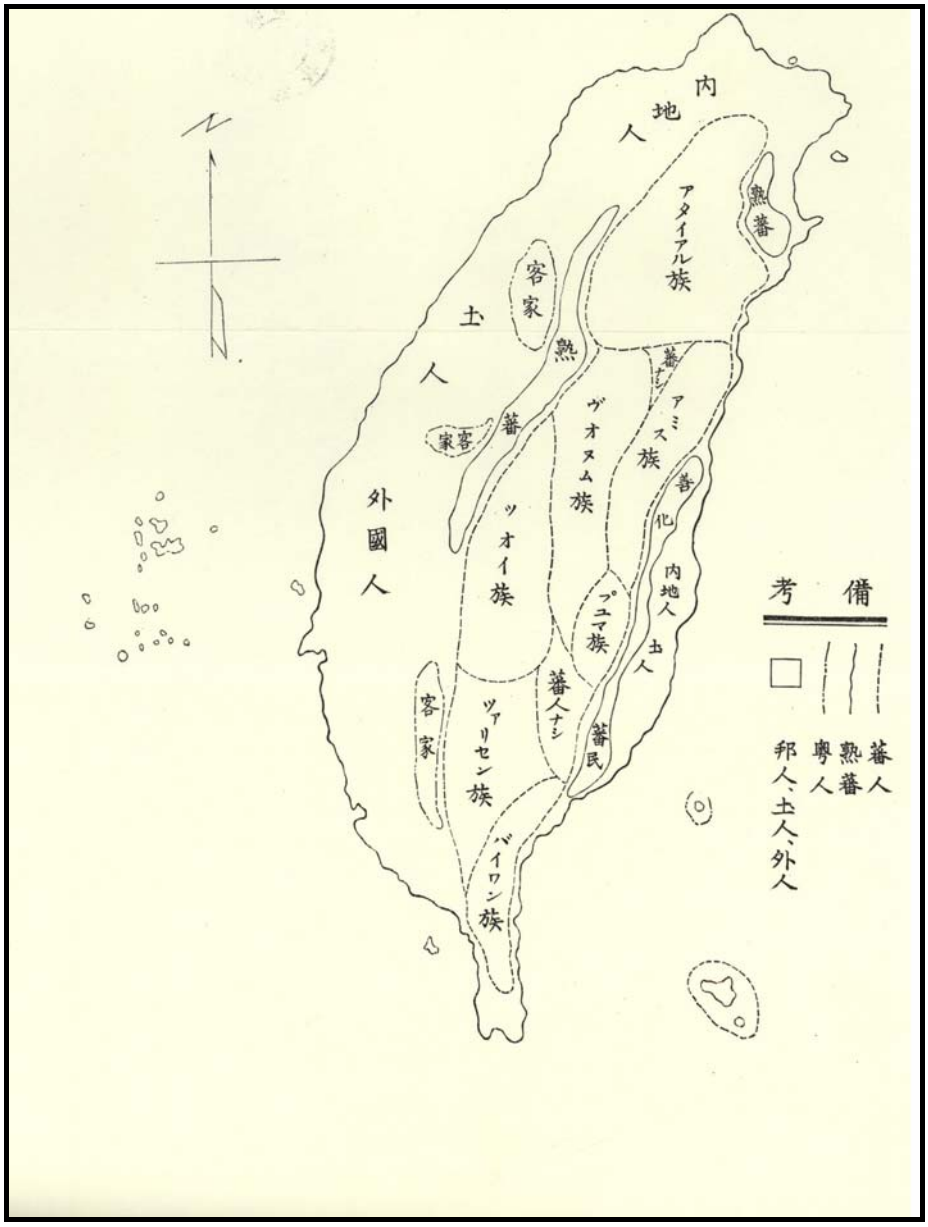


圖 3-2 臺灣人種分布圖（明治 31 年）

資料來源：《臺灣紀要》（明治 31 年，1898，出版資料不詳），附圖。

日治初期雖有客家認識，但多爲移植的認識，少有在地歷史的探索與觀察。而且，這些初期對客家方言人群的理解，並未反應在統治臺灣時對漢人的分類之上。日本統治時期，一共舉辦了七次戶口普查（兩次臨時戶口調查及五次國勢調查）。除了最後一次國勢調查（1940 年）因爲戰爭爆發未及完成之外，其餘六次都有完整的調查報告書出版。由歷次戶口普查的對漢人

的分類方式來看，日本殖民政府對於台灣「本島人」內部分類，似乎由 1905 年第一次臨時戶口調查時就已大致確立，即將臺灣漢民族分為福建人與廣東人。[21]

表 3-1 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人口普查的「種族」區分（1905-1935）

調查名稱 / 年份	主要類屬 / 次類屬				
第一次臨時戶口調查 1905 年（明治 38 年）	內地人	本島人			外國人
		漢人	熟蕃	生蕃	清國人　其他
		福建人　廣東人　其他			
第二次臨時戶口調查 1915 年（大正 4 年）	內地人	本島人			外國人
		漢人	熟蕃	生蕃	
		福建人　廣東人　其他			
第一次國勢調查 1920 年（大正 9 年）	內地人　朝鮮人	本島人			外國人
		福建人　廣東人　其他			
第二次國勢調查 1925 年（大正 14 年）	內地人　朝鮮人	本島人			外國人
		漢人	熟蕃	生蕃	支那人　其他
		福建系　廣東系　其他			
第三次國勢調查 1930 年（昭和 5 年）	內地人系　朝鮮人系	漢人系	蕃人系		外國人系
		福建　廣東　其他漢人	熟蕃	生蕃	
第四次國勢調查 1935 年（昭和 10 年）	內地人　朝鮮人	本島人			外國人
		福建系　廣東系　其他漢人系	平埔族	高砂族	中華民國人　其他外國人

資料來源：作者由下列資料整理而得：
1. 《明治三十八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記述報文》，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明治四十一年刊行。
2. 《大正四年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概覽表》，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大正六年刊行。
3. 《大正九年第一回臺灣國勢調查（第三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要覽表》，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大正十一年刊行。
4. 《大正十四年國勢調查結果便覽》，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昭和二年刊行。
5. 《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表全島篇》，臺灣總督府，昭和九年刊行。
6. 《昭和十年國勢調查結果表》，臺灣總督府，昭和十年刊行。

資料來源：王甫昌，〈由「中國省籍」到「臺灣族群」：戶口普查籍別類屬轉變之分析〉，《臺灣社會學》，第 9 期（2005 年 6 月），頁 72-74。

日本政府在臺進行戶口調查之初，即將在臺住民以「種族」加以分類。

[21] 王甫昌，〈由「中國省籍」到「臺灣族群」：戶口普查籍別類屬轉變之分析〉，《臺灣社會學》，第 9 期（2005 年 6 月），頁 72-74。

總督府在〈明治三十八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顛末〉中明確指出，在調查中採用「種族」分類的原因是，臺灣社會擁有「異種殊俗的人類」，爲明瞭臺灣社會內部的差異性，故挪用「種族」一詞，但並非近代人種學知識之意涵。調查部門對於種族分類的界定，係基於對臺灣歷史及社會風習的了解，因此襲用清代臺灣社會的政治分類或社會認知──如祖籍（或方言群）的閩、廣。在總督府看來，最保守的分類概念或許最能代表臺灣社會的人群內涵。[22]

檢視目的在建立殖民地人口統計基準的國勢調查，所使用的種族分類不完全是根據體質、血緣或社會文化的差異，具有相當的舊慣性質與務實性格。考慮到殖民地民情與文化上的分殊，運用舊慣及順應臺灣風土民情，可能也爲了治理之必要。[23]

對於以廣東、福建等爲種族之分類可能產生的認定疑義，調查部也有所考慮與解釋，其一以父方種族爲準，若種族系統不詳，則依現狀的風俗習慣推知；其二，若已改變風習語言，則以改變後的狀態認定之，如雖然有廣東人的歷史，然而其特徵不存在，且已福建化，則以福建人視之。[24] 就當時所舉範例可看出，其所認定廣東人即客人，「伊講是廣東來的。」「此刻伊敢是講伊是客人歟？」「客人是何貨(什麼之意)？」「客人就是廣東人。」(98)[25]

在 1905 年第一次臨時戶口調查，臺灣總督府當局終於正式地將閩族粵族的用語明確化，並加以固定。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沿襲清代以行政區劃分類人群的方式，將在臺漢人仍稱閩族、漢族，或廣東人、福建人。如 1905 年 10 月《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一則〈稟報人口異動（四）〉中言及：

> 父母種族。若內地人。則書內地人。若本島人。則分別種族。其為福建人。抑

[22] 詹素娟，〈臺灣平埔族的身分認定與變遷（1895-1960）──以戶口制度與國勢調查的「種族」分類為中心〉，《臺灣史研究》，第 12 卷第 2 期（2005 年 12 月），頁 141。

[23] 詹素娟，〈臺灣平埔族的身分認定與變遷（1895-1960）──以戶口制度與國勢調查的「種族」分類為中心〉，《臺灣史研究》，第 12 卷第 2 期（2005 年 12 月），頁 126、138、141。戴國煇則認為臺灣總督府在在戶口簿上設種族欄，是基於一種相當巧妙的政治考慮的，將閩粵二屬分類為閩族和粵族，將其提高到種族概念，，以收分割統治之實效。參見戴國煇，〈日帝統治下的臺灣客家〉，《客家風雲》，第 5 期（1988 年 3 月），頁 72。

[24] 詹素娟，〈臺灣平埔族的身分認定與變遷（1895-1960）──以戶口制度與國勢調查的「種族」分類為中心〉，《臺灣史研究》，第 12 卷第 2 期（2005 年 12 月），頁 146-147。

[25] 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編，《戶口調查用語》（臺北：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1905 年），頁 151-152。此書收於六角恆廣編，《中國語教本類集成第十集第一卷》（東京：不二出版，1998 年）。

為廣東人。其餘。則為漢人。為熟蕃人。為生蕃人。亦宜分別其種族。[26]

珮香於 1906 年所撰〈平埔番部落不同〉一文中亦言：

與夫閩人粵人。居住區域。似有畫界。閩人居在海口。粵人次之。生番深藏山野。人煙隔絕。而熟番與化番。則住山下。[27]

有趣的是，在日治臺灣的文獻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廣東人又稱爲「客人」的記載，如「本島有廣東籍人士，語稱曰客人」。[28] 日人藤上未成於 1909 年撰〈福建人と廣東人（上）〉中亦言：

本島 2300 餘方里的土地上，由二大種族占居大部，其一是福建人，又稱為福老，另外是廣東人，又稱為客人。此二種族並非人種學上之區分。[29]

綜上可知，日本在臺統治當局已了解臺灣的客方言人群在廣東又被爲「客家」，只是，在整個日治臺灣，統治當局對客方人言群的稱法仍是廣東人或粵民，並稱其方言爲「廣東語」。如町田則文於明治 36 年（1903）即言，臺灣住民一般稱廣東人爲客人，廣東語爲客人語，因漳泉二州移民，較廣東人早移墾臺灣。[30]

小川尙義於明治 40 年（1907）出版的《日臺大辭典》中對臺灣方言有清楚的調查，認爲在臺灣的漢語有南部福建語與客人語二種。其中客人語通例稱爲廣東語，又可稱「客話」。在臺分布範圍以新竹、苗栗、臺中、阿緱（屏東）地方最多，在中國則以廣東省嘉應州爲主。[31]

於是，日治臺灣對於客方言的討論或著述，皆以「廣東語」稱之。如據日人橋本萬太郎的研究，日治臺灣第一部日本版的客家會話是 1915 年由志波吉太郎著之《廣東語會話篇》，其後有臺人劉克明著《廣東語集成》(1919)，1933 年有臺人菅向榮著《標準廣東語典》，同年另有日人河野登喜壽著《廣

---

[26] 〈稟報人口異動（四）〉，《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05 年 10 月 13 日，版 2。
[27] 珮香，〈平埔番部落不同〉，《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06 年 1 月 18 日，版 5。
[28] 〈雜事／粵人嗜好〉，《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00 年 5 月 13 日，版 6。
[29] 藤上未成，〈福建人と廣東人（上）〉，《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9 月 12 日，版 5。
[30] 町田則文，〈臺灣に於ける創業時代の教育(承前)-言語研究の創始(承前) 〉，《臺灣協會會報》，第 53 期（明治 36 年 2 月，1903），頁 26。
[31] 小川尙義，《日臺大辭典》(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課，明治 40 年 3 月，1907-03)，頁 4。

東語の研究》等。[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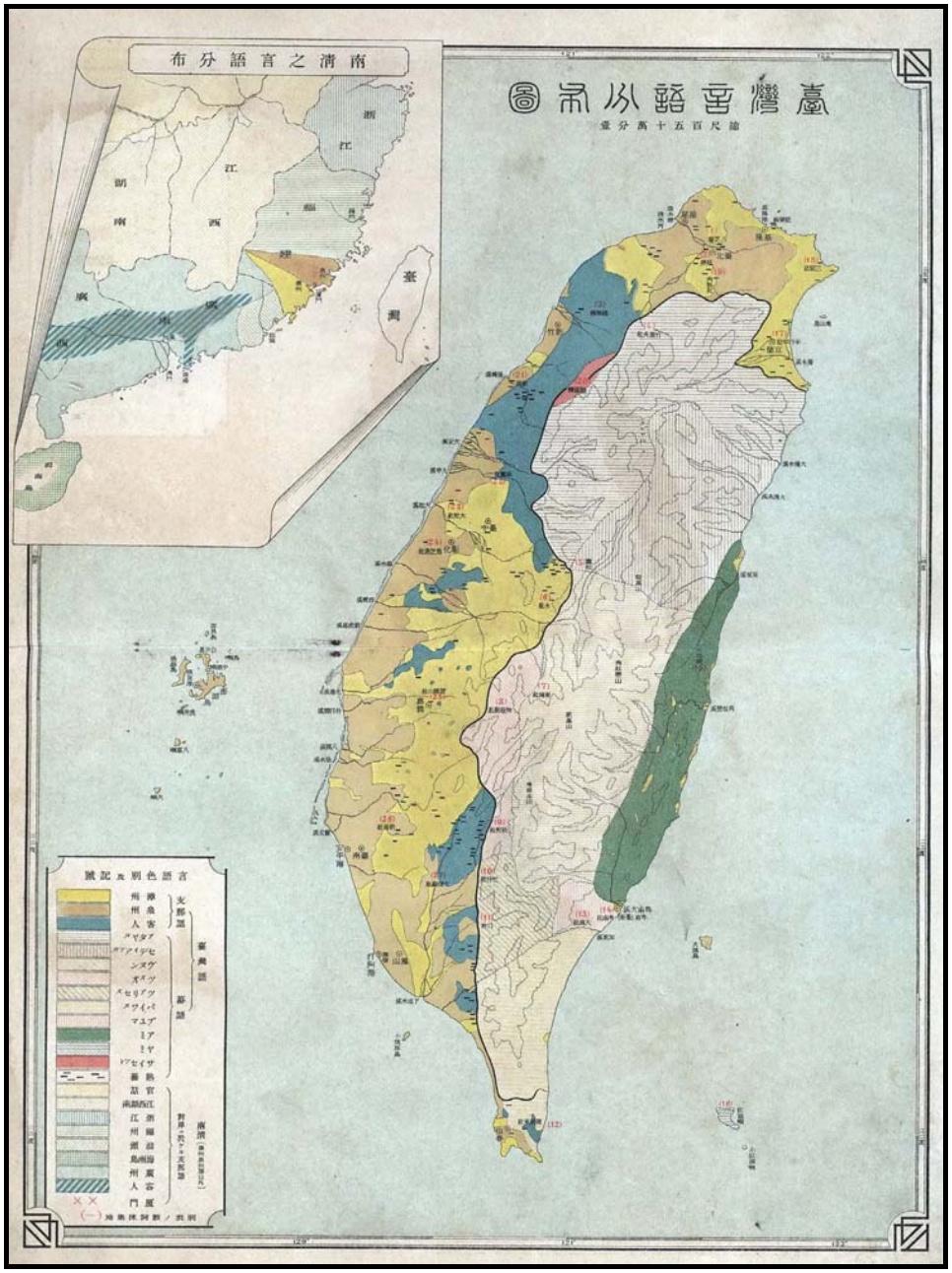


圖 3-3 臺灣言語分布圖（明治 40 年）

資料來源：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課，1907 年 3 月），附圖。

[32] 轉引自陳運棟，〈五十年來的臺灣客家研究〉，《臺灣文獻》，第 49 卷第 2 期（1998 年 6 月），頁 179。

然而畢竟，以廣東語稱客家話，是只有日治臺灣才有的認知，因此有時爲避免引起誤會，在臺的日人香坂順一在所著《廣東語の研究》時，在「緒言」的部分有如下的說明：

> 此外必需說明的是，本冊子的「廣東語」與臺灣所謂的「廣東語」不同，是指廣東省城語，也就是所謂的「廣州語」。而臺灣的「廣東語」，其實是指「客家語」，屬於中國方言系統的另外一支。[33]

也因此臺灣總督府在臺對客方言人群特殊的認定，使得在臺灣使用客語的人，一直認爲自己是「廣東人」，說的是「廣東語」，待有機會到了廣東，竟會發現自己聽不懂「廣東語」的奇怪場面：

> 地皆廣東語。與臺灣之廣東人全異。故余弗能通。幸二君操縱自如。余賴焉。[34]

1930 年代以來因應日本的南進政策和對華侵略的需要，日本方面開始對華南及南洋有顯著勢力的客家感到高度興趣。[35] 1929 年，臺籍客家人彭阿木受東亞同文書院委派，至廣東梅縣進行客家研究，原本打算循潮州─長樂─興寧─梅縣─陸豐之路線走訪，但因共產黨及匪患嚴重，只至潮梅二地。[36] 翌年他寫了兩篇以〈客家に就いての研究〉（客家之研究）爲名的論著，刊在東亞同文書院出版的《支那研究》上，內容長達 200 餘頁，[37] 是第一篇有關客家的日文長篇專著，出版時間早於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羅香林也曾對此二文加以評價，認爲雖頗病「駁雜無序」，然頗足引起日人對於客家問題的重視，算是一篇重要的文章。[38]

該文以梅縣地區爲中心，敘述了客家的由來、語言、習俗、族譜、人數及其分布，提到客家係自北方移住的漢民族之一支，一直以來受到土著的蔑視，且被認爲是非漢族的蠻族。也蒐集了大量作者最爲關心的客家山歌原始資料。值得肯定的是，彭阿木已指出當時的中國客家地域存在豐富的多樣性，如粵東（嘉應州一帶）與粵西（廣西東部、昭平、平樂一帶）的客家生

---

[33] 香坂順一，《廣東語の研究》（臺北：古亭書屋，1974 年），緒言，頁 1。
[34] 潤庵生，〈南清遊覽紀錄（五）〉，《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1 年 1 月 21 日，版 1。
[35] 廖赤陽，〈日本有關客家問題的研究與著述：漢族觀、中國觀、華僑觀與亞洲觀交錯的譜系〉，收入丘昌泰、蕭新煌主編，《客家族群與在地社會：臺灣與全球的經驗》（臺北：智勝文化，2007 年 11 月），頁 456。
[36] 彭阿木，〈客家に就いての研究〉，《支那研究》，第二十二期（昭和 5 年 1 月），頁 82。
[37] 彭阿木，〈客家に就いての研究〉，《支那研究》，第 22 號（1930 年 1 月），頁 77-183；〈客家に就いての研究（續）〉，《支那研究》，第 23 號（1930 年 7 月），頁 113-217。
[38]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1992），頁 8。

活存有相當大的差異等，他認爲即使是廣東省內，各地的客家從語言到生活習慣等均有很大的差異，不應用單一的標準和方法來研究錯綜複雜的中國。[39]

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於 1933 年出版後，任臺灣銀行科長的日人有元剛，鑒於當時日本大東亞戰爭勃發，國民逐漸關心及至南方，因此不得不重視在南洋華僑中頗有實力的客家，加之當時臺灣的客家也有數十萬，但對客家了解的人卻寥寥可數，可說「毫無認識」，因此乃於昭和 17 年（1942）將由因公至爪哇偶然取得的《客家研究導論》譯成日文，由臺北的吉村商會印刷所印製出版。[40] 此書在臺的流通量不高，但至少爲臺灣的客家人開了一扇窗，讓有機緣或管道的臺灣「廣東人」，藉此了解自己與「客家人」之間的關係。

日治期間，除了 1942 年《客家研究導論》日文譯本的帶臺發行，臺灣的廣東人也可藉由往返兩岸，而了解自己也可以被稱爲客家人。如吳濁流曾於 1940 年代赴大陸，在《臺灣連翹》中提到，曾在大陸參加過「旅京客家會」。[41] 隨著日治臺灣「客家知識」的開展，及兩岸可能的往返經驗，臺灣的「廣東人」逐漸認識到自己也可稱爲「客家人」，如 1944 年賴阿龍在《民俗臺灣》的一篇文章〈客家の婦人〉中提到：

> 臺灣客家族沒有很多，原本稱為「客人」，不知何時被稱為「廣東人」，或許由於他們多是廣東東部移來的關係，在大陸則被稱為「客家」，在中國南部，客家比本地人（真正的廣東族）晚到，故稱為客家，因此臺灣的廣東人與大陸的廣東人意思不同。[42]

由此，可以十分清楚地了解在臺客方言人群如何由被（福佬人）稱爲「客人」，到被（日本人）稱爲「廣東人」，以及知道中國大陸方面稱說客語的人爲「客家人」的認知過程，進一步也可明白，「客家」一詞對日治臺灣的客方言人群，還屬於「外來語」的層次，尚未成爲普遍的自我族群認定。

---

[39] 彭阿木，〈客家に就いての研究〉，《支那研究》，第 22 號（1930 年 1 月），頁 77-183；〈客家に就いての研究（續）〉，《支那研究》，第 23 號（1930 年 7 月），頁 113-217。廖赤陽，〈日本有關客家問題的研究與著述：漢族觀、中國觀、華僑觀與亞洲觀交錯的譜系〉，收入丘昌泰、蕭新煌主編，《客家族群與在地社會：臺灣與全球的經驗》（臺北：智勝文化，2007 年 11 月），頁 439-440。

[40] 羅香林著，有元剛譯，《客家研究導論》，上冊（臺北：吉村商會印刷所，1942 年 1 月），卷頭一言。在臺的流通版本，除此之外，要至 1975 年始由臺北古亭書屋印行出版中文本。

[41] 吳濁流，《臺灣連翹》（臺北：南方叢書出版社，1988 年 6 月），頁 129。

[42] 賴阿龍，〈客家の婦人〉，《民俗臺灣》，第 4 卷第 9 號（1944 年 9 月），頁 39。

四、戰後新成分客方言人群的加入

日治時期，雖然已有部分臺灣客方言人群知道自己的「廣東人」身分，亦可稱爲客家，但是對「客家」的理解，比較從外來語的角度看待，也因此，戰後的臺灣本島客方言人群，不僅經歷了從日本人變成中國人的國籍轉換，也經歷了從廣東人變成客家人的調整過程。這樣的過程，無疑即是中國對人群分類的理解，取代了日治臺灣的人群分類架構。這樣的轉換並非經過官方公開表述，比較可能是戰後來臺的新客方言人群所帶來的認知。1945 年之後新加入臺灣的客方言人群，可分爲半山客家與外省客家二種，以下分述之。

（一）半山客家

「半山」係指原本生長於臺灣，日治時代前往中國大陸尋求發展，在行動上擁護國民政府，並在戰後跟隨國民政府返臺的臺籍人士。由於這批臺籍人士具有中國經驗，被認爲是半個「唐山人」（臺灣人對中國大陸稱爲唐山），所以被稱爲「半山」。[1] 這些戰後返臺的半山當中，有不少是操客方言者，本文以半山客家稱之。半山客家的返臺主要集中在戰後初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展開接收臺灣之時期。

戰後，國民黨接收臺灣時，面對的是經過日本統治 50 年而他完全不熟悉的領土，爲了跨越這種陌生與鴻溝，國民黨在重慶作接收準備時，即盡量找幕下的臺灣籍人民委以重任，一方面參與接收臺灣的計劃，另一方面隨著接收政府來臺，把他們擺在國家機關的最前端，利用他們來作爲統治機關與臺灣社會的橋樑。因此戰後初期，有中國經驗的半山多能在黨政機關內占據要職，[2] 其中不乏操客家方言者。

戰後返臺的半山派，一般又可再細分爲游彌堅系、黃朝琴系、劉啓光系、李萬居系、王民寧系、連震東系、李友邦系、客家系等八個系屬。其中，客家系的主要領導人爲丘念台、劉兼善、黃國書，另被提及的同系重要成員還有徐言、翁鈐、鄒清之、鄒滌之等人。彼等均以客家人關係聯繫密切，互相

---

[1] 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臺北：時報文化，1995 年 2 月），頁 235；李筱峰，〈半山〉，《二二八事件辭典》（臺北：國史館，2008 年 2 月），頁 82-83。

[2]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陳儀治臺論〉，收於賴澤涵編，《臺灣光復初期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 年 11 月），頁 245、255。

標榜，而形成一派系。[3]

丘念台（1894-1967），原名伯琮、國琮或單名琮，臺中人，祖籍廣東蕉嶺，丘逢甲之子。1913 年赴日留學，1919 年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物理科，旋轉採礦科。1920 年在日組織「東寧學會」。中國七七事變發生後，以中山大學教授身分至廈門、汕頭宣傳抗日。1943 年中國國民黨在福建漳州成立臺灣直屬黨部，擔任執行委員。1944 年擔任臺灣調查委員會委員，進行戰後接收臺灣之準備。1945 年底出任監察委員。他認爲爲日軍工作的臺籍人士是出於被迫，不應以漢奸治罪，而向國民政府力爭。另外，他也反對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逮捕漢奸及頒布「臺灣省停止公權人登記規則」等作爲。1946 年 3 月返臺，[4]

劉兼善（1896-），屏東人，祖籍廣東梅縣，臺北國語學校畢業後，赴日本就讀早稻田大學，留日期間，曾與臺籍客家留學生及丘琮（念台）等人密切交往，組織「東寧學會」；1919 年畢業後即赴中國大陸，參與國民革命，在大陸期間曾任廣東公立法政學校教授、廣東大學教授兼註冊部主任、中山大學教授、廣東蕉嶺縣長、黃埔軍官學校教官、陸軍大學教官編譯官、國民政府參謀本部購料委員會委員、駐華美軍總部顧問等職。劉兼善在國民政府文官處人事調查表上自述「兼善祖籍廣東梅縣，生長於臺灣，少年時立志復興祖國，收復本省，而加盟革命。留日返國後，追隨先總理及黨國先進奔走革命，多歷年所」。1946 年受命爲臺灣省黨部執行委員，回臺服務，「極力宣揚中樞德意」，「故鄉父老以兼善離臺三十餘年，因本省光復，始得重還家園，至爲欣慰」。同年當選臺灣省參議會參議員，並任國立臺灣大學訓導長。[5]

---

[3]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陳儀治臺論〉，收於賴澤涵編，《臺灣光復初期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 年 11 月），頁 247、250-251。

[4] 丘念台曾於 1946 年 8 月籌組臺灣光復致敬團，與林獻堂等臺籍人士前往南京，企圖調和臺灣民間與政府歧見，以建立和諧的新關係。二二八事件後，他曾應國防部長白崇禧之邀返臺。時論認為丘氏對地方貢獻大，贏得「臺灣媽祖」美名。1947 年 7 月，出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1950 年 4 月，受聘為總統府資政，1953 年由於監委不能兼任資政，喪失資政名位，次年前往日本，試圖遊說主張「國際託管」和「臺灣獨立」的臺僑改變立場。1957 年被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並連任四屆中常委。陳保羅，〈丘念台身死功績在〉，《新聞天地》，1967 年 1 月 28 日，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檔號 129000100401A，丘念台（丘琮）；〈丘念台在日本因腦溢血逝世〉，《中央日報》，1967 年 1 月 13 日；薛化元，〈丘念台〉，《二二八事件辭典》，頁 80-81。

[5] 後歷任臺灣省政府委員、臺灣省銀行董事，1974 年遞補余登發，為第一屆國民大會臺灣省高雄縣代表。「國民政府文官處人事調查表：劉兼善」，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檔號 129000100385A；丘峻，〈國立中山大學設立之建議與籌辦──謹以創校五十週年紀念文籌建議人劉兼善教授八十大慶〉，《劉兼善先生八秩大慶祝壽冊》，頁 130-132；劉燕夫，〈劉兼善先生

黃國書（1905-1987），本名葉焱生，新竹人，公學校畢業後先後就讀過臺北師範學校與淡水中學，1921 年前往中國上海，考入暨南中學，旋復升入暨南大學政治經濟科。加入中國國民黨後，改名爲黃國書，經黨之保薦進入日本士官學校第十九期，繼入日本砲兵專科學校。返回中國後，任教於中央軍官學校，1934 年奉派赴歐美考察軍事，進入德國砲兵學校及法國戰術學院深造，從事砲兵戰術及高級軍事學之研究。中日戰爭中，任獨立砲兵團團長，升旅長、軍參謀長、副師長、師長、副軍長等職。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黃國書以九十軍中將副軍長身分回到臺灣，爲臺人在國民黨中官階最高者，任警備總部中將參議兼高參室主任。1946 年當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是制憲國大主席團中唯一的臺籍人士。二二八事件期間擔任臺中防衛區司令。1947 年黃國書當選立法委員。[6]

徐言（1910-），桃園人，北平朝陽大學法科經濟系畢，南京中央訓練團行政工作訓練班。於人事調查表上自述「竊言自曾祖父由廣東蕉嶺，來臺三代從商，家庭小康，言早年不甘日人統治，於 1926 年潛回大陸，接受祖國教育，在北平朝大畢業後，歷在政府機關服務，參加抗戰工作。臺灣光復後，始隨政府返臺」。[7]

翁鈐（1916-），桃園龍潭人。龍潭公學校畢業後，1930 年隨丘念台返中國大陸，就讀於丘氏所辦之工業專門學校臺灣華僑班，後考入廣東省立第一中學，後入北平匯文中學，畢業於北京大學農業土木系，再轉赴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深造。戰後返臺擔任臺灣大學農業工學教授，1948 年加入國民黨，入黨介紹人爲李翼中、莊鶴礽。1947 年任臺灣省政府民政廳副廳長，爲政府起用臺人最年輕者。[8]

八秩華誕徵文啟〉，《劉兼善先生八秩大慶祝壽冊》，頁 1-3。

[6] 1950 年與劉健群搭檔當選立法院副院長。1961 年當選立法院長，是第一位出任五院院長的臺籍人士。1972 年因家族經營之保險公司被法院宣告破產，黃國書遂辭去立法院長職務。簡太史，〈「地靈人傑」黃國書〉，《鈕司》，192 期，1952 年 10 月 30 日，頁 13、15；浩然，〈黃國書人以籍貴〉，《天文台》，1950 年 12 月 10 日，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檔號 129000104402A，黃國書；陳翠蓮，〈黃國書〉，《二二八事件辭典》，頁 494。

[7] 徐言初任職於臺灣省社會處，後歷任桃園縣長、新竹縣長。參見「總統府人事調查表：徐言」，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典藏號：129000100554A。

[8] 1949 年辭去臺灣省政府民政廳副廳長一職，出任畜產公司經理，後歷任水產公司經理、臺灣省政府委員、臺灣企業公司籌備處長、臺灣省政府民政廳長，並曾於 1961 年擔任臺北市中原客家聯誼會理事長，1977 年代理桃園縣長。《自由中國實業名人傳》，頁 81，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檔號 129000105319A，翁鈐（翁瑞棠）；簡太史，〈「英年俊發」翁鈐，臺灣時人春秋之四十二〉，《鈕司》，289 號（1958 年 7 月 21 日），頁 12-13；〈不倒翁收拾工礦官股〉，《世界新聞》，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檔號 129000105319A，翁鈐（翁瑞棠）；「國民政府文官處人事調查表：翁鈐」，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檔號 129000105319A，翁

鄒滌之（1907-），臺灣新竹人，橫山沙坑公學校畢業後即離開臺灣，赴中國大陸，考進江蘇省立第一中學，後進上海中國無線電專門學校，再入陸軍通信兵學校，畢業後進交通部服務。抗日戰爭期間，決定轉入革命行列，與長兄薌谿、四兄鄒洪、八弟鄒清之兄弟四人，共同參加抗戰工作，曾隨羅卓英隸戰湘粵邊區，頗著功績。戰後，出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旋與八弟清之相偕返臺，擔任茶葉公司總經理。[9]

鄒清之（1910-1966），臺灣新竹人，1929 年，隻身赴廣東投奔兄長，1935 年畢業於中央大學商學系，入交通銀行服務，中日戰爭期間投筆從戎，協助其兄鄒洪任部隊政治工作。其本人於人事調查表中自述「祖籍廣東五華，遷臺已逾五代，臺灣割讓日本，先父因參加新竹抗日役失敗，改名避居鄉間，務農爲業，惟仍恐被日政府查出後慘遭滅族之禍，乃自民前二年起……遣返祖國就業或就學，並參加革命與抗戰工作」，戰後曾任廣東省政府參議，並與丘念台等人組成臺灣同鄉會，協助處理遣送臺籍青年返鄉。1946 年 4 月返臺，結束「離臺二三十年而未與家人通訊」的遊子生涯。返臺後先任行政長官公署參議，並自組「臺灣旅外同鄉互助會」，自任理事長，資助流亡內地青年返臺事宜。二二八事件期間，曾奉命新竹地區勸導青年。事件後奉派出任新竹縣長。[10]

蘇紹文（1903-1996），臺灣新竹人。1922 年畢業於臺灣商工學校，1923 年進入中國北京大學預科肄業，後以中國學生身分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就讀。畢業後歷任陸軍軍官學校教官、航空委員會防空學校教官、陸軍砲兵學校教官、軍政部兵工署軍械司股長、軍政部第二軍械總庫庫長、中央訓練團教育委員會教官等軍職。1945 年 10 月出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第一處處長。1947 年 3 月初二二八事件蔓延全臺各地時，3 月 3 日新竹被劃爲防衛區，3 月 4 日，蘇氏出任新竹防衛司令兼代新竹縣長。1947 年 7 月調任臺灣全省

鈐（翁瑞棠）。「國民政府文官處人事登記補充片：翁鈐」，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檔號 129000105319A，翁鈐（翁瑞棠）；翁鈐，〈新春憶愛國老人丘念台上〉，《中央日報》，1967 年 2 月 18 日。

[9] 1957 年當選新竹縣長，1960 年縣長任滿後，就任石門地方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63 年調任石門水庫建設處長，退休後曾任國民大會代表、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僑務委員會顧問等職。參見〈鄒滌之先生事略〉，《國史擬傳》，第四輯，頁 8-16；西門大，〈鄒清之與鄒滌之〉，1960 年 4 月 1 日，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檔號 129000099170A。

[10] 1949 年 12 月，轉任臺灣省政府委員。1953 年受命擔任臺灣省政府民政廳長，翌年辭民政廳長兼職，仍任省府委員，並兼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委員等職。許今野，〈臺灣人物誌 19 鄒清之病誤前程〉，1955 年 12 月 10 日，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檔號 129000099170A，鄒清之；〈悼念本刊創始贊助人省府委員鄒清之先生〉，《中原文化叢書》，第 3 集，「客家掌故」，頁 107-108。

警備總司令部副參謀長。[11]

由於長期浸淫在國民黨的派系政府環境下，戰後返臺的半山積極於擴張派系勢力，在不斷席捲本土社會既有政治空間的過程中，迫使日治時代留在本島的菁英起而應戰，分別凝聚出「臺中派」與「阿海派」與之抗衡，而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12] 臺中派是以具有日據時代島內政治運動經驗者爲主，阿海派是日據時代的御用紳士與部份反日份子的結合（客家人彭德屬之），[13] 這三股地方派系或縱向與國民黨中央派系連結，如阿海派向 CC 派的李翼中靠攏，或橫向擴大拉攏其他派系成員。然而，由於各股地方派系的過度擴張，不僅背離了國民黨中央原來設定的目的，更帶來嚴重的派系衝突，惡化了島內的政治生態環境，甚至釀成二二八事件。在國民黨撤退來臺，重建威權統治的時期，成爲被整肅的對象。[14]

政府遷臺後，在站穩腳步未久，即開始展開對地方派系的打壓。半山派的游彌堅、劉啓光、李萬居、黃朝琴等人，相繼失勢。[15] 臺中派與阿海派的處境也相差無幾，都遭到削弱拔除的命運。於是逐步地，戰後初期所結成的本島三大派系，日漸式微。

然而因爲這時國民黨政權剛從大陸撤退來臺，正值風雨飄搖時刻，不能沒有本土勢力的支持，在這種現實政治的考慮下，仍需倚仗半山以爲媒介，尤其在必須與臺灣地方社會直接接觸的縣市首長或地方選舉等部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比較讓當局相信的半山可以製造重用本省人的假象。

如二二八事件期間，蘇紹文以新竹防衛司令身分兼代新竹市長；二二八事變平定後，鄒清之奉派接替朱文伯，出任新竹縣長。[16] 1946 年 5 月劉兼

---

[11] 1947 年 11 月，當選為新竹地區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此後歷任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第四處處長、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監察處處長、國防部參事等軍職，1962 年 11 月借調為臺灣省政府委員，至 1972 年 7 月，在臺灣省政府委員任內退休。許進發，〈蘇紹文〉，228。

[12]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陳儀治臺論〉，收於賴澤涵編，《臺灣光復初期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 年 11 月），頁 246。

[13]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臺北：月旦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133。

[14]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臺北：月旦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134。

[15] 陳明通指出，如游彌堅被迫辭去臺北市長職位，出任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終其一生未再擔任任何重要政治職位。劉啟光亦在 1951 年 12 月競選第一屆臨時省議會副議長時遭到重挫，1953 年 4 月雖出任省府委員，但不久即於 1954 年受責於輔選不力，遭免去最後的省府委員一職，終生以「了然居士」自居，充滿自我嘲弄的消沈意識。參見陳明通，〈派系政治與陳儀治臺論〉，收於賴澤涵編，《臺灣光復初期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 年 11 月），頁 282。

[16] 許今野，〈臺灣人物誌 19 鄒清之病誤前程〉，《？》408 期，1955 年 12 月 10 日，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檔號 129000099170A，鄒清之。

善當選臺灣省參議員。同年 10 月，蘇紹文代表新竹市獲省參議員選舉爲制憲國大代表。蘇紹文並於 1947 年 11 月當選以直接普選方式選出之第一屆國大代表。1948 年 1 月，黃國書當選立法委員，丘念台則當選監察委員。1950 年 8 月，臺灣省進行行政區域調整，徐言擔任新制實施後的桃園縣長。

除了擁有在中國革命抗戰的經驗，及臺灣本土人脈資源外，政府選擇哪些半山加以拔擢重用，主要考量的重點在於其是否忠貞。

半山客家黃國書於 1947 年當選唯一的臺籍立委，1950 年能獲拔擢擔任立法院副院長。當時的輿論多認爲其所憑藉的，就是他的臺籍身分。如一則刊在《天文台》的〈黃國書人以籍貫〉是這麼寫的：

> 如在平時，恐怕這一輩子都難有這個希望罷！所幸國民黨今日之所以能偏安一隅，全靠寶島的天賜，單憑這點，國民黨用人行政就得要就地取材，何況正是臺灣鬧「中立化」的時候，更非扶植臺人不可。在這種新形勢之下，逐漸被重用，而出任立法院副院長，誠可謂「天官賜福」。[17]

該文的撰者並表示，國民黨政府撤守臺灣後，由於黃國書的「半山」身分，得「內地人和臺人之間充橋樑」，自讓高層對他自是另眼相看。

究其實，黃國書之所以獲高層重用，更重要的應是他的政治態度讓高層放心之故。一則以〈黃國書的派系〉爲名的短評，提到黃氏雖是臺灣籍貫，但「和中央的關係很深」，「黃氏的思想是絕對傾向中央的」，在當時許多臺籍立委個個都是「託管」的相思病患者時，「只有黃國書是擁護反共抗俄的臺籍立委」，所以決定由他出任立法院副院長了。[18] 另一則〈應運而興的黃國書〉也表示，目前國民黨政府在臺灣，遇事都得要尊重臺人幾分，再不像從前那般一手包辦。黃國書在臺籍立委中，是屬于「政府派」的人物，「國語說得流利，太太是南京人，他的生活習慣和內地一樣」。[19]

除了黃國書之外，半山客家翁鈐於 1958 年「以三十九歲即貴躋省府委員，英年俊發」，也被認爲是當時「臺灣客家集團少壯派重要人物」。[20] 而

---

[17] 浩然，〈黃國書人以籍貫〉，《天文台》，1950 年 12 月 10 日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檔號 129000104402A，黃國書。

[18] 黃鐘，〈黃國書的派系〉，《上海日報》，1950 年 12 月 23 日，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檔號 129000104402A，黃國書。

[19] 山川，〈黃國書舉止闊綽〉，《星島晚報》，1950 年 9 月 30 日，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檔號 129000104402A，黃國書。

[20] 簡太史，〈「英年俊發」翁鈐，臺灣時人春秋之四十二〉，《鈕司》289 號，1958 年 7 月 21 日，頁 12-13，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檔號 129000105319A，翁鈐（翁瑞棠）。

由當局對半山客家鄒清之的評語是「幼年由臺灣逃回祖國，有國家民族思想，爲臺籍中可培植之幹部」。[21] 也可藉此了解其任用臺籍人士之標準。

（二）外省客家

外省人的遷臺則可以 1949 年政府遷臺爲界，略分爲兩個區段。第一個區段從 1945 年 8 月至 1949 年 12 月，以日本戰敗爲契機，由國府派遣而進入臺灣，以負責接收事宜及相關人士爲主。中日戰爭結束後，隨著陳儀的主理臺灣政事，國民黨政權既有的政治特質立即投射到這塊新接收的版圖上，黨內主要的政治派系如 CC 派、團派、政學系、孔宋集團、中統、軍統等皆開始在臺布置人事，[22] 這些初期來臺負責接收事宜的外省人當中，不乏客家，如以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身分來臺的柯遠芬[23]，原籍廣東梅縣，屬軍統，擔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的李翼中[24]，原籍亦廣東梅縣，則被認爲屬於 CC 派。此二人來臺後的客家身分表露的頗爲明顯，如柯遠芬曾表示，由於臺灣同胞多屬閩南語系與客家語系，因此曾於 1945 年 9 月幫當時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臺灣警備總司令陳儀將對臺灣同胞宣講的廣播詞「翻譯成客家語」。[25] 而當時李翼中主持的臺灣省黨部成員多爲外省客家，如吳濁流曾言，李翼中後來擔任臺灣省政府社會處處長時，所用職員幾乎都是來自省黨部的李翼中舊部，以外省客家人居多，[26] 其中包括當時擔任黨部

---

[21] 革命實踐研究院第十一期研究員結業成績登記表，學號 11009，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檔號 129000099170A，鄒清之。

[22]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臺北：月旦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133。

[23] 柯遠芬（1909-1996），家名桂榮，字遠芬，別號為之，廣東梅縣人。1926 年考入黃埔軍官學校第四期，畢業後參加北伐，1937 年升少將參謀處長，次年調福建省保安處參謀長，獲陳儀賞識。1941 年，柯遠芬奉調重慶國防研究院第一期研究，1944 年結業，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少將參謀，後經陳儀邀請，調派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並晉升中將。1949 年柯遠芬復派為廣東第二編練司令部副司令、十二兵團副司令，又在臺灣新埔鎮辦怒潮軍政學校任校長，儲訓軍政幹部，旋調金門防衛司令部副司令，歷經 1958 年的八二三砲戰。1967 年調派駐越南軍援團中將團長，任期滿又調總統府戰略顧問，1974 年屆齡退休。陳翠蓮，〈柯遠芬〉，《二二八事件辭典》，頁 280-281。

[24] 李翼中（1896-1969），廣東梅縣人，廣東中山大學畢業，1945 年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隨即奉派來臺。1947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擔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長官公署改組為臺灣省政府後，李翼中擔任臺灣省政府省府委員兼社會處處長，1952 年辭處長一職後，兼合管處處長及勞保會主委。之後曾任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臺灣銀行顧問等職務。「中央訓練團學員自傳」，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檔號 129000102681A，李翼中；何力友，〈李翼中〉，《二二八事件辭典》，頁 180-181。

[25] 柯遠芬，〈臺灣二二八事變之真相〉，收入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

[26] 吳濁流，《臺灣連翹》（臺北：南方叢書出版社，1988 年 6 月），頁 242。

組訓處處長的廣東蕉嶺人徐白光[27]。

外省移民來臺的第二個區段，係指於 1948 年末至 1949 年底政府遷臺前後，因預測內戰即將敗退，或者由於戰敗而不得不撤退臺灣的人潮，以軍事、政治、公家單位相關人士爲主流，當然還包括許多自行來臺的平民百姓，幾含括中國各省移民。據大略估計，1950 年末時，遷台的人口數中，軍人有 60 萬，其他則有 140 萬，合計約 200 萬人。就兩批人口數量而言，前者是小波，後者爲大浪。[28]

此外，除了直接由大陸遷臺者外，亦有不少外省客家先以香港爲據點，再輾轉來臺，如 1947 年膺選爲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後因故讓出，退居第一候補的廣東興寧人劉偉崧，於 1949 年由廣州逃抵香港，在港期間頗爲落魄，「身邊連一毛錢之巴士車費，亦難得有」，後於 1954 年遞補爲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方由港來臺就任。[29] 又如曾任廣東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五華、豐順縣縣長的廣東蕉嶺人丘式如，於 1949 年先赴香港，1952 年來臺，曾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30] 廣東興寧人劉慶瑄則於 1950 年冬方隻身逃到香港，1951 年由於雷震去香港招收逃港忠貞學人，乃乘機來臺，於省立員林高中擔任國文老師，任教達十餘年。[31]

表 4-1 戰後初期來臺外省客家簡歷

姓名	原籍	來臺後履歷	大陸時期履歷	出處

[27] 徐白光（1893-1966），廣東蕉嶺人。上海南洋大學肄業，曾於蕉嶺中學任教，後赴南洋鼓吹革命，1933 年返國，參與江西剿匪，由上尉升至中校參謀，後改調軍委會上校科長少將副處長，中日戰爭期間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統計局交通處處長，為中國國民黨內 CC 派之成員。戰後，隨李翼中、丘念台等人來臺，擔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組訓處處長。二二八事件期間曾列入逮捕對象。1950 年因沾疾調養，辭去各職，改任僑務委員會顧問，並發起籌組蕉嶺同鄉會。何義麟，〈徐白光〉，《二二八事件辭典》，頁 305。為籌組蕉嶺同鄉會，曾趁赴南洋印尼慰問僑胞之便，乃以生平丹青傑作展出，所得數萬圓，作為建築台北蕉嶺同鄉會會所之用。1966 年因病辭世，享年 74 歲。參見陳公愚，〈徐故理事長白光傳〉，《臺北市蕉嶺同鄉會 22 週年年刊》，頁 62-63。

[28] 戴國煇，〈漢族系住民的語言與歷史〉，戴國煇全集 9，《史學與臺灣研究》，卷九（臺北：遠流，2011 年 4 月），頁 25；戴國煇，〈何謂臺灣人及臺灣〉，《戴國煇文集 7．臺灣近百年史的曲折路──「寧靜革命」的來龍去脈》（臺北：遠流、南天，2002 年 4 月），頁 19。

[29] 「故國民大會代表劉偉崧先生事略」，國史館藏，《個人史料》，〈劉偉崧〉，典藏號：1280021430001A；「國民政府文官處人事登記補充片：劉偉崧」，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劉偉崧〉，典藏號：129000115113A；劉偉崧，〈有關同鄉會之回憶──事在人為〉，臺北市興寧同鄉會編，《臺北市興寧同鄉會會刊》，第 1 期（1985 年 2 月），頁 26。。

[30] 「丘故委員式如先生事略」，國史館藏，《個人史料》，〈丘式如〉，典藏號：128037170001A。

[31] 蘇信若，〈懷念劉公慶瑄先生逝世二十週年〉，臺北市興寧同鄉會編，《臺北市興寧同鄉會會刊》，第 2 期（1986 年 2 月），頁 36。

吳克英	廣東大埔	花蓮市長、臺灣省政府財政廳專員、民政廳秘書、專門委員、財政廳專門委員、臺灣省生產建設事業基金管理委員會秘書、臺灣土地銀行主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秘書長	曾任廣東省政府秘書、廣東省乳源縣縣長、廣州綏靖公署參議	國史館侍從室
李加勉	廣東大埔		廣州特別市黨部秘書科長、大埔、瓊東等縣政府秘書、文昌縣代理縣長、港澳總支部設計委員、僑務委員會專員、交通部秘書廳第三組組長、廣東省政府顧問	
范錡	廣東大埔	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授、南洋大學教育系主任	曾任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專門委員、清華及北大教授、中山大學教授兼圖書館館長、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國立南洋大學教授兼訓導長	國史館侍從室
張兆符	廣東大埔	國民大會代表、臺灣省立法商學院、輔仁大學教授、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	財政部粵贛區直接稅局副局長、財政部廣東區直接稅局局長、廣東省財務人員考試處長	國史館侍從室
郭壽華	廣東大埔	國防部總政治部少將第二處處長	廣東省湛江市首任簡任市長、國防部少將專員、軍統局臺灣站長兼臺灣省黨政部聯合秘書處主任秘書、國防部新聞局少將處長	國史館個人檔案
曾定一	廣東大埔	銓敘部科長、秘書、視察、專門委員、參事	國民政府秘書、財政部貿易委員會研究專員、廣東省府參議、重慶市社會局技正	國史館侍從室
黃壁壘	廣東大埔	鳳山步兵學校戰術教官、屏東縣立長治中學教師		
鄒魯	廣東大埔	監察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	廣東北伐軍姚雨平軍之兵站總監、國會眾議院議員、廣東鹽運使、大總統特派員授以特任將帥之權、財政廳長、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校長、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國立廣東大學籌備主任、校長、二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國立中山大學校長	自由中國名人傳
劉旭輝	廣東大埔	臺灣電力公司技術委員會管理師、臺灣省碱業有限公司監察人、臺灣電力公司公共關係室主任、總統府參事	曾任中央訓練團特別黨部書記長、第六戰區黨政分會黨務處、湖南省政府秘書長、廣東省政府顧問	國史館侍從室

劉禹輪	廣東大埔	苗栗縣立大湖專校實習主任、臺灣省苗栗縣立後龍初級中學校長	中央黨部組委會總幹事、廣東省豐順縣縣長、廣東省政府農林處副處長、廣東省黨部監委	
劉煒	廣東大埔	憲兵司令部司令、國家安全局中將設計委員	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排長、第一軍憲兵營三連連長、憲兵第二團二營六連少校連長、憲兵第五團一營中校營長、憲兵訓練所學員隊隊長兼軍士大隊大隊長、憲兵教導團中校團附、憲兵補充團上校團長、憲兵第五團上校團長、傷兵管理處處長、憲兵學校研究委員少將、憲兵第五團少將團長、憲兵司令部少將參謀長、江西上饒、憲兵東南區司令部少將司令、憲兵司令部副司令、中將	台灣三百年軍事人物
賴少魂	廣東大埔	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光復大陸設計委員	報館主編、社長、廣州市、廣東省、臺北市、臺灣省暨全國中醫師公會理事長、廣州市參議員	中華民國詩人名鑑
戴毅	廣東大埔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中董事	第六戰區幹訓團政治部教官、鄂湘川黔邊區清剿總部辦公廳主任、八十七軍秘書	國史館侍從室
藍萼洲	廣東大埔	國防部政工處同少將專員、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政工處少將副處長、國防部少將參議、中國國民黨臺灣省改造委員、臺灣省政府委員、臺灣省倉庫公司總經理、兼第一銀行官股董事、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組長		大埔會刊
羅卓英	廣東大埔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國防研究院副主任	大埔中學教務主任、湖山官學校長、潮梅軍少校參謀、第一師炮兵連連長、炮兵副營長、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師參謀處長、浙江營備師上校團長、陸軍第十一師參謀長、陸軍第十一師第三十三旅旅長、副師長、第十八軍十一師師長、第十八軍副軍長、第五軍軍長、第十八軍副軍長、軍長、陸軍中將、粵漢鐵路司令、廣州行營參謀長、第十五兵團司令、武漢警備總司令、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遠征軍司令長官、軍事委員會軍令部次長、訓練團教育長、軍事委員會訓練總監、青年軍總監、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廣東省政府主席、陸軍上將、東北行轅副主任	台灣三百年軍事人物
李大超	廣東五華	制憲國大代表、中國國民外交協會常務理事兼秘書長、行政院設計委員、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理事、華僑救國聯合會常務理事、中華民國工業總會理事長	國民黨廣州市黨部委員、廣東省政府顧問、國民黨第 6 屆中央執行委員	國史館人名權威查詢系統

李國俊	廣東五華	上士、率部整修砲兵陣地		中華民國國軍英雄傳
張輔邦	廣東五華	陸軍少將、國民大會代表、光復大陸設計委員		
陳槃	廣東五華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臺灣大學教授		
余俊賢	廣東平遠	監察委員、監察院院長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海外科長、南洋荷屬總支部常務委員、荷屬民國日報總編輯、第五、六兩屆中央執行委員、廣州特別市黨部常務委員、廣東省黨部常務委員、僑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僑教處長、僑民教育師資訓練所所長、國立南洋研究所總幹事、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廣東省黨部主任委員	監察院第一屆監察委員名鑑
李樹賢	廣東平遠	臺灣省政府社會處視導		臺灣省各機關職員錄
林乾祜	廣東平遠	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苗栗大湖中學、竹南中學校長、桃園縣政府教育科長	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執行委員書記長、僑務委員會交通部善後救濟總署科長、南洋研究所秘書、廣東省立老隆師範學校	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名錄
姚朝卿	廣東平遠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地政局估計專員、臺灣省屏東市政府地政科科長	廣東民政、財政廳、測糧隊分隊長、江西地政局測量隊組長、信豐縣地籍整理處副處長	臺灣省各機關職員錄
陳瑞鵬	廣東平遠	臺灣省政府社會處秘書		臺灣省各機關職員錄
黃道宜	廣東平遠	屏東農田水利會會長、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組長、屏東山地治安指揮所副指揮官、臺東縣政府主任秘書、屏東縣水利管理處處長		南臺灣人物誌
劉達梅	廣東平遠	臺灣省政府民政廳專員		臺灣省各機關職員錄
王俊生	廣東梅縣	臺北市梅縣同鄉會第一屆監事	福建永定、龍溪、上杭縣長、福建省政府參議	國史館侍從室
江文苑	廣東梅縣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技正、臺灣省物資局高雄辦事處處長、專門委員、臺灣省物資局基隆辦事處處長、臺灣省物資局第二、四處處長	湖南省貿易局專員、衡陽友聯化工廠工程師	國史館侍從室
何舉帆	廣東梅縣	臺灣省糧食局主任秘書、屏東市長、行政院參議、經濟部主任秘書、臺灣省糧食局副局長、臺灣工礦公司董事、臺灣省物資局局長	福建省水警第二大隊會計主任，廈門市財政局課長，福建省捲菸公賣局會計主任，福州稅務局主任秘書，福建省貿易公司峰市、漳州、韶關等辦事處主任、福建平和、南靖、永春等縣田糧管理處處長、永安縣政府主任秘書	國史館侍從室

李翼中	廣東梅縣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臺灣省政府委員兼社會處長	中國國民黨青島、漢口、特別市黨部黨務整理委員、中國國民黨北寧、平綏、河北、北平、天津等路省市黨部黨務整理委員、江蘇省政府科長、中央社會部總務處長、主任秘書、交通部簡任秘書	台灣省首屆民選縣市長紀念冊
杜濂	廣東梅縣	臺灣省民營企業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臺灣省各機關職員錄
張炎元	廣東梅縣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主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二組所屬南方執行部第四組組長、國防部情報局中將局長、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二組主任、國民黨海外工作統一委員會秘書長、國民黨第十屆候補中央委員、中越文化經濟協會常務理事、全國足球協會主任委員、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西南傳輸處少將副處長兼警衛稽查室主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副處長、南京公路總局副局長、國防部第二廳一處處長、國防部第二廳副廳長、廣東省警保處少將處長、廣東省保安副司令、保密局東南執行部組織部長、粵東區反共救國軍總指揮、	台灣三百年軍事人物
張偉才	廣東梅縣	華海貿易行經理、國寶製煉油漆廠總經理		
張耀君	廣東梅縣	臺灣省民營企業輔導委員會組長		臺灣省各機關職員錄
張騰發	廣東梅縣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工礦處秘書、臺灣省民營企業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華日報董事兼主筆、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副廳長、監察委員	廣東梅縣民國日報編輯、軍事委員會西南運輸處教官、股長、國民革命軍第七十六軍上校秘書、公路總局專員、編輯室主任、中央訓練團編審委員	臺灣省各機關職員錄
曾舉直	廣東梅縣	省立苗栗中學出納組長、苗栗縣文獻委員會編纂組長	廣東省第六清剿區司令官、廣東省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	國史館侍從室
黃鎮球	廣東梅縣	國防部戰略顧問、陸軍二級上將	代理副官長、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十一師三十三團團長、瓊崖警備司令、第四軍廿六師師長、總司令、十一旅旅長、防空學校校長、防空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防空處處長、首都防空副司令、廳長、後方勤務總司令、聯合勤務總司令、廣州綏靖公署副主任兼代廣東保安司令	自由中國名人傳
鍾皎光	廣東梅縣	臺灣大學工學院教授、院長、教育部政務次長、教育部長、行政院政務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考選部長		國史館侍從室
馮愛群	廣東連平	陸軍總司令部總司令辦公室第三組組長、僑務委員會秘書	陸軍訓練司令專員	國史館侍從室
陳拱初	廣東陸豐	桃園縣立新屋中學教師	陸豐縣參議會第一屆參議員	
何蔚	廣東興寧	最高法院臺灣分庭庭長	最高法院廣州分庭庭長	國史館侍從室

曾雄	廣東興寧	增額立法委員		
劉偉崧	廣東興寧	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軍師政治部秘書、市政府參事、豐順順德廣州梅縣各地方法院推事院長、軍法處長、廣東省幹訓團研究員、廣東省政府田賦督導、巡迴視察參議、廣東省會警察局司法科長	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名錄
潘煥昆	廣東興寧		中華民國發行公信會董事長、新聞評議基金會董事長、新聞評議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通訊社編譯部副主任、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中央通訊社編譯部主任、中央日報副總編輯、亞洲生產力組織新聞處長、中央日報主筆、經濟部顧問、中央日報副社長、社長、中央通訊社社長	中華民國名人錄 1999
丘式如	廣東蕉嶺	輔仁大學副教授、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	汕頭嶺東日報副刊主任、覺民中學訓育主任、中央黨部專門委員、國民政府秘書、廣東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豐順五華兩縣縣長、廣東國民大學教授	
林華	廣東蕉嶺	警備總部軍需補給組長、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建設科違章建築管理處		臺北市蕉嶺同鄉會年刊
徐白光	廣東蕉嶺	臺灣省黨部組訓處處長		臺灣省各機關職員錄
徐彩慶	廣東蕉嶺	臺灣省政府社會處第四科科員		臺灣省各機關職員錄
張振崑	廣東蕉嶺	臺灣省政府社會處第三科運動股長		臺灣省各機關職員錄
陳公愚	廣東蕉嶺	臺灣省黨部幹事、電影公司總務組長、臺中市黨部秘書、東勢區署總務課長、臺中縣政府秘書室文書股長、苗栗三義鄉公所課、中壢坤慶紡織公司總務、臺東縣東河鄉公所課長		
曾松友	廣東蕉嶺	臺中市中教員、臺中省立第二中學教務主任、總政治部幹部訓練班教務、訓導組長		臺北市蕉嶺同鄉會 22 週年年刊
鍾自若	廣東蕉嶺	臺灣省黨部委員		臺灣省各機關職員錄
蘇聯騏	福建永定	中統局臺灣省室、臺灣省黨部通訊組總務科長、臺灣省政府社會處、警務處、內政部警政署出入境管理局	福建省保安第三團少尉分隊長、福建省商業人員養成所少校軍事校官	國史館侍從室

康瀚	福建長汀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技正兼臺北山林管理所長		臺灣省各機關職員錄
曾國光	福建武平	臺灣省政府社會處視導		臺灣省各機關職員錄
黃士清	福建長汀	臺中州接管會專員、三民主義青年團臺北分團幹事、臺灣省工業研究所秘書、臺灣省政府統計處第四科科長、臺北縣黨部副書記長、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科長、臺北市政府秘書處秘書	福建南平縣政府科長、區長、連城縣政府秘書、長汀縣訓練所教育長、古田縣田糧處副處長、福建省糧政局視察、福建省政府自治視導員	國史館侍從室
戴仲玉	福建長汀	第一屆國大代表、僑務委員會委員、福建省政府委員、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福建省主席	福建省永安、龍溪、建甌等縣縣長、福建省幹部訓練所少將教育長、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福建省黨部副主委、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賴文清	福建長汀	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	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部委員兼書記長、福建省政府統計長、福建中央日報常務董事、福州正義日報董事長、廈門思明民報社長、香港東方日報主任編輯、中央黨部直屬香港支部委員、三民主義青年團港澳支團幹事、香港大誠中學校長、福建旅港同鄉會副會長	

說　　明：本表人物之擇選，主要以可以識別客家身分之同鄉會成員，或參與第二次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之委員為主，並以目前為止能掌握相關履歷資料者為限。

由上表觀之，1949 年後隨政府遷臺而來的外省客家中，有許多居黨政軍要職者，如軍事方面有廣東大埔的羅卓英，1947 年調任東北行轅副主任，並膺選爲第一屆國大代表，1949 年出任東南軍政副長官，後隨政府遷臺，1950 年任總統府戰略顧問，旋自請退爲備役。[32] 曾任制憲國大代表方有賴文清（福建長汀）、李大超（廣東五華），任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的有張輔邦（廣東五華）、劉偉崧（廣東興寧）、林乾祜（廣東平遠）、賴少魂（廣東大埔）等。

外省客家除多位居中央及省層級的行政機關外，由於能諳客家話，因此也有被安排至地方服務者，1950 年 8 月臺灣省行政區域調整後，各縣市官派地方長官有不少是外省客家，如 1949 年因「大陸局勢逆轉，本漢賊不兩立之誓，間關由粵來臺」[33] 的吳克英被派任爲花蓮市長，原籍廣東大埔的吳

[32] 姚恕，〈陳誠揮淚哭尤兄〉，《新聞天地》，1961 年 11 月 25 日。羅香林，〈羅卓英先生行狀〉，收於《羅卓英將軍紀念集》，頁 51-55。

[33] 「公務人員履歷表：吳克英」，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典藏號：129000104770A。

克英，母語是客家話，但也能通粵語與閩南語。[34]

此外，原籍梅縣的何舉帆，則被派爲屏東市長。何舉帆的母語是客家話，且由於曾在漳州及廈門求學，因此也精通閩南語，他先在臺灣省首屆縣長考試，獲中第一名，因此在屏東，「由市長而縣長，足足幹了三年多」，[35] 何舉帆自己曾表示「與本省同胞毫無隔閡之感，相反的還覺得特別親切，有許多意見可以直接表達」，[36] 能與本省同胞溝通無礙，應即何舉帆能被派赴地方服務以及勝任愉快的主要原因。

戰後由中國大陸遷居臺灣的外省客家當中，除了上述隨政府來臺的軍公教人階層之外，還有更多數是自行設法來臺的平民百姓，而他們也是最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一群。如彭芊琪以原籍廣東陸豐的莊氏宗親會爲主題的研究發現，戰後來臺的莊氏宗親會成員，多數是 1948 年從廣東省陸豐縣上沙鄉自行來臺的百姓，陸豐上沙鄉原本皆爲莊姓聚落，許多宗親在戰前已散居臺灣，因此他們多循著宗親的系譜網絡，形成一種鎖鍊關係，一個拉一個來到臺灣，來臺後多定居於苗栗縣獅頭山，從事煤礦的工作。此外還有少部分是 1949 年隨政府來臺的軍公人員，以及戰亂時先到香港，1950、1960 年代再到臺灣者。[37]

這些自行來臺的外省客家，與其他隨政府遷臺的軍公教階層有著截然的不同，他們以百姓身份移入，在工作和居住上沒有政府的協助，抵臺後無可避免地必須深入到臺灣最底層的社會，不論在生活或工作上，與臺灣人有最直接的接觸。由於生活的周圍都是臺灣的客家人，比較沒有語言溝通的問題，凡此，皆促使他們較易與臺灣人通婚及本土化。[38]

這些外省客家來臺後，由於兩岸敵對緊張之局勢，使得他們與原鄉中斷聯繫，因而特別有結社互助之需求。[39] 戰後初期各省縣在臺北市所設同鄉會屈指可數，然 1949 年末政府遷臺之後，外省同鄉會乃蓬勃發展。[40] 外省移民來臺後組織同鄉會，除聯絡鄉誼與互相濟助與慰藉之外，更有配合政府反

---

[34] 「公務人員履歷表：吳克英」，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典藏號：129000104770A。
[35] 《新聞觀察》，年月日。
[36] 何舉帆，〈所謂省籍問題〉，《中央日報》，1979 年 6 月 5 日。
[37] 彭芊琪，〈外省客家人的本土化：以廣東陸豐莊氏宗親會為例〉（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2005 年 12 月），頁 3、39。
[38] 彭芊琪，〈外省客家人的本土化：以廣東陸豐莊氏宗親會為例〉（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2005 年 12 月），頁 47、52、67。
[39] 彭欽清，〈臺灣客家社團之發展〉，收於徐正光等，《臺灣客家族群史・社會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 年 12 月），頁 118-184。
[40] 鍾艷攸，〈政治性移民的互助組織──臺北市之外省同鄉會（1946-1995）〉，頁 57。

攻決策，以謀歸家園，完成救鄉復國之使命。[41] 如《大埔會刊》創刊的卷首語所言，「且喜鄉音未改，大家異地相逢，自然倍加親熱，況值風雨雞鳴的時際，益深同舟共濟的感覺」。[42]

表 4-2 戰後以來外省客家所組之同鄉會

名稱	成立時間	成立初期主要成員
臺北市平遠同鄉會	1949/06	陳瑞鵬、陳瑞鵬、劉達梅、李樹賢、黃道宜、姚建民、李玉章、朱浩懷、姚朝卿、張冠英、楊政民、林乾祜
臺北市梅縣同鄉會	1951	李翼中、王俊生、鍾皎光、鄒志奮、張騰發、曾舉直、章勳義
臺北市五華同鄉會	1954/01	張輔邦、李大超、魏漢喬、陳槃、李國俊、繆任仁、古煥謨、鍾正君、李興民、張文俊、魏兆霖
臺北市蕉嶺同鄉會	1954/01	徐白光、陳康壽、陳景雲、羅享錦、徐德芳、丘式如、鍾自若、張振崑、黃衍、鄧越今、徐治裕、廖志文、謝韜、林輝、劉健、徐起員、吳宏淵、黃聲達、陳慕農、黃蟠普、黃國村、徐彩慶、鍾永禎、黃石中、曾繁炎、鍾恩仁、陳恩藩
臺北市興寧同鄉會	1955/02	陳茹玄、陳宇飛、何蔚、羅鴻詔、蕭蔚民、劉又軍、陳錫洪、蕭冀勉、李寶源、劉偉崧、黃榮、曾魯、劉昆祥、高亞偉、曾繁平、曾憲臣、李純風、陳宇飛、張浩東、劉偉崧、曾雄、黃榮、潘煥昆
臺北市福建長汀同鄉會	1958/11	賴鴻林、張仲藻、黃士清、陳梅洲、林希清
臺北市惠州同鄉會	1960/02	
臺北市大埔同鄉會	1964	鄒魯、羅卓英、賴少魂、藍萼洲、郭壽華
臺北市博羅同鄉會	1966/01	王德時、韓繼旺、黃承業、謝柱煥、謝瑞麟、陳智明、李海珠、陳甫良、徐祖欽
臺北市永定同鄉會	1970/07	
臺北市武平同鄉會	1978/02	

資料來源：張泰祥主編，《中華民國五十年來民眾團體》（臺北：中華民國民眾團體活動中心，1961年6月），頁906-907；彭欽清，〈臺灣客家社團之發展〉，收於徐正光等，《臺灣客家族群史・社會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年12月），頁118-184；藍萼

[41] 陳康宏，〈臺灣客家社團的概況研究〉（上），《客家雜誌》，第93期（1998年3月），頁14。

[42] 〈卷首語〉，《大埔會刊》，創刊號，頁2。

洲主編，《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實錄》（臺北：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實錄編輯委員會，1974 年 3 月），頁 534-552；鍾艷攸，〈政治性移民的互助組織──臺北市之外省同鄉會（1946-1995）〉（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 5 月），頁 2；陳康宏，〈臺灣客家社團的概況研究〉（上），《客家雜誌》，第 93 期（1998 年 3 月）。

外省客家的同鄉會組織大部分是以戰後來臺的外省移民爲主，但也有號召本省客家共同參與，以聯繫光復前後來臺人士之鄉誼爲己任，如臺北市蕉嶺同鄉會創辦者徐白光認爲，祖籍蕉嶺的同鄉遍及全臺灣，但經日本統治、分化後，卻成毫無聯繫局面，爲聯絡鄉誼乃倡籌設同鄉會，擬納歷代遷臺同鄉後裔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遷臺同鄉於一，藉以敦睦鄉誼，增進團結。[43] 蕉嶺同鄉會有此特殊的開放心態，或許是由於戰前移居臺灣的蕉嶺縣人，已超過當時原籍蕉嶺縣的總人口，[44] 如丘式如曾表示，丘念台曾於 1951 年曾親口告訴他，「蕉嶺在臺灣的人口，據多方面的估計，約略到達 20 萬人。這個數字，是指大陸淪陷前在臺的蕉嶺籍居民而言，超過蕉嶺原籍居民的一倍」。[45]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本外省客家共同組成的臺北市中原客家聯誼會。戰後未久，當時旅北客家人如外科權威徐傍興、名醫翁瑞春、法院通譯彭運海、蕭祥安、茶商高阿智等人，即和半山客家如丘念台，或外省客家如李翼中、黃鎮球、徐白光、鍾壬士等人，時常集會商討如何結合客家同鄉作彼此扶助事宜，並於 1952 年籌備成立「旅北客屬同鄉會」。[46] 當時參與籌備者有何禮謙等七十餘人，並公推翁鈐、彭德、徐傍興、徐白光、鄒滌之、張芳燮、葉昌元、何禮謙等人申請獲准。同年 11 月在臺北市中山堂召開成立大會時，鄒魯代表致詞時表示，「我們是黃帝的後代，也就是中原民族的裔孫」，因此建議更名爲「臺北市中原客家聯誼會」，[47] 爲此客家社團的中原屬性定調。此聯誼會是省內外客家的大匯集，由第一屆選出幹事及顧問成員來看，本省客家有何禮謙、吳阿源、林榮春、黃運金、劉闊才、徐傍興等人，半山

[43] 彭芊琪，〈外省客家人的本土化：以廣東陸豐莊氏宗親會為例〉（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2005 年 12 月），頁 72-73。

[44] 涂澄清，〈發刊詞〉，《臺北市蕉嶺同鄉會 22 週年年刊》，頁 9。

[45] 丘式如，〈救救故鄉父老兄弟諸姑姐妹〉，《臺北市蕉嶺同鄉會 22 週年年刊》，頁 14。又，蕉嶺同鄉會創始人徐白光的估計，戰前來臺的蕉嶺同鄉約有十餘萬，與丘式如引丘念台的說法有所差異。參見徐基明，〈臺北市蕉嶺同鄉會沿革〉，《臺北市蕉嶺同鄉會 22 週年年刊》，頁 13。

[46] 彭欽清，〈臺灣客家社團之發展〉，收於徐正光等，《臺灣客家族群史．社會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 年 12 月），頁 124。

[47] 周東郎，〈臺北市中原客家聯誼會沿革史〉，收入藍萼洲主編，《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實錄》（臺北：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實錄編輯委員會，1974 年 3 月），頁 550。

客家有丘念台、黃國書、鄒滌之、彭德、翁鈐、張芳燮等人，外省客家則有鄒魯、李翼中、黃鎮球、張炎元、徐白光等人。[48]

（三）本外省客家的互動

戰後的臺灣，脫離了日本 50 年的殖民統治，對於終能重回「祖國」懷抱，毋寧是期待而雀躍的。本省客家對於來自祖國的客家亦是「打從心底以對待英雄的方式歡迎」。吳濁流曾描寫到，戰後沒多久，1945 年 9 月中，終於到「祖國接收人員」二十幾名，其中有二三個客家人。於是，在臺北的本省客家，就聚在邱內科醫院，爲這些人開了個歡迎會，「殷勤款待一番」，「所言所語都是客家話，也是故鄉的話」，席間，聽著這些同胞說著抗日戰爭的英勇故事，「益發地增加了崇敬之情」。[49] 由此可見當時本省客家對於祖國同胞，尤其是同方言的客家，有著急切想要親近及互通溝通的心情。

政府領臺後不久，二二八事件爆發，就現有的研究成果當中，有學者觀察到二二八事件期間，不論是實際的抗爭或所導引的省籍衝突，相較於臺灣的福佬人，客家並非是行動的主導者，甚多有庇護外省人士的情形。[50] 如柯遠芬表示新竹地區的客家人對外省人較爲友善，故外省同胞多走避客家村庄，因此，不只新竹，整個桃竹苗地區的鄉間幾未受波及，且有保護外省人之情形。[51] 汪彝定在事件後的 3 月初走訪新竹沿海查看救濟分署運用奶粉及麵粉情形時，也發現當地客家人態度較爲緩和，沒有外省人受到毆辱的情形發生。[52] 南臺灣也有類似情形。

一位來自揭陽河婆的外省客家也透露與本省客家在事件中互相援助的情形：

> 二二八的時候，有一天我以前的頭家，叫我躲到他那裡去，他知道我們是外省

---

[48] 林一雄，〈臺北城的客家村〉，《客家風雲》，第 5 期（1988 年 3 月），頁 54。

[49] 吳濁流並表示，這一類的歡迎會不只客家人開，福佬人或是同姓宗親會也開了，當時臺北每天都有這一類的歡迎會。參見吳濁流，《臺灣連翹》（臺北：南方叢書出版社，1988 年 6 月），頁 170。

[50] 蕭新煌、黃世明，〈戰後至今臺灣客家族群政治力的發展變遷〉，《臺灣客家族群史．政治篇》上，頁 219。

[51] 柯遠芬，〈臺灣二二八事件之真像〉，收入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二二八事件續錄》，頁、。

[52] 汪彝定，〈臺灣光復與二二八事件前後見聞〉，《走過關鍵年代──汪彝定回憶錄》（臺北：商周）。

人，後來有阿兵哥來搜查，我也叫他住到我那裡躲一躲，大家都是客人嘛。[53]

另一個比較清楚的事例，則是二二八事件當時，建中校長陳文彬曾逃到高等法院推事黃演渥家裡避難。黃於是找臺北名醫邱雲福商量，黃與邱都是客家人。邱雲福了解後則試圖找時爲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的柯遠芬幫忙，因爲柯也是廣東梅縣的客家人。柯遠芬最後有無因此請託而庇護陳文彬，道出這段緣由的戴國煇沒有明確說明，但認爲有關「鄉誼」的中國人傳統社會的某些政治文化，頗值得我們考量。不然，甚多事情實難於作好合理解釋。[54]

戰後陸續來臺的外省客家，除居住在臺北或高雄等都市外，多有依聚於以客家爲主的鄉鎮的情形。如《中原月刊》的一位名爲「痴哥四郎」的作者，在所著〈農曆新年二三事〉中，提及其避難來臺後，即「寄跡客人聚居之地」。[55] 陳拱初也提及，其於 1965 年旅居中壢，當時已有很多「粵中同鄉」住在那裡，故常聚集爲文酒之會，「詠吟寄慨」。[56]

由當時報章雜誌的相關報導中，我們可以了解戰後來臺的外省客家中，客家或者原鄉地域的邊界是存在的。如軍功顯赫，1945-1947 擔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的羅卓英，係廣東大埔人，在粵省主席任內，曾因大量引用同鄉故舊，致當時的廣東省政府曾被嘲爲「客家同鄉會」。[57] 而戰後國民黨第一任臺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原籍廣東梅縣，後轉任省社會處處長，曾有報章評論認爲其於 1952 年辭去社會處長一職，實是因爲任內喜歡用客家同鄉，所以當時社會處職員「幾清一色爲廣東客家人」，甚至有「廣東客屬同鄉會」之稱，由於這些同鄉誤事，而造成李翼中的垮臺。[58]

吳濁流可爲這一則新聞做見證，他在《臺灣連翹》中提到，由於認爲時任社會處長的李翼中「同樣是客家人」，因此賦閒中的他去找李幫忙，而被

---

[53] 藍清水，〈被遺忘的外省客家移民──戰後河婆客的集體記憶與認同之分析〉（桃園：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1 月），頁 84。

[54] 戴國煇，〈臺灣史的微觀與宏觀〉，《戴國煇文集 5．臺灣史研究集外集》（臺北：遠流、南天，2002 年 4 月），頁 53-54。

[55] 痴哥四郎，〈農曆新年二三事〉，《中原文化叢書》第四集，頁 30。

[56] 陳拱初，〈悼念廖遜我君〉，《中原文化叢書》第五集，「客家掌故」，頁 56。

[57] 雪堂，〈羅卓英屏東種菜〉，《天文台》，856 號，1955 年 8 月 2 日；金克木，〈羅卓英好夢難圓〉，《自然日報》，1952 年 9 月 3 日。

[58] 許宣，〈李翼中丟官記〉，《鈕司》169，1952 年 5 月 22 日；海臨，〈臺灣月下老人丟官祕記〉，《中國新聞》190，1952.5.9，頁 21。李翼中對客家文化的認同，也可由其為《中原雜誌》撰寫一篇〈客人婦女的優良風俗〉文末所言「雖然吾客人已葆此珍貴俗，宜如何發揚光大，實有賴賢父兄之倡導，有識之士的鼓吹，斯文不過拋磚引玉而已」，略窺一二。參見李翼中，〈客人婦女的優良風俗〉，《中原文化叢書》第二集，「客家風土」，頁 1-2。

安排在社會處擔任科員，當時的社會處「幾乎都是客籍，是以前在臺灣省黨部的人，只有我一個不是國民黨」，「外省人居多，本省人只有三位」。[59]

此外，由國史館所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的人事資料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黨內高層對戰後曾任廣東省澄海縣縣長、廣東省政府主任秘書及廣東省政府顧問，來臺後擔任國民黨黨部委員兼第五組組長的藍萼洲（廣東大埔人），記下這樣的評語「對地方自治選舉情形熟習，辦事負責，因係客家人，對閩南（福佬）不免稍有偏私」。[60] 自此不難了解，戰後以來的臺灣，方言界線或原鄉的地域主義其實仍在人際的交往中發揮了作用。

此外，我們也可以注意到，1946 年 4 月，屏東地區的客家人士在西勢國民學校透過座談會方式，決議籌組「六堆愛國聯誼會」。值得注意的是，丘念台亦現身此會，並演講丘逢甲與唐景崧的抗日事蹟。1948 年 2 月，六堆愛國聯誼會在竹田國民學校召開成立大會暨首屆六堆運動大會，丘念台亦再度與會。還有一個切面也值得我們深入觀察，即戰後來臺的羅卓英與六堆忠義祠重修之關係。戰後原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的羅卓英將軍自 1949 來臺後，選擇南部的屏東爲落腳處，幾爲政壇之邊緣人，呈半隱居狀態。但與南部當地客家人士有頻繁的交往，並於 1951 年徇六堆人士之請，出而倡議重修傾圮荒廢良久的忠義祠。[61] 因此，1961 年羅卓英辭世後，六堆鄉親亦將羅之牌位入祀忠義祠，以誌紀念。[62] 此外，當時名列第一屆忠義祠重修委員會顧問的有羅卓英（陸軍上將）、李翼中（前社會處長）、丘念台（總統府諮政）、黃國書（立法院副院長）、劉兼善（前省府委員）、鄒清之（臺灣省府委員）、吳鴻森（臺灣省府委員）、劉振聲（臺灣省府委員）、翁鈐（臺灣省府委員）、彭德（前省府委員）、羅博平（屏東縣圖書館長）、何禮謙等人。[63] 由此名單不難看出，幾以半山或外省客家爲主。就六堆鄉親而言，或因邀請達官顯貴參與，較能發揮榮耀故里之效，但也可以藉此了解，當時的本省客家多願意基於同方言的認同，希望多方交納半山與外省客家，而且似乎未因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而改變此一認同傾向。

以現有接觸的文獻資料，可以初步歸納戰後省內外客家彼此能容易產生族群親親感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三。

---

[59] 吳濁流，《臺灣連翹》（臺北：南方叢書出版社，1988 年 6 月），頁 227、242。
[60] 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檔號 129000101735A，藍萼洲（藍曉瀾）。
[61] 羅鏑樓，《羅卓英先生年譜》（臺北：羅偉郎，1995 年 3 月）。
[62] 鍾壬壽，《六堆客家鄉土志》，頁 128。
[63] 鍾壬壽，《六堆客家鄉土志》，頁 128。

其一是由於所屬方言是特殊，且在臺灣是居於少數的，使得彼此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拉近陌生的距離。如《中原月刊》的一位作者夏冰嘗謂「來臺廿餘年，每每遇見這裡生長的客家鄉親，雖然彼此會面，尚是陌生，但因彼此語言相通，談起話來，特別感覺親切」。[64] 一位戰後遷臺的河婆外省客家亦言，「剛到竹東的時候，人生地不熟，……大家一見面，不管認不認識，都很親切，雖然他們生活也很困難，都會介紹我們新來的人去工作，……本地人也是很好，大家都講客話嘛」。[65] 籍廣東梅縣，戰後隨軍抵臺的羅志飛，來臺後曾分別於新竹的湖口及屏東地區客家人聚集的地區工作過，表示方言的溝通無礙，使他能與本省客家很快建立感情。[66]

其二，許多臺灣客家雖經歷次兩次改朝換代，卻仍保有對原鄉及原鄉宗族的認同觀念，這也是戰後省內外客家容易跨越長期隔離的時間作用，而輕易拉近彼此距離的因素之一。如戰後曾任新竹縣長的鄒清之，係原籍廣東五華縣的客家人，移居臺灣後，相傳已有五代之久，他們始終和大陸原籍家鄉保持密切關係，直到第四代為止，才與故鄉連繫中斷。[67] 1948 年抵臺的鍾政華，來臺後即與在臺宗親慶壽叔取得連繫，並於 1949 年經其引領至屏東萬巒鍾氏宗祠參訪，提及宗祠建築完全仿照原鄉祖堂建造，祖先牌位亦依原鄉鍾姓開基主德重公派下至十八世祖為止。[68] 此外，一位廣東蕉嶺三圳墟保安堂的在臺美濃七房的涂姓後裔則清楚的記述了在日治時期與苗栗長房、屏東二房共同返回原鄉參加祖祠落成大典的情形。先向阿緱廳申請旅行券，後由高雄搭蘇州丸輪，經廈門、汕頭，登岸後改搭民船溯韓江而上，再經松口、白渡，終抵三圳，與各房叔姪集討論祭祖事宜，再同往梅縣縣城看祖祠修建情形，以及拜訪各叔姪。前後在祖籍家鄉停留三月餘後返臺，「至今大典照片仍長懸在草舍壁上，巍然伴余經歷兩個朝代」。[69] 宗親關係的維繫，無疑也是本外省客家較易跨過省籍界限互相親近的原因之一。

其三，由於客家在臺灣是相對的少數，自易接納省外的同方言群的成分，尤其，他們舉著客家是中原正統的旗幟而來。如戴國煇曾言「臺灣的客

---

[64] 夏冰，〈略說梅縣〉，《中原文化叢書》第五集，「客家風土」，頁 30。

[65] 藍清水，〈被遺忘的外省客家移民──戰後河婆客的集體記憶與認同之分析〉（桃園：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1 月），頁 84-85。

[66] 羅志飛，《七十回憶錄》，頁 45、111-114。

[67] 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檔號 129000099170A，鄒清之。

[68] 鍾政華，〈粵東先民遷臺事跡瑣記〉，《臺北市蕉嶺同鄉會年刊》，第 23 期（2004 年 1 月），頁 77。

[69] 涂洪發，〈涂氏遷臺裔孫代表回祖籍廣東祭祖的回憶〉，《臺北市蕉嶺同鄉會 22 週年年刊》，頁 49。

家嘗盡了雙重邊緣的滋味。日本占領時期使得臺灣客家對於屈服於殖民地統治而倍感羞恥，做爲臺灣客家的父親而言，中原和邊境早已不是地理學和地政學意義上的專有名詞的代用品。中原被賦予了價值、價值的核心及象徵著客家對於根的信仰之重大意象」。[70] 而這也印證了楊長鎮的說法，即過去因閩客歷史情結和少數弱勢而自卑的客家人，因爲可以在這樣的中原論述中得到較高的象徵地位和安全感，因此在中國化的大背景下產生了「中原正統」的認同意識。[71] 而也因此容易對戰後來臺的客家人產生親近感。

即如戰後來臺的外省客家，曾任官派屏東市長的何舉帆曾言，臺灣光復初期，如果說本省同胞與外省同胞有個「界限」的話，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語言隔閡所致。[72] 沒有了語言隔閡，自易親近。然而，隨著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以及政府遷臺後進行一系列情治系統整頓、黨改造，以及派系削弱重整等一系列的威權重建工作，以及面臨許多在政府施政過程中體會出不同省籍族群的不對等待遇，[73] 也可能使方言的認同跨不過省籍的邊界，如彭芊琪對陸豐莊氏宗親的研究發現，即使莊氏宗族大部分的移入地是苗栗縣南庄鄉的客家聚落，但是，這些莊氏宗親和臺灣人一起在底層生活的過程中，經歷了檯面下的省籍衝突，來臺初期，他們的外省身份更重於他們的客家身份。當時本省客家人說他們是「長山人」，閩南人則稱他們是「唐山仔」，與閩南人相處時甚至容易產生肢體衝突。當時，他們要進入礦坑工作，煤礦的老闆不願意雇用外省人，所以，他們只好把身份證上的出生地改掉，從形式上的身份先變成了臺灣人。[74]

換言之，陸豐來臺的莊氏宗親的親身經歷告訴我們，客家的文化親親性在他們來臺之初，並沒有在族群相處發揮很大的作用。然而在多年的持續相處之後，客家身份仍有助於他們融入臺灣社會。[75] 一位戰後來臺的河婆客家也有著類似的經驗：

> 我剛到臺灣的時候，那些本地人，……看我們像逃難的難民，對我們這些人就

---

[70] 戴國煇，〈中国人にとっての中原と辺境〉，收入橋本萬太郎編，《漢民族と中国社会》（東京都：山川出版社，1983），頁 407。

[71] 楊長鎮，〈認同的辨證──從客家運動的兩條路線談起〉，網址：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274956510474，檢索日期：2010 年 8 月 2 日。

[72] 何舉帆，〈所謂省籍問題〉，《中央日報》，1979 年 6 月 5 日。

[73] 張茂桂，〈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收入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臺北：業強出版社，1996 年 5 月，初版 3 刷），頁 241。

[74] 彭芊琪，〈外省客家人的本土化：以廣東陸豐莊氏宗親會為例〉（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2005 年 12 月），頁 64-66、69-70。

[75] 彭芊琪，〈外省客家人的本土化：以廣東陸豐莊氏宗親會為例〉（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2005 年 12 月），頁 61。

很鄙視，……由於我們會說客家話，所以表面上對我們很客氣，背後罵我們是「長山人」或「阿山」，那很難聽的，有時候會罵我們是「豬」，說我們住的地方是「豬嬤寮」……。[76]

以往對臺灣族群的相關研究當中，1945 年之後由大陸各省市遷臺的外省客家人，既被外省人研究所忽略，也完全不在客家研究的視野之中。[77] 學者在進行族群相關研究時，往往逕以省籍作爲人群的主要分類，卻因此忽略了戰後來臺的外省籍移民當中，有相當多數量與臺島原有福佬、客家使用同方言的一群人。如吳乃德於 1996 年進行相關研究時，曾言「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並沒有共通的語言或文化」即爲顯例。[78] 或者認爲，戰後隨國民黨政府來臺的外省人口，不但在語言上無法與本省人溝通，而且多數聚居在政府安排的特定社區，使其與臺灣社會形成隔離的狀態。語言與生活方式上的差異使得族群間的調適發生困難，更加上以外省人爲主的統治政策下，更深化了省籍間的敵意。[79] 以上是以往忽略本省外可能存在跨省客方言認同的情形。

此外，或者意識到戰後來臺的外省人口中也有客家，但「未能廣爲本省籍的客家人所認同」，認爲面對相互競爭的認同，外省族群中的客家人，似乎傾向於選擇外省人的認同，在他們的心目中，外省認同是重於客家認同。[80] 然而，若綜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影響族群互動的模式，除了是在哪個時間區段外，也與如何來臺（自行來臺的平民或隨政府遷臺的軍公教）及能否與本省群眾溝通（通客家話或閩南語否）有密切關係，可能的互動情形，需要從不同面向，以更細緻的方式來分析，而不是單純以省籍分，或強調方言的認同。

由彭芊琪研究廣東陸豐莊氏宗親會的外省客家，或藍清水研究戰後來臺的外省河婆客家，皆顯示出省籍與方言交叉下發生的認同作用其實錯綜複雜，如藍清水以 1945-1949 年間移民臺灣，目前主要定居於新竹縣竹東鎮與

---

[76] 藍清水，〈被遺忘的外省客家移民──戰後河婆客的集體記憶與認同之分析〉（桃園：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1 月），頁 85。

[77] 藍清水，〈被遺忘的外省客家移民──戰後河婆客的集體記憶與認同之分析〉（桃園：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1 月），頁 1。

[78] 吳乃德，〈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臺灣族群政治理論的初探〉，收入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臺北：業強出版社，1996 年 5 月，初版 3 刷），頁 70。

[79] 徐正光，〈臺灣的族群關係──以客家人為主體的探討〉，收於行政院客委會策劃主辦、客家雜誌社協辦，《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頁 393。

[80] 施正鋒，〈客家人由中國遷徙臺灣──臺灣客家族群認同的打造〉，收入氏著，《臺灣人的民族認同》（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 年 8 月），頁 140。

屏東市林仔內大同路附近的廣東省揭陽縣河婆鎮的外省客家移民爲主題所作的研究發現，河婆客家移民這種既是外省人又是客家人的雙重游移身分，突顯了目前臺灣慣常以均質化方式論述外省人或客家人的缺失。[81]

就目前的了解比較可以確定的是，未受政府充分照顧，或未聚居在政府安排的竹籬笆內，直接深入臺灣社會，與本省客家互動的外省客家，客家這個身分有助於他們的本土化與在地化，如自謀生活的河婆客家移民因爲擁有客家族群身分，提供了融入在地的捷徑，在族群認同上趨向客家認同而非外省人認同，與其他有國家機器的庇護而難以融入地方社會的外省人有所差異。[82]

藍清水自身的經歷也可作爲例證：

> 本筆是來自閩西長汀縣的外省客家人，在臺灣既不住眷村，與在地的客家人一起生活，……他們清楚筆者的外省人身分，仍把筆者當成一伙的，與不是住在眷村，且通曉客家話，日常生活完全在地化有關，因此被歸類的客家族群而非外省人。可以證明相同的語言與族群身分對移民初期的適應有一定的幫助。[83]

綜上可知，關於戰後來臺的外省客家，及其與本省客家之間的認同情形，需要更細緻地以實例事例分析爬梳，方可獲致較可接近事實的樣貌，不應以省籍或方言截然二分，忽略了其中複雜多變的互動影響。

---

[81] 藍清水，〈被遺忘的外省客家移民──戰後河婆客的集體記憶與認同之分析〉（桃園：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1 月），頁 2。

[82] 但這種認同傾同遇到國家認同的問題時，就有不同的情形，轉而與其他外省人比較接近。參見藍清水，〈被遺忘的外省客家移民──戰後河婆客的集體記憶與認同之分析〉（桃園：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1 月），頁 2。

[83] 藍清水，〈被遺忘的外省客家移民──戰後河婆客的集體記憶與認同之分析〉（桃園：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1 月），頁 87。

五、中原客家的論述內容及其傳布

1998 年由省文獻會出版之《臺灣客家關係書目與摘要》（以在臺灣發表或出版的中文資料爲主），收錄戰後至 1998 年 6 月間，5,900 筆關於臺灣客家族群之相關資料，由各階段資料的數量來看，以 1940 年代最少，此後一路爬升，以 1990 年代最多。[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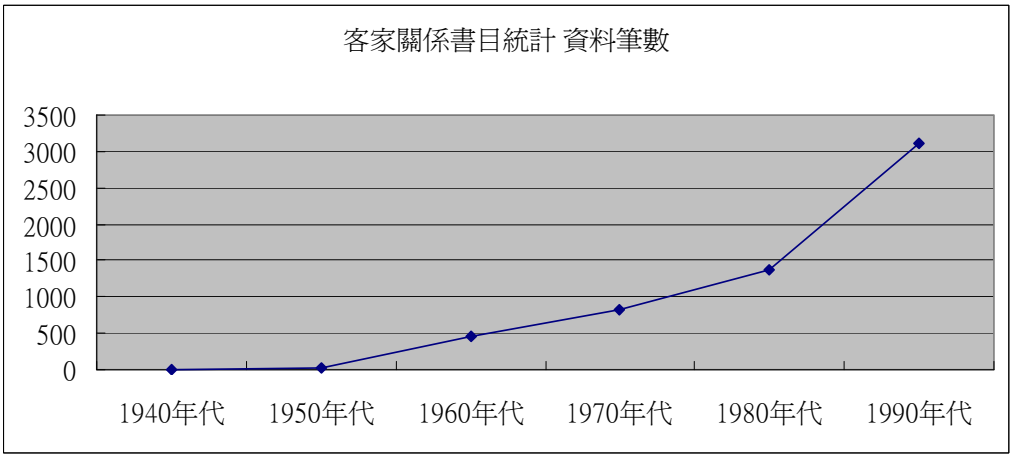


圖 5-1 1945-1998 年客家關係書目統計圖

資料來源：陳逸君，〈眾裡尋「客」千百度——一個需要重新書寫臺灣族群史的時代〉，收入陳逸君主編，《臺灣客家關係書目與摘要〔專書、論文、研究報告類〕》（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 10 月），頁 34。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臺灣從日本殖民地政府的手中轉交給中國國民政府，使臺灣經歷一段內部震盪、排斥到接受的過渡期，因此，在四〇、五〇年代期間，不僅是客家相關的研究非常零落，整個臺灣歷史相關研究也是十分蕭條。[2] 如陳運棟曾言，戰後的臺灣正待復興，沒有談及文化建設，當然也就沒有所謂的客家研究。[3]

---

[1] 陳逸君，〈眾裡尋「客」千百度——一個需要重新書寫臺灣族群史的時代〉，收入陳逸君主編，《臺灣客家關係書目與摘要〔專書、論文、研究報告類〕》（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 10 月），頁 34、41。

[2] 陳逸君，〈眾裡尋「客」千百度——一個需要重新書寫臺灣族群史的時代〉，收入陳逸君主編，《臺灣客家關係書目與摘要〔專書、論文、研究報告類〕》（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 10 月），頁 35。

[3] 陳運棟，〈五十年來的臺灣客家研究〉，《臺灣文獻》，第 49 卷第 2 期（1998 年 6 月），頁 171、

（一）戰後初期的客家論述

當時的臺灣，關於客家的論述，僅偶於報端可見。從報端上有一些客家意象，偏向臺灣的。可以看到臺灣客家特殊的風貌，如會提到客家籍相較於閩南籍而言，較重視掃墓，農曆元月初至清明時節，是苗栗山城客家掃墓時節，多「蒸製艾糕敬祀」，「滿山紙灰飛揚」，「爆竹如雷」。[4] 也提到臺灣的客家喜歡食豬肉而厭魚腥，過節或任何拜拜，均以肉類爲主要祭品。[5] 比較多的是選舉時客家與閩南派系的對立。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關於客家流源的論述。如 1955 年 11 月何吟刊於《聯合報》一則名爲〈客家人〉的短文。提到客族人是中古時定居在中原的漢族人，因戰亂數度南遷，渡長江而入東南及西南各省，浙、贛、湘、川、黔、滇、閩、粵、桂、臺諸省內都有客族人居留。客族人雖然流離播遷數萬里，但所到之地，自成一系，並不被當地土著同化；所以終能保留原有的語言和風俗習慣。因爲這批人都是由中原遷徙而來，所以都被當地人稱爲「客家人」，而他們也自稱爲「客人」，是以他鄉做客，不忘其祖先所屆之地的意思。文中也提到客家的南遷，認爲前後凡三次：第一次始遷於東晉，八王之亂，永嘉之亂，第二次遷徙在唐末，自黃巢造反至五代末年，第三次遷徙在宋高宗南渡，至南宋末年。客族人最富民族思想，宗譜聯絡雖經數十世，仍能探根求源，至於客話的保存，尤爲特別之家法。認識客家民透澈的，莫過於英國的教士銀貝爾了，客話多存古中原之音韻。[6] 此文特別的是，對於客家的遷徙，與羅香林持不同論點，採三波論。

隔年的 2 月，署名鯤翔者，也在《聯合報》刊載一則名爲〈客家〉的短文，提到客家人因遭歷代變亂，不少由中原轉輾到了百粵，定居在粵東和粵北一帶，保存了中原的語言和習俗，就中興寧是粵東嘉應五屬的重要縣份之一，在這裡所要介述的年俗，雖不能說是百分之百代表了客家，但可窺見客

179。

[4] 〈應付顧客四張副臉喜煞腹中有三孩〉，《聯合報》，1953 年 3 月 23 日，版 4；〈落日白煙飛塚上細雨哀聲動墳前 苗栗客家人昨起掃墓〉，《聯合報》，1954 年 2 月 19 日，版 4；〈昨夜燈花亮今日紙灰揚 山城客家掃墓期〉，《聯合報》，1955 年 2 月 8 日，版 5；〈翹首故國狼煙熾祖宗墳墓盡蒙塵 各地今日・遙祭黃陵本省人家・戶戶上墳〉，《聯合報》，1955 年 4 月 5 日，版 5。

[5] 〈舉手示意・腦袋尚在大驚失色。飛紅滿身〉，《聯合報》，1953 年 7 月 19 日，版 4；〈中元節近 苗栗監視市場高雄鬧青菜荒宜蘭雞鴨齊升〉，《聯合報》，1953 年 8 月 22 日，版 5。

[6] 何吟，〈客家人〉，《聯合報》，1955 年 11 月 15 日，版 6。

家年俗的一斑，這該是無可否認的事。[7]

論者皆謂，羅香林的中原客家論述參與了「中華民族工程學」在臺灣的建構。[8] 或言其客家源流說構成了臺灣早期客家研究傳統，且持續影響至1990 年代才逐漸受到臺灣客家論述的挑戰。[9] 客家這種遷徙的記憶、對中原世胄的情懷，曾經深深地烙印在臺灣族群身上。[10]

但由羅香林簡歷看來，1949 年的羅香林雖仍致力於客家研究，但發展重心在香港，在其有生之年，許多著作在臺北出版，如《國父與歐美之友好》、《中國通史》、《中國民族史》、《唐代文化史》、《百越源流與文化》、《蒲壽庚傳》等。但他實際來臺的次數寥寥可數，僅於 1957 年 12 月、1959 年 1 月、1960 年 10 月、1961 年 8 月抵臺參加會議，1965 年 2 月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張其昀以羅氏即將退休，擬聘爲中國文化學院研究所專任教授，但羅香林以「目前不克來臺」婉辭。1973 年 10 月，出席在臺北召開之全世界客屬同鄉大會，並作專題演講，題曰「客家源流及其社會背景與影響」。翌年 10 月，世界客屬總會在臺北成立時，再次應邀作專題演講，題曰「客家源流考」，並擔任世界客屬總會在香港設聯絡處的首席召集人。1975 年 7 月，再次由港抵臺，除拜訪友人，及商討世界客屬總會相關事宜外，並曾至新店國史館查閱荷馬李資料。1978 年因病辭世。[11]

以上即爲戰後至 1950 年代期間貧乏的客家論述。一直要到 1960 年代初期苗友的發刊，在臺的外省客家以苗栗爲據點，展開對中原客家論述的引介宣揚。

這種與臺灣不甚密切的關係，不禁讓人好奇，羅香林的客家論述是如何在 1949 年之後被深深刻刻地鑲嵌在臺灣客家族群的認知當中？由既有的文獻脈絡來看，一開始應是一群與羅香林有著類似的客家覺醒經驗的外省客家族群所引入，到了後期本省客家在潛移默化中接受這套中原客家的認知，並開始進行客家的論述。而就當時的宣傳平臺來看，可略分爲四類，即《苗友》—《中原》月刊、各同鄉會刊物、報紙分別論述之。

---

[7] 鯤翔，〈客家〉，《聯合報》，1956 年 2 月 11 日，版 6。

[8] 楊長鎮〈民族工程學中的客家論述〉，網址：http://taup.yam.org.tw/PEOPLE/961116-3.htm；檢索日期：2010 年 8 月 2 日。

[9] 林吉洋，〈敘事與行動：臺灣客家認同的形成〉（新竹：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7 月），頁 22、24。

[10] 張維安，〈族群記憶與臺灣客家意識的形成〉，收入莊英章、簡美玲主編，《客家的形成與變遷》（下）（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0 年 12 月），頁 727。

[11] 羅敬之，《羅香林先生年譜》（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 年 11 月），頁 25-182。

（二）《苗友》（《中原》月刊）及同鄉會刊物中的「中原客家」論述

1962 年 6 月由創刊的《苗友》月刊由廣東梅縣出身的中華日報記者謝新樹於 1962 年創刊，原本以報導苗栗地方事務爲宗旨。它在發刊詞中即提到：這份刊物「是純地方性供苗栗各階層人士閱讀的雜誌」。[12] 由於發行之初，即大幅刊登有關客家文化之內容。包括「客家掌故」、「客家話」、「客家山歌瑣談」、「民謠專集」、「故鄉風物」等專欄，頗受苗栗縣內外客家人之歡迎，1963 年底，有讀者建議原刊名「侷限於地方性，不足以謀發展」，宜改名並充實內容，「擴大發行海內外客族人士聚集之地」。[13] 在此建議下，謝樹新自 1964 年 3 月先發行以《中原》爲名之「姊妹版」，並在 1965 年 1 月將《苗友》併入《中原》，2 月正式更名爲《中原》月刊。[14] 以示「客人出身中原，永不忘本」之義。[15]

[12] 不著撰人，〈發刊的話〉，《苗友》1(1): 2。

[13] 謝樹新，〈苗友創刊兩週年回顧與展望〉，《中原》4:4。

[14] 《中原文化叢書》第一集，緒言。該刊於 1981 年 11 月，由月刊改版為小型報樣週刊並更名為《中原》週刊，以報紙形式出版。由謝樹新之子謝伯浩接任社長，謝樹新則繼續擔任發行人。由於自 1981 年改版的《中原》週刊，已不再自我定位為客家文化刊物，而轉為一份「純地方性的鄉鎮社區報紙」，一期四個版面上僅剩一版為「中原文物專欄」，其餘三版則改為服務地方的「府會版」、「苗市版」與「鄉鎮版」。《中原》由月刊改為週刊，或與 1980 年代初期政府獎助社區報刊之成立有關，因為《中原》週刊首期發刊詞中提到：「年來政府致力於基層建設的推進，使基層民生經濟、教育文化、社會秩序，都具有開發國家新的外貌和內涵，是很重要的扎根工作」，「本刊為適應這一趨勢，期於有效溝通鄉里社區人民與政府間思想的認同，興建的合作，人地時事物調配，乃改月刊為週刊，以更多的篇幅，以寫實報導地方大事小事」。1987 年由徐運德先生接手，陸續出版許多客家書籍。參見彭欽清，〈臺灣客家社團之發展〉，收於徐正光等，《臺灣客家族群史．社會篇》，頁 149；《中原》周刊 1:1；許馨文，〈戰後臺灣客家音樂的建制化歷程：以《中原（苗友）》月刊（1962-1981）的再現為例〉，《民俗曲藝》，第 171 期（2011 年 3 月），頁 129。

[15] 陳運棟，〈五十年來的臺灣客家研究〉，《臺灣文獻》，第 49 卷第 2 期（1998 年 6 月），頁 179。

圖 5-2 《苗友》、《中原》封面題詞

改版後的《中原》月刊，轉型爲一份跨區域、綜合性的客家文化刊物，「以研究中原客家文化、闡揚客族先民遺德，掌故、民謠、趣事及介紹地方建設爲宗旨。」[16] 內容方面，改版後有關時政的部分由區域性轉爲全國性，僅留部分篇幅報導苗栗地區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事件。時政報導之外，內容則聚焦在臺灣各地客家事務，以及海外客家僑情，並延續先前有關客家文化之專欄，引介與客家相關之中國歷史、詩文、歌謠、風俗，以及據信爲客系之古今知名人物之生平事蹟。是目前所知臺灣第一份以客家社群爲目標閱聽對象的定期刊物。[17] 也被認爲「不只是一個資訊的提供者，更是一個客家族群意識的倡導者、客家文化發展的主導者」。[18]

原籍廣東梅縣的謝樹新，1947 年自上海來臺，1950 年因工作調任到苗栗。早期他擔任國民黨黨營報紙《中華日報》苗栗辦事處廣告業務，後因銷售報份業績優異，文筆亦佳，被拔擢爲地方新聞特派員。謝樹新爲黨報從事地方新聞工作，使其得以同時以及地方與臺北政商文教人士，保持密切的互動，此可由縣府首長、議會代表、地方農會與消費合作社主管、各級學校校長、大學教授連年於雜誌社社慶時刊登賀詞的情形看出。這些人脈關係，應是謝樹新創辦、經營《苗友》、《中原》月刊的重要助力。[19] 此外，謝樹新也被認爲是一個「忠貞愛國之士」，「時時刻刻遵循著總統之意旨」，「符合政府大力倡導的復興中華文化理想目標」。[20] 這可能也是謝樹新可以由《苗友》而《中原》，將雜誌由地方報導轉而以特定族群爲對象的原因之一。

---

[16] 不著撰人，〈徵稿簡則〉，《中原》14:2。

[17] 許馨文，〈戰後臺灣客家音樂的建制化歷程：以《中原（苗友）》月刊（1962-1981）的再現為例〉，《民俗曲藝》，第 171 期（2011 年 3 月），頁 129。

[18] 許馨文，〈戰後臺灣客家音樂的建制化歷程：以《中原（苗友）》月刊（1962-1981）的再現為例〉，《民俗曲藝》，第 171 期（2011 年 3 月），頁 121-179。

[19] 參見張強，〈客家文化傳揚者──謝樹新先生〉，《苗栗文獻》，第 8 期，頁 151；許馨文，〈戰後臺灣客家音樂的建制化歷程：以《中原（苗友）》月刊（1962-1981）的再現為例〉，《民俗曲藝》，第 171 期（2011 年 3 月），頁 131。

[20] 林子正，〈「中原」的成就〉，《中原》，第 76 期（1970 年 6 月），頁 7。

圖 5-3 《苗友》創辦人謝樹新

資料來源：《苗友》，第 2 卷第 1 期，頁 5。

若分析《中原》月刊與客家相關的論述內容，主要有客家源流、客家原鄉風土、客家方言、客家山歌、客家名人軼事，或是客家與國民革命之關係，以及少部分與臺灣客家相關者。試列舉說明如下：

1. 客家源流

相關的篇章有：客家源流，該刊資料室，〈客家遷徙路線說明〉、〈「客家非漢族說」之辯正〉、〈客家源流〉、〈崇正史話〉；陳槃〈客家爲中原舊姓〉；葉浩〈客家人比任何人還「漢人」〉；李宜善〈略述客家根源〉；客人〈漢民族述客家〉；鴻〈誤客爲「犵客」〉、〈客家語言及南徙流傳史事──中原爲什麼沒有客家話〉、〈談客人的祖籍〉；夏冰〈漫談客家民系之形成與今日之客家──兼述首開梅州文教的侯安國〉、〈秦代移民與宋代遷客──兼論物競天擇，優者生存的定律〉等。

如李宜善，〈略述客家根源〉指出「客家祖先發源於中原，即今之河南。客家的風土語言與中州無異，故稱客家爲中原民族。此客家經過之情形，各姓族譜，對祖上來源，皆有詳細載明」。[21] 思正，〈客家風俗鈔略〉則言「客家遷徙據中大教授興寧羅香林先生考據前後五次，均爲中朝衣冠仕宦之裔」。[22] 鴻，〈談客人的祖籍〉言，「根據史學家羅香林先生的考證，及大陸客人族譜的記載，幾乎全都是古代的貴族，他們祖先原居住在黃河流域，

[21] 李宜善，〈略述客家根源〉，《中原文化叢書》第二集，「客家源流」，頁 9-10。
[22] 思正，〈客家風俗鈔略〉，《中原文化叢書》第一集，「客家風俗鈔略」，頁 1-6。

尤其是河南一帶爲最多」。[23] 梁寒操，〈客家人來源和使命〉則言，客家人「實都來自中原」，具「濃厚的民族意識」。[24] 夏冰〈漫談客家民系之形成與今日之客家──兼述首開梅州文教的侯安國〉，言「客家民系形成的時期，據近人羅香林先生的考證，是在五代至宋初間」。客家名稱則緣於「晉元帝給客制度的詔書」。[25] 以上關於客家源流之論述，多以羅香林的著述爲據。

2. 客家原鄉風土

相關的篇章有：侯清〈記憶中的梅縣〉、黎義本〈平遠客家風土〉、陳拱初〈陸豐鄉土談片〉、〈粵東名勝憶羅浮〉；楊欣華，〈梅縣的風箏季節〉；杜鵑〈嘉應州沿革〉；夏冰〈略說梅縣〉、〈漫談梅縣幾處地名的由來〉、〈梅縣婚禮今昔〉、〈梅縣的春節前後〉；曾慶良〈我別惠州西湖廿五載〉、〈美麗的惠州西湖風光〉、〈惠州西湖的平洞〉、〈嶺南重鎮──韶關市和南華寺〉、〈客屬地區──連江數景〉、〈廣東大埔的湖山八景〉；丁流〈山青水秀懷豐稔〉；郭兆華〈珠海明月憶羊城〉；慶祿〈一衣帶水話上杭〉；丘藜光〈陸豐古蹟〉；廖偉光〈紫金水向兩江流〉、〈三十載飄零憶紫金〉、〈紫金風俗瑣談〉；思正〈梅城瑣憶〉；鴻〈粵東客人春節的飲食料述略〉等。

介紹客家原鄉風物，一直是苗友或中原月刊的重要內容，爲創刊宗旨之一。[26] 因此戰後至 1990 年代間，與客家原鄉相關的記述資料，絕大部分出自於中原月刊，[27] 可見中原月刊是此類主題的發表重鎮。

戰後來臺灣外省客家，在撰寫家鄉事物時，多參考手邊可掌握的相關志書，如思正則是根據《廣東通志》、《嘉應州志》、《平遠縣志》等資料，將廣東嘉應五屬、大埔縣、惠州、及福建之汀州風俗，寫成〈客家風俗鈔略〉一文。[28] 又如陳拱初係參考《惠州府誌》與《海豐縣誌》而撰述〈海豐勝蹟五坡嶺文信國公祠方飯亭補記〉一文。[29] 然而，能憑藉原鄉志書撰述者仍屬

---

[23] 鴻，〈談客人的祖籍〉，《中原文化叢書》第五集，「客家掌故」，頁 124-128。

[24] 梁寒操，〈客家人來源和使命〉，《中原文化叢書》第二集，不著頁數。

[25] 夏冰，〈漫談客家民系之形成與今日之客家──兼述首開梅州文教的侯安國〉，《中原文化叢書》第五集，「客家掌故」，頁 53-55。

[26] 明，〈憶南臺〉，《中原》，第 64 期（1969 年 6 月），頁 7，提及「中原雜誌，自創刊以來，始終保持著發揚中原民族傳統的固有文化，和介紹故鄉風物為宗旨」。

[27] 陳逸君，〈眾裡尋「客」千百度──一個需要重新書寫臺灣族群史的時代〉，收入陳逸君主編，《臺灣客家關係書目與摘要〔專書、論文、研究報告類〕》（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 10 月），頁 7-8。

[28] 思正，〈客家風俗鈔略〉，《中原文化叢書》第一集，「客家風俗鈔略」，頁 1-6。

[29] 陳拱初，〈海豐勝蹟五坡嶺文信國公祠方飯亭補記〉，《中原文化叢書》第五集，「客家掌故」，

少數，比較多的情形憑藉以往經歷或記憶所及加以論述，如哲愚在〈客家掌故漫談〉中即言：

> 在大陸時候，先賢遺著，有輒搜藏，而今寸縑碎金，都成拱璧。久未執筆，思澁手疲，目前又無書可考，全憑記憶，或友人談助，錯誤難免，茲由嘉應州梅縣談起（偏於藝文方面），由近及遠，拉什寫出，或有助於業餘酒後之談資。[30]

又如〈十目十手參客人掌故〉的作者，則是憑藉其軍旅中駐防東韓兩江客籍縣分多年的聽聞故事。[31] 此外，由於是追憶的原鄉，故所記述的內容也只是歷史的風俗，如阿衝〈客家的食衣住行〉中坦言，「這裡所談的是客人五十年前食、衣、住、行生活的追述。當然與今天在臺灣及海外客人的生活形態，有很大的距離」。[32]

多爲來臺外省客家的懷鄉記述，且篇末多期待終能離臺歸鄉。如侯清寫〈記憶中的梅縣〉，言「梅縣，這美麗的地方，深鎖鐵幕中已經十多年了……我們應帶頭早日打回去，收拾殘破的家園，重溫往日的舊夢」。[33] 溫開允寫〈懷竹香村〉，言「故鄉是廣東梅縣南口圩竹香村……我們離開這個小村莊，不覺已過十五年了，……我們何時能回去，……我不時對這個永遠難忘的地方，會發出幽渺的遐思呢」。[34] 丁流寫故鄉豐稔，言「千言萬語，傾訴不盡我懷念的衷曲，記得離開它時我正是青春年少，卻不知再見它時我會是何等模樣？我等待著反攻聖戰早日到來」。[35] 明〈憶南臺〉，言「南臺的美景，就是我們美麗的故鄉，可是今天已淪爲犬羊的窟宅了，凡我邑中之士豈不痛恨？唯有希望早日反攻，收復河山，重建我們的故鄉」。[36] 所論所述多爲多爲記憶中虛邈的原鄉，失根的記憶，也可反映出與本省客家歷史經驗的差異。

3. 客家方言

相關篇章有：黃基正〈客家語言研究〉、〈做麼個愛研究客話？〉、〈客家話中的「麼個」〉、〈客家常用字彙〉、〈客家音系的來源〉、〈客家話注音符號〉、〈客家方言的用字問題〉、〈客家字音表〉、〈客家語聲母表〉、

頁 45-49。

[30] 哲愚，〈客家掌故漫談〉，《中原文化叢書》第一集，「客家掌故」，頁 15-35。

[31] 不著撰者，〈十目十手參客人掌故〉，《中原文化叢書》第一集，頁 1-14。

[32] 阿衝，〈客家的食衣住行〉，《中原文化叢書》第二集，「客家風土」，頁 4。

[33] 侯清，〈記憶中的梅縣〉，《中原文化叢書》，第一集，頁 13。

[34] 溫開允，〈懷竹香村〉，《中原文化叢書》，第二集，頁 31-32。

[35] 丁流，〈山青水秀懷豐稔〉，《中原文化叢書》，第五集，頁 9。

[36] 明，〈憶南臺〉，《中原文化叢書》，第四集，頁 28-30。

〈客家語韻母表〉、〈客家語聲母來源圖〉、〈客家語韻母來源圖〉、〈客家語陰聲陽聲對轉圖〉；吳鴻安〈客家話〉；雪鴻〈方言談趣〉；杜鵑〈客家常用字彙〉；慈莊〈含義文雅的客家語言〉；夏冰〈有關客家話及其它〉

陳運棟先生十分肯定黃基正在《中原》月刊發表的客家語言相關論著，認爲黃基正以自創的改良式注音符號爲音標，先就聲母，韻母的發音方式加以描述，再繼以客語語音與國話語音之比較，其次是方言詞彙。完全是以中古音爲基準，以比較中古音系與其時音系的發展爲主軸，點出客家話與其他方言之區別。陳運棟表示，他於民國 67 年出版《客家人》一書，其中〈客家話的面面觀〉一篇完全襲用本書的看法及音標，包括音系的來源，古今音的參照，及陰陽對轉等等。[37] 綜觀其對於客家語之標音，顯非根據在臺灣的調查所得，而是作者憑其音韻學之理解及自身經驗而來。

除了記音之外，對客家語言的表述，多強調係中原正音。如黃基正，〈客家語言研究〉中言，「客家人的祖先，大都是從中原一帶遷來，因此他們的語言，和中國北方各省並沒有很大的差異」，「他們的語言之中，含有許多古代雅言的成分」。[38] 並言客家人在閩粵贛大本營中，「保存了中華民族傳統的語言，尤其是唐宋時代的語言」。[39] 此外，也已注意到臺灣客家內部的不同腔調的，如言苗栗一帶，「語言的腔調，略分四縣與海陸兩系」。[40]

在當時政府高唱反攻之際，高談客家語，《中原》月刊的作者提到此時詳細論究客家語言的原因是，一則可免客人不知客話，並可知其由來；二則可激發其愛鄉愛國愛民族的心。，正值反攻報國之際，高談客家話，作者的理由是表達「熱愛國家民族的精神」，「以冀愛臺而愛國之意焉耳」。[41]

4. 客家山歌

相關篇章有：該刊資料室〈客家山歌大合唱〉、〈民謠的冥搜、博採與發揚〉、〈民謠搜沈記〉、〈客家山歌瑣談〉、〈客家戲上電視〉；鍾鳴〈客家歌謠研究〉；徐棠蘭〈反共民謠〉；口天〈客家山歌瑣談〉；黃基正〈山歌的形式〉；李慶榮〈客家人的山歌〉、〈山歌是怎麼樣唱的〉、〈山歌到了臺灣以後〉、〈客家人沒有戲〉、〈山歌要怎樣提倡〉、〈山歌是表達心

---

[37] 陳運棟，〈五十年來的臺灣客家研究〉，《臺灣文獻》，第 49 卷第 2 期（1998 年 6 月），頁 180。

[38] 黃基正，〈客家語言研究〉，《中原文化叢書》第一集，頁 1-31。

[39] 黃基正，〈客家語言研究〉，《中原文化叢書》第一集，頁 3。

[40] 吳鴻安，〈客家話〉，《中原文化叢書》，第一集，頁 2。

[41] 吳鴻安，〈客家話〉，《中原文化叢書》，第一集，頁 5。

意〉、〈有挑逗的山歌〉、〈山歌和無神論是有關係的〉；林德鳳〈詩與山歌〉；靜野〈客家民謠大放異彩〉；鎮平阿哥〈閒話山歌抒一時〉；陳彰〈漫談客家山歌〉；中元〈客家人的「盤歌」〉；鴻〈欣聞客家民謠出國〉

《苗友》自創刊以來，極十分重視客家歌謠之記述、推廣。發刊以來即分闢「客家山歌瑣談」，及客家民謠研究兩欄，資爲搜集研究，[42] 爲戰後臺灣提倡搜集、研究、改進、發揚民謠之開風氣之先者。創刊之初，即於 1962 年提倡舉辦第一次的客家山歌比賽大會，在苗栗山城造成空前盛況。並首先提倡以民謠編成「山歌緣」的戲劇，爲日後「山歌戀」和客語電影的演出和放映催生。1966 年乃有第一部客家語片「八仙鬥法海龍王」的攝製，[43]「大陸與臺灣，確係前無所聞」。[44] 並曾刊出「客家歌謠專輯」第一、二集，合約四十萬言六千首問世，與國際唱片行合作出版「調情與熱戀」唱片，爲愛好民謠人士所樂用。[45]

5. 客家名人軼事

相關的篇章有：該刊資料室〈客家先賢宋湘軼事三則〉、〈光昭瀛海鄒洪將軍〉、〈丘仙根與黃公度〉、〈羅芳伯在西婆羅洲建國之遺蹟及流風餘韻〉、〈丘逢甲與丘念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悼念本刊創始贊助人省府委員鄒清之先生〉；雪鴻〈李二何傳〉；松橋〈李二何教閻王太子書〉；知音〈宋湘軼事〉；侯蔚萍〈李文固軼事〉；雪鴻〈邱玖華軼事〉、〈口大吞天——葉新蓮軼事〉、〈葉新蓮軼事〉；宋子武，〈亦談嘉應才子宋湘〉；哲愚〈丁日昌父子政績文采〉、〈曉通洋務的翰林何如璋〉、〈大埔才子張儀坡〉、〈忠孝兩全的林丹九〉、〈行潔志芳的李世熊〉、〈長於吏事的黎士弘〉、〈清史循吏傳中的林達泉〉、〈紀念陶遂齋主李志陶兄〉、〈明處士廖柴舟〉、〈李翼中的生平志事〉、〈洪將軍紀念碑歌〉；韓江〈文武双全的羅卓英將軍〉；思正〈吳訓恪六奇的功勛及其風義〉；李創〈客家英雄洪秀全〉；張迅，〈客家先賢丘念臺生平〉；陳拱初〈談明朝大儒丘瓊山〉、〈與歐上將雨辰唱酬之追憶〉、〈悼念廖遜我君〉；夏冰〈懷侯昌齡先生——兼述當年朱毛匪幫偷襲梅城始末〉；周燕謀，〈丘逢甲永不忘臺〉；廖偉光〈故鄉人物逸事〉；羅香林〈羅應平先生事略〉；張鏡影，〈鄒魯先生傳〉；

---

[42] 〈復興文化，提倡民謠〉，《中原文化叢書》第三集，頁 1-2。如有口天〈客家山歌瑣談〉、黃基正〈客家歷史歌〉、〈山歌的形式〉、鍾鳴〈客家歌謠研究〉、李慶榮〈客家人的山歌〉、〈山歌是怎麼樣唱的〉、〈山歌要怎麼提倡〉等文之刊載。

[43] 〈雙龍公司完成首部客家語片〉，《聯合報》，1966 年 4 月 27 日，版 8。

[44] 〈客家山歌瑣談〉，《中原文化叢書》第三集，頁 39。

[45] 〈民謠的冥搜、博採與發揚〉，《中原文化叢書》第三集，2。

孫科〈恭述國父二三事〉等；陳拱初，〈客家先賢丁日昌的經綸及其藏書〉、〈詩傑黃公度傑作舉隅〉、〈黃公度詩的評價與其詞的蒐逸〉。

人物方面，主要記述當代客籍人物傳略，及客家的歷史人物。在歷史人物方面，有以住居地認定客家之情形，故明代世居粵省紫金縣的鍾鎮魯，[46] 廣東曲江的廖燕，[47] 唐代原籍廣東曲江的張九齡，[48] 都被認爲是歷史上的客家名人。此外，喜談歷史上與中國及臺灣皆有關係的人物，如丘逢甲。

除了歷史人物外，對於當代已過世之客屬政要，亦多爲其立傳表述，如李翼中、鄒魯、丘念臺、羅卓英、鄒清之等人，其中外省、半山、本省客家皆有。在一則專述半山客家鄒清之的短文中還提到，鄒清之是該月刊創始贊助人，對該刊「發掘並發揚中原客家文化之獨特風格，曾極力推許，並對本社同寅常不斷予以有力之鼓勵及支持」。[49]

6. 客家與國民革命

相關篇章有：該刊資料室〈記革命先烈羅福星〉、〈同盟會員張如川〉、〈羅福星烈士別紀〉、〈羅福星烈士其人其事〉、〈惠州革命烈士羅仲霍〉；江鳥〈革命巨子謝良牧先賢事略〉；孫以蒼，〈革命記者方南〉、〈客家志士與黃岡之役〉、〈謝逸橋的革命志節〉、〈溫生財烈士就義記〉；史元〈茂宜島與國父的革命事業〉；蘇兆元〈客家精神與國民革命〉；中元〈國父與羅福星〉；陳拱初〈海豐鍾鐵肩壯烈殉國的經過〉；〈追念鄉先烈士溫生才〉等。

內容多強調客家在國民革命中的貢獻，如言「參加黃岡之役的革命志士，多屬客家人士」，是役領導人物 40 餘中，客家即占 30 餘人。[50] 因此認爲，「客家人的精神就是中華民國精神的發皇，如果說客家人的精神就是亞洲民族精神的延長」。[51] 引據羅香林的考證，論述孫中山亦客家人是另一個重點，以及頗側重在臺灣進行革命活動的羅福星之角色，認爲「羅福星的革

---

[46] 廖偉光，〈故鄉人物逸事〉，《中原文化叢書》，第五集，頁 73。

[47] 哲愚，〈明處士廖柴舟〉，《中原文化叢書》，第三集，頁 32。

[48] 哲愚，〈由梅縣相公坪談到曲江張九齡先生〉，《中原文化叢書》，第三集，頁 37。

[49] 〈悼念本刊創始贊助人省府委員鄒清之先生〉，《中原文化叢書》第三集，「客家掌故」，頁 107-108。

[50]孫以蒼，〈客家志士與黃岡之役〉，《中原文化叢書》，第四集，「客家掌故」，頁 57。

[51]蘇兆元，〈客家精神與國民革命〉，《中原文化叢書》第四集，「客家掌故」，頁 79。

命是臺灣史乘最具偉大意義的革命運動」。[52]

7. 臺灣本地客家相關

相關篇章有：該刊資料室，〈苗栗山胞史話——山胞是百越族同源，由大陸移來的〉、〈貓裡的故事〉；張琴龍〈六堆史話〉；陳彰，〈續談臺灣客家婚俗〉；香岩〈苗栗鄉鎮名考〉、廖素菊〈現代美濃客家的婚俗〉、臺木廓〈臺灣客家春節風俗〉；徐瑞雄〈本省客家鄉村社會的若干變遷〉；李思德，〈新竹縣開拓的經過〉；瑞白〈魚藤坪鄉俗憶趣〉、徐桂華〈客家人在甲仙〉；陳城富，〈六堆忠義祠史略〉；葉蒼秀〈苗栗義民廟〉。

整體來看，在中原月刊的文章中，臺灣本地客家的部分顯得寥寥可數，且重要多在強調臺灣與中原的關係。如陳槃，〈苗栗縣鄉土文化教材序〉：

> 蓋苗栗同胞者，血統優秀之民族也，大多數為來自廣東東部之客家；閩南同胞占小部分，山胞則更少矣。夫客家者，諸夏舊姓，因中原禍亂，異族憑陵，流離南渡，一再轉徙而至粵東，復因粵東地陋民稠而飄泊臺島。此等文明華胄，民族性特強，且刻苦耐勞，長於創建。即閩南同胞，亦只是遷地不同，因之語言、生活、習俗各異；至於民族原流，文化傳統，無例外也。耆英若進士鄭祉亭用錫，丘仙根逢甲，舉人若吳芸閣子光，抗日志士若吳湯興、徐驤，革命先烈羅福星之儔，是其文章學問志業事功，爛焉可述者也。[53]

或強調臺灣與中國大陸緊密之關係，如古木廓〈臺灣客家春節風俗〉，「臺灣的客家人，大多數都是來自大陸兩廣的移民」。[54]

即使如此，我們也不能否認，苗友及日後更名的中原月刊，發刊之初即以發揚客家文化爲宗旨，其對客家語言及文化的保存發揚，其實貢獻頗著。我們不能抹煞《中原文化叢書》系列的成就，它蒐羅、整理並紀錄各地客家歌謠的歌詞與曲譜，還鼓勵創作改良山歌，連載客家語言，爲今日留下不少珍貴資料。

---

[52]中元，〈國父與羅福星〉，《中原文化叢書》第五集，「客家掌故」，頁 18。
[53] 陳槃，〈苗栗縣鄉土文化教材序〉，《中原文化叢書》第四集，頁 7。
[54] 古木廓，〈臺灣客家春節風俗〉，《中原文化叢書》第三集，「客家風土」，頁 17-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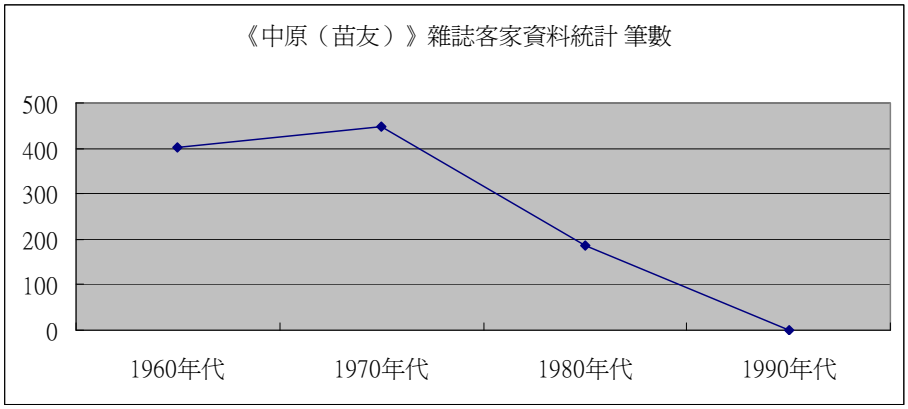


圖 5-4 《苗友（中原）》雜誌客家資料統計圖

資料來源：陳逸君，〈眾裡尋「客」千百度——一個需要重新書寫臺灣族群史的時代〉，收入陳逸君主編，《臺灣客家關係書目與摘要〔專書、論文、研究報告類〕》（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 10 月），頁 35。

依臺灣文獻館《臺灣客家關係書目》中所蒐資料顯示，60 年代及絕大多數 70 年代的書目筆數，都來自《中原》一至七集，即那二十年間的客家書目，大部分的內容幾乎都直接涉及客家族群，又都出自客家人之手，且以雜談性、一般性的篇章或短文居多。[55]

除了引介客家源流外，更多的是外省客家人的原鄉記憶，由對客家原鄉的介紹，牽起客家與中國地理的關係，由客家歷史人物的記述及客家與國民革命，牽起客家與中國歷史的關係，丘逢甲、羅福星等人物記述，牽起臺灣與中國之關係。

多為外省客家的記憶陳述，名為〈春節舞龍獅〉，內容寫的是廣東梅縣一帶的舞獅隊。[56] 名為〈客家食譜〉，寫的多是未必與臺灣客家飲食相同的大陸原鄉名菜，如白切雞、鹽焗雞、無骨燒雞、芙蓉肉……。[57]

在記述中甚至認為外省客家被迫遷居臺灣，有如客家歷史上的遷徙歷史，如言「三十八年來臺同胞，也多是衣冠之族，也和當年流人一樣，書至此，不勝感歎」。[58] 或如梁寒操言，「今日大陸同胞的追隨政府，東遷來臺，

[55] 陳逸君，〈眾裡尋「客」千百度——一個需要重新書寫臺灣族群史的時代〉，收入陳逸君主編，《臺灣客家關係書目與摘要〔專書、論文、研究報告類〕》（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 10 月），頁 36-37。

[56] 葉飛，〈春節舞龍獅〉，《中原文化叢書》，第一集，頁 13。

[57] 良記，〈客家食譜〉，《中原文化叢書》，第一集，頁 19-22。

[58] 〈十目十手參客家掌故〉，《中原文化叢書》，第一集，頁 2。

以臺灣爲基地圖謀復國建國的情形，和當年客家人自中原南移的情形，正復相同」，並認爲因此客家人更應負擔保國保種，保存傳統文化的使命，並作最大的貢獻，才無愧於他們祖先遺留下來的傳統精神和歷史使命。[59]

（三）同鄉會刊物之「中原客家」論述

戰後外省客家所組成的同鄉會，頗致力於以同鄉爲主刊物之發行，或原籍方志之重刊。在各同鄉會的刊物中，也常可看到許多中原客家的相關論述。謝漢烈，〈從客家源流談到蕉嶺人在臺灣〉：

> 「客」、「客族」、「客家」的名稱，在唐書食貨志，及宋初樂史之太平寰宇記，宋神宗敕撰之元豐九域志諸書中，已屢見不鮮。客家本是中原漢族，根據名史學教授羅香林先生的考據，認為客家南遷共分五個時期……根據何吟先生的考據，認為客家南遷前後共三次：……所謂客家的意義，就是遷徙的農民，亦是客居異地之意，一直至十世紀後才用來專指某一部份的移民。所以客家祖先，大都為變亂失去原籍的難民集團，他們成群結隊逃難，為尋求「片瓦存身」，又因其語言、風俗習慣另成一系，所以被稱為「客家」。這不過是比逃亡者或難民一類的名詞好聽罷了。[60]

郭衍賽，〈大埔沿革史〉：

> 漢族中的客家民族，原居於今河南安徽、山西等地城。東晉永嘉以後，漢族天下為匈奴族所破壞，中原逃難的漢族，向南播遷，客族也在其中自北南徙，故自東晉至隋唐，是客家南遷的第一時期。[61]

廖英鳴，〈同鄉會成立三十週年祝詞〉：

> 我們客家的祖先，原聚居於今日河南省的中原，五胡入侵時，由北南下，入安徽西部之霍丘、六安、舒城一帶。唐末黃巢作亂，更大批南遷皖南鄂東而入贛入閩。近代吾邑之名史學家羅香林等等，都可謂吾客家人南遷後到廣東之佼佼者。客家後裔，向來重視教育，勤於耕種，性格堅忍，守信講義，而且極為團結，始有今日人丁之繁衍，和優良文化之產生。[62]

羅定球，〈同鄉會成立三十週年祝詞——光輝的回憶〉：

---

[59] 梁寒操，〈代序——客家人來源和使命〉，《中原文化叢書》，第二集。
[60] 謝漢烈，〈從客家源流談到蕉嶺人在臺灣〉，《臺北市蕉嶺同鄉會 23 週年年刊》，頁 5-7。
[61] 郭衍賽，〈大埔沿革史〉，《大埔會刊》，頁 50-52、61。
[62] 廖英鳴，〈同鄉會成立三十週年祝詞〉，臺北市興寧同鄉會編，《臺北市興寧同鄉會會刊》，第 1 期（1985 年 2 月），頁 27。

查興寧縣民，原是中原民族，自五胡亂華及南宋之亂避難，由河南省南下，經浙江福建沿海至江西廣東，找尋安居之所，已經過相當苦難，始決定在廣東東江興寧定居。[63]

思菱，〈歷史上客家人的大遷徙〉：

客家人原本居住在中原地區，也就是現今河南省一帶，第一次大遷徙是在五胡亂華，第五次大遷徙是在清朝末年太平天國起義末期。[64]

多原鄉記述，及同鄉人物傳略，反映的也是外省客家的原鄉記憶。

臺灣最早發行客家書籍的是時任屏東縣立長治中學校長後任逢甲大學教授的郭壽華，於民國 53 年自印《客族源流新志》。郭壽華表示，編撰該書的動機，「在發揚客族精神，也就是發揚中華民族精神」，[65] 希望「客族同胞在反共抗俄大時代中，在民族救星蔣總統的領導下，充分發揚其民族奮鬥精神與美德」。本書主要目的在發揚中華民族團結精神。[66]

對於客之名稱，沿羅香林所言，「客」、「客人」、「客家人」、「客族」的名稱，在唐書食貨志，及宋初樂史之太平寰宇記，宋神宗勅撰之元豐九域志，南宋王象之著輿地紀勝諸書，均屢見不鮮。關於客之源流與遷徙，則並陳范錡、羅香林、沈吟的說法，范錡主張客人來源有三：第一批來自秦朝；第二批客人來自東晉南渡；第三批客人來自南宋南遷。何吟也認爲客家人南遷前後凡三次，以及羅香林的客族南遷五期說。[67]

（四）1970 年代世界客屬總會與「中原客家」論述

香港崇正總會成立於民國十年（1921）9 月 29 日，由當時香港大學首任中文系主任賴際熙翰林，及僑商李瑞琴、黃茂林、廖新基、徐仁壽、古瑞庭等所發起創立，及後胡文虎、陳承寬暨張發奎將軍奔走呼號，繼起努力，得以發揚光大。本會創立之宗旨，在聯絡國內各地、海外各埠同系人士，考

---

[63] 羅定球，〈同鄉會成立三十週年祝詞──光輝的回憶〉，臺北市興寧同鄉會編，《臺北市興寧同鄉會會刊》，第 1 期（1985 年 2 月），頁 32。

[64] 思菱，〈歷史上客家人的大遷徙〉，臺北市興寧同鄉會編，《臺北市興寧同鄉會會刊》，第 12 期（1996 年 1 月），頁 17-18。

[65] 郭壽華，《客族源流新志──客家精神及文獻》（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3 年 3 月第一版；1964 年 9 月 4 版），頁 1，自序。

[66] 郭壽華，《客族源流新志──客家精神及文獻》，頁 2，自序。

[67] 郭壽華，《客族源流新志──客家精神及文獻》，頁 4-13。

證客家源流，交換知識，振興工商事業，興學育才，共謀公益，互勉同人，發揚志業，建立全球客家崇正聯合總組織。[68]

除了香港，南洋一帶亦有客屬總會之成立，由胡文虎等人於 1929 年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客屬總會，團結在南洋僑居的客家人。1937 年擴大組織，推動組織南洋各地客屬公會，響應成立者達 50 餘個單位。[69]

胡文虎爲凝聚客家意識，連結各地客家形成強大的社會網絡，進而可以對僑居國爭取相關權益與影響當局的政策。亟須客家論述以凝聚客家意識。[70] 因此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出版後，胡文虎即以此書之關於「客家族源」的基本立論來宣揚客家族群意識，催促同仁在往赴各地倡組客屬公會時，推銷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並乘機宣傳和督促。[71]

1950 年香港崇正總會爲紀念三十週年，乃出版《三十週年紀念特刊》，由其時理事長「胡文虎先生之助，撥巨資禮聘羅香林主編。羅香林在該書中，不僅撰寫海外的客屬社團，也將撰寫的〈客家源流考〉於該書中刊出。[72] 可見，戰後初期的中原客家論述，隨著羅香林移居香港，「中原客家」論述在此持續發揚。

民國 60 年（1971）9 月，香港崇正總會成立五十週年，暨崇正大廈落成，決定在香港舉行世界客屬懇親代表大會，並計劃建立世界客屬組織，認爲是世界近七百萬客屬人士團結里程碑，由於各地代表及祝賀團至港後，安排順道至臺灣參加六十年國慶，故曾函請外交部要求各地使領館予以協助。[73] 此「世界客屬第一次懇親大會」共邀請世界各地 47 個客屬團體，共 250 名代表，臺灣部分則由臺北市中原客家聯誼會、臺灣高雄市中原客家聯誼

---

[68] 黃石華，〈崇正同人系譜重印序言〉，《崇正同人系譜》（香港：香港崇正總會編印，1995 年 9 月；1921 年原刊）。

[69] 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香港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1971 年 9 月）。

[70] 楊國鑫，〈臺灣的客家問題、客家運動與客家學〉，臺灣客家研究學會、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等主辦，「臺灣客家運動 20 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 年 12 月 8、9 日，頁 1-38。

[71] 張侃，〈胡文虎與馬來西亞客家社團關係初探〉，收入林金樹主編，《中華心．客家情──第一屆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吉隆坡：馬來西亞客家學研究會，2005 年），頁 43-76；元一，〈客屬海外各團體之組織與發展〉，收入香港崇正總會編，《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1950 年 12 月），頁 14，北婆羅洲西海岸客屬公會。

[72] 李志剛，〈羅香林教授在港對客家學之拓展及與客家社團之關係：紀念羅香林教授抓世二十週年〉，收入徐正光主編，《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歷史與社會經濟》（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0 年 12 月），頁 124。

[73] 〈總統頒發香港崇正總會五十週年金禧典及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特刊題詞〉，收於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 0671.01/2034.01-01，香港澳門僑情。

會、臺北市惠州同鄉會、臺北市大埔同鄉會、臺北市梅縣同鄉會、桃園縣客家民謠研究促進會，及個別代表受邀與會。[74] 此次客屬懇親大會被譽爲海外華人團結的新里程碑，及海外華人洲際聯誼活動之嚆矢。[75]

香港崇正總會在此次客屬懇親大會中，原本希望趁此金禧懇親代表大會，讓香港崇正總會成爲「名實相符的世界客屬組織」[76]，將「加強海內外客屬團結，增進同僑福利，實現先人遺緒，建立世界客屬組織」排入大會討論的中心議題之一。[77] 經會中討論後也決議通過，各地客屬社團加入香港崇正總會爲團體會員，此後每兩年輪流在世界各地舉行世界客屬懇親代表大會一次，由當地崇正會或客屬團體負責籌備，並由總會協助，下次大會在臺灣舉行。[78] 或許於由決議未必明確指出由香港客屬總會成立「世界客屬組織」，以及當時香港爲英國殖民租界地，這類具國際性質的組織，未得到英國方面的應允等因素，[79] 因此 1971 年由香港客屬總會召開的客屬第一次懇親大會並未如願地成立「世界客屬總會」。

臺北市中原客家聯誼會被指定籌辦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後，於 1972 年 10 月 28 日假立法院召開籌備座談會，參加者有在臺之客屬立監委員、國大代表、黨政學工商文教各界七十餘人，一致商定接受香港第一次大會決議，召開第二次大會，即日成立籌備委員會，推定翁鈐爲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黃國書、劉闊才、鍾皎光、戴仲玉、賴順生、王昇、魏崇良、徐傍興、劉昆祥、楊尙霖等 240 餘人爲籌備委員，並於 1973 年 2 月第一次籌備委員會議通過大會計劃綱要及組織簡則，決議爲配合十月慶典，定於當年（19763）年 10 月 5-7 日在臺北市召開「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敦請薛岳爲大會會長，孫科、黃國書、余俊賢、張發奎及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圭亞那（總統）張亞瑟、千里達（總督）何才等爲名譽會長，暨陳大慶、羅香林、黃石華、吳達和（美國夏威夷前任副州長）等爲指導委員或顧問。[80]

---

[74] 丘權政，《客家與香港崇正總會》（北京：新華書店，1997 年 10 月），頁 226。

[75] 黃石華，〈崇正同人系譜重印序言〉，《崇正同人系譜》（香港：香港崇正總會編印，1995 年 9 月；1921 年原刊）。

[76] 〈港崇正總會慶金禧 大廈重建落成開幕〉，《中原》，第 92 期（1971 年 10 月）。

[77] 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香港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1971 年 9 月），頁 21。

[78] 〈崇正總會世界客屬懇親代表大會會議錄〉，刊於香港崇正總會編，《香港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1995 年），頁 40-43。

[79] 葉日嘉，〈兩岸客家研究與客家社團之政治分析──以「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為中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頁 114。

[80] 〈呈請主管官署准予召開大會申請書〉，藍萼洲主編，《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實錄》，頁

在向內政部申請召開大會的申請書中表示，客屬人士遍佈世界各地，約佔華僑總人數三分之一，當國家正須加強對外關係，策進總體外交之日，邀請其各階層領導回國集會，不僅可加深海外客屬對自由祖國之應有認識，促進團結合作，充實僑社擁護政府之力量與行動，實足以發揮影響號召功能，提高國民外交成效，而有助於我反攻復國任務之完成。[81]

在臺客家政商學界有力人士，運用此機會，以有利國民外交，爭取海外客屬僑民力量爲理由，向政府要求在臺舉辦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在臺灣客家（不論本外省）希藉此提升客家族群之政治力量與社會能見度，也向國家證明客家不容忽視之族群力量。由臺北市中原客家聯誼會及籌辦第二次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的客家成員來看，匯集了本外省及半山客家。

1973 年 10 月 5-7 日，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在臺北舉行，海內外與會者達 2200 餘人，其中由海外 30 餘地區返國參加者 7 百餘人。配合此次懇親大會，國立歷史博物館配合舉辦「客家文物藝術展覽」，郵政總局發行記念郵票等，「熱烈盛大情況，爲民間組織集會之前所未見」。期間並安排與會人員向忠烈祠致敬，及參觀郊區建設等行程，「四十餘輛大遊覽車，由警官車開道，浩浩蕩蕩，蔚爲壯觀」。[82] 大會名譽會長，時任監察院院長的余俊賢在會中表示，「召開客屬懇親大會的目的，就是要每個客家人，都能發揚民族意識，進而跟全國同胞一致，完成反攻復國的神聖使命」。[83] 該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翁鈐則表示，客屬應以孤臣孽子、義不帝秦的傳統精神，發揚民族大義，擁護政府，支持反共國策，以爭取最後的勝利。[84]

值得注意的是，本會召開期間，亦邀請羅香林與會，安排發表以〈客家源流考〉爲題的專題報告。該文並經大會秘書處印贈。取得官方爲中原客家論述背書之效應，也再次加強羅香林客家論述的權威地位。

除三日正式集會外，尚有大會一致議決在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籌設「世界客屬總會」，以便推動客屬團結工作，並指定交由臺北市中原客家

167。

[81] 〈呈請主管官署准予召開大會申請書〉，藍萼洲主編，《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實錄》，頁 167。

[82] 藍萼洲，〈「客家人」及「世界客屬總會」簡述〉，《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實錄》，頁 80。

[83] 湯熙勤，〈全球客屬僑胞大團結〉（《民族晚報週刊》，1973.9.14），藍萼洲主編，《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實錄》，頁 106。

[84] 翁鈐，〈發揚中原精神，負起時代任務〉（《民族晚報》，1973.10.5），藍萼洲主編，《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實錄》，頁 120。

聯誼會積極籌組。[85]

其實當時依國內法令規定，不能成立全國性社團組織，官方立場表示，如有援例申請全國性組織者，政府甚難核處，但考量到政治情勢及聯繫海外僑胞起見，如情形特殊，基於政策上之需要，經專案核准者，可准其召開聯誼性或全國性會議，惟不能成立常設機構。[86] 而世界客屬組織得以獲准在臺北成立，想必亦是特殊考量下的特例。[87]

1972 年臺灣退出聯合國之後，國民黨政權處境艱難，為了爭取海外華僑的支持，特別因為華僑中客籍居多，尤以東南亞為盛，在官方支持下，臺北市崇正會舉辦「第二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藉以爭取華僑對國民黨政權的支持。[88]

1971 年香港客屬總會得以客家為名，號召海外客屬響應，客屬團體之作用與能量遂為中央所重視，並盡力扶植認為是一股建設國家的強厚支援力。[89] 政府退守臺灣以來，相當重視爭取海外華人之支持，由於中華民國已脫離中國大陸，因此號召海外華僑者已難用鄉土認同，轉以政治認同為號召，而當時用以號召海外華僑的政治認同，即訴求長期以來從國民革命、北

---

[85] 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實錄編輯委員會編，《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實錄》（臺北：世界客屬總會，1974 年），頁 277-304。針對在臺北組織世界客屬總會，香港崇正總會代表黃石華曾表示疑義，認為「第一次代表大會已有決議」，請與會者再加考慮。然遭臺灣方面代表以「臺北市中原客家聯誼會」與預籌組之「世界客屬總會」，因功能不同，且互不隸屬為由反駁；日本崇正總會代表邱添壽及越南代表團劉練又分別質詢黃石華關於上次會議決議案之執行情形，經幾番爭論，由藍萼洲以時間已晚為由，請主席停止與大會無關之發言，而經主席宣佈，隨即散會。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實錄編輯委員會編，《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實錄》，頁 317-318。

[86] 法令說明不能准予組織全國性組織之原因，係認為國內各縣市現有之宗親會、同鄉會擁有財產者甚多，一旦准予成立全國性組織，勢必引起糾紛。〈研商有關廣東中山同鄉會成立世界性組織問題〉，收於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 0670.05/2217.02-02，僑務會議。

[87] 其實，在世界客屬組織成立之後，已有「世界中山同鄉鄉會」成立之特例。1970 年，臺北市中山同鄉會聯合紐約、舊金山、檀香山、香港、大溪地、菲律賓各地同鄉共同發起籌組「世界中山同鄉鄉會」，此乃政府第一個准許立案的世界性同鄉組織。根據臺北市廣東同鄉會常務理事勞穗生所述，「世界中山同鄉總會」能設立係由於「第一，中山縣是全國唯一模範縣；第二是當年國父哲嗣孫科先生以親自拿著公文請見總統蔣公批准的」，並認為此例不能再開。然不久，又有世界客屬組織的成立。鍾艷攸，〈政治性移民的互助組織──臺北市之外省同鄉會（1946-1995）（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 5 月），頁 110。

[88] 林吉洋，〈敘事與行動：臺灣客家認同的形成〉（新竹：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7 月），頁 26。

[89] 〈為香港崇正總會金禧大慶獻詞──並歡迎與會代表回國參觀〉，《中原》，第 91 期（1971 年 9 月），頁 3。

伐、抗日的共同歷史記憶，[90] 政府也以此政治號召，將自己定位爲「自由中國」，將臺灣定位爲「復興基地」，完成在臺之中華民國成爲「代理祖國」之程序。

當時爭取海外華僑支持之方式，除政治宣傳外，並時常辦理華僑回國觀光，以增加華人對在臺的中華民國產生認同感。[91] 在國內則以客屬總會爲首，分別成立地區性分會，以合併原有的客家社團，而後致使客屬總會系統的傳統客家社團長期傾向支持國民黨。[92] 因此自 1950 年代起，政府即積極鼓勵海外華僑組團返國觀光。[93] 戰後臺灣陸續成立之客屬同鄉會，因此一直負擔招待歸國客屬僑團之任務，如 1963 年北市中原客家聯誼會、梅縣、蕉嶺、廣東同鄉會爲熱烈歡迎香港、泰國、菲律賓、牙買加、馬來西亞、南非及南美等地回國參加國慶的客籍僑胞 80 多人，乃於北市新陶芳設宴招待，中原客家聯誼會理事長翁鈐代表致歡迎詞，表示歡迎回國僑胞，看看祖國的進步實況。[94] 苗友雜誌社發行人兼社長謝樹新爲表示歡迎，特地從苗栗遠地趕往赴會，並攜帶「苗友」一百多冊，分送僑胞。[95]

世界客屬總會便在這樣的環境下成立。臺北中原客家聯誼會受大會議決之託，乃邀集國內客屬續商辦理，經政府核准，於 1974 年 8 月間發出通知，定 10 月 11 日在臺北舉行會員大會，選舉理監事，成立「世界客屬總會」。[96]以臺北市中原客家崇正會爲骨幹，在臺灣各地成立分會，並成爲執政黨的外圍組織。[97] 楊長鎮認爲，「世界客屬總會」及其在臺灣各縣市成立的分會，可能是在臺灣的客家人的第一次客家運動。透過客家仕紳的參與，足以構成族群意識的動員：首先是「在臺灣的客家人作爲中華民族中漢族正統的一部份」，其次是潛在、意外，但可能有更深遠影響的「臺灣各地分散或鄰近的

[90]李道緝，〈建構「新祖國」——鄭彥棻時期（民國 39-47 年的僑務工作）〉，頁 187、192。

[91] 彭佩琪，〈國民黨政府在美僑社的僑務工作（1949-1960）〉（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6 月），頁 82-83。

[92] 林吉洋，〈敘事與行動：臺灣客家認同的形成〉（新竹：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7 月），頁 27。

[93] 黃辰濤，〈爭取海外力量：中華民國外交、僑務、黨務在新馬的運作（1945-1957）〉（南投：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2 月），頁 104。

[94]〈北市中原梅縣蕉嶺廣東同鄉歡迎返國僑胞情況至為熱烈〉，《苗友》，第 2 卷第 6 期（1963 年 11 月），頁 11。

[95]〈會場拾零〉，《苗友》，第 2 卷第 6 期（1963 年 11 月），頁 11。

[96] 藍萼洲，〈「客家人」及「世界客屬總會」簡述〉，《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實錄》，頁 80。

[97] 陳康宏，〈臺灣客家社團的概況研究〉（上），《客家雜誌》，第 93 期（1998 年 3 月），頁 15。

客庄人群作爲同一族群」。[98]

1973 年的懇親大會與 1974 年世界客屬組織成立，對臺灣的客家族群而言，無疑大大地提高被認識的能見度。如曾任懇親大會籌備會秘書長的藍萼洲即之示，客家人很少道明自己是客家，一般人甚至客家人自己，對客家的一切都甚少明瞭。經上述二次集會之後，國內外報章雜誌電視廣播等，連番介紹報導之後，國內外各地各界關心時事的人，才對客家人有進一層的瞭解。[99]

「世界客屬總會」的會務與功能，因爲社團定位與服務對象的選擇，充其量是個國民黨執政下整個僑務與外交外圍組織的其中一支。臺灣很切實的充當了這個代理「中國」的角色，遂使海外客屬僑民搭上這股順風車，而對「世界客屬總會」有了認同，也使國民黨在推動僑務政策上，因爲這樣的結構成爲可能。[100]

隨著中華民國政府的治臺，中華民族主義也在臺灣正式運作，在這個「民族主義包裹」中，也夾帶著「中原客家」論述的移入。除了「中原客家」論述的移入外，戰後來臺的新客家成分，與本省客家有著因方言認同而產生的連繫交往，以及 1970 年代「世界客屬總會」在臺灣成立，不僅產生臺灣客家繫屬爲「中國客家之一支」的族界圖像，也被用以作爲號召海外客屬力量的工具。在臺灣的少數族群地位，以及被方言認同與「中原客家」論述所吸引，於是臺灣的客家被認爲依附官方，悖離本土，而處於邊緣而尷尬的角色。

由上亦可知，羅香林在「中原客家」論述的權威地位，是逐步建構逐步穩固而來的。1933 年從學術論究客家，從譜牒溯源、客居地追溯歷史與當代名人、客語爲中原正音、客家與革命關係等，皆已爲客家之正名提升地位貢獻良多。1950 年所著〈客家源流考〉，先在 1950 年 12 月刊於《香港崇正總會三十周年紀念特刊》，1971 年 9 月，又被收入《香港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1973 年在臺北的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中亦受邀發表以此爲題之專題報告，會後並印發贈送。不僅廣泛流傳，且經不同地區客屬重要組織及官方之肯定，故而逐步建立其在客家論述的權威地位。

---

[98] 〈民族工程學中的客家論述〉，網址：http://taup.yam.org.tw/PEOPLE/961116-3.htm；檢索日期：2010 年 8 月 2 日。

[99] 藍萼洲，〈「客家人」及「世界客屬總會」簡述〉，《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實錄》，頁 79。

[100] 葉日嘉，〈兩岸客家研究與客家社團之政治分析——以「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為中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頁 130。

（五）1980 年代以來的客家專著

1978 年，陳運棟的《客家人》問世，是當時臺灣第一本由臺籍客家撰寫之關於客家源流及歷史的專書，沿用羅香林的民系說法，並述源流、分布，及客家東移臺灣的路線及分布，客家話的面面觀，常用詞彙、諺語、山歌，以及客家文化的探討，基本上承襲了羅香林的論述架構和內容，足見深刻的「中原客家」敘事觀點，幾乎原封不動地接收羅香林觀點與民系遷徙描述，也同樣宣稱客家繼承中原的先裔，成爲漢族之精華。[101] 並增補了臺灣客家在地的祖籍空間分布、移入時間等，基本上完成了編入中國客家的手續。[102]

1982 年鄧迅之《客家源流研究》，先言中華民族，中國文化，客家根源（以族譜堂號資料）、遷徙及民系形成，客家入墾臺灣，客家語言、教育文化、家族制度、日常生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歌謠，特性及貢獻等。五次遷徙。[103]

1985 年雨青《客家人尋根》，先言中華民族的演變，述客家來源與遷徙，分六期，前接秦。給客制度。客家祖居地。第四章客家開拓臺灣。客家的生活習慣、民風習俗、文化。[104]

這些 1970 年代末 1980 年代間所出版的客家專著，內容大多討論客家風俗、源流與特質，或就羅香林論點加以充實，皆遵循羅香林的觀點認爲客家人爲中原正統漢族，帶有濃厚的族群自我中心主義。[105]

1989 年陳運棟再撰《臺灣的客家人》，主旨在介紹客家人如何由大陸原鄉渡海來臺，拓墾立業，生根發展的過程，內容主要有客家人的奮鬥史、客家源流另一觀點、客家人的原鄉——嘉應州及汀州府、客家人東移臺灣的路線及其流布、客家人墾殖南部地區、客家人墾殖臺中地區、客家人墾殖苗栗地區、客家人墾殖新埔地區、客家人墾殖北部地區的個案研析，該書與之前客家專著最顯著的不同在於，臺灣的比例加重。[106] 書中也反省之前全盤

---

[101] 林吉洋，〈敘事與行動：臺灣客家認同的形成〉（新竹：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7 月），頁 28。

[102] 〈民族工程學中的客家論述〉，網址：http://taup.yam.org.tw/PEOPLE/961116-3.htm；檢索日期：2010 年 8 月 2 日。

[103] 鄧迅之，《客家源流研究》（臺中：天明出版社，1982 年 5 月）。

[104] 雨青，《客家人尋「根」》（臺北：武陵出版社，1985 年 9 月）。

[105] 黃秀政、李昭容、郭佳玲，〈羅香林與客家研究〉，《興大歷史學報》，第 18 期（2007 年 6 月），頁 302。

[106] 陳運棟，《臺灣的客家人》（臺北：臺原出版社，1989 年），頁 11。

接受羅香林觀點之缺失，認爲客家方言與其他地方方言都是伴隨漢人政權統治的強化而向南並與土著語言融合，不同的方言之間都有漸層影響。不過他仍堅持客家文化作爲中華漢族文化的本質與特徵，基本上與廣義的漢人社會是無法分開的。[107]

1980 年代的這些客家專著，除依循羅香林觀點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論述脈絡中，直接將「中原客家」的論述嫁接於臺灣客家的歷史之上，即如楊長鎮所言，將臺灣客家歸屬到具有光榮印記的中國客家主體內，透過這個程序在中華國／族內安立了臺灣客家族群。對於易爲多數族群賦與負面標簽或刻板印象的少數族群而言，這是具有高度誘因的認同方向。但不能忽略的是，羅香林客家學與「中華民族工程學」構成完整的包裹，在接受光榮印記同時，臺灣客家完成了納入中華國／族的整編，從而完成將臺灣客家鑲嵌於中華民族之內的民族學工程。[108]

[107] 林吉洋，〈敘事與行動：臺灣客家認同的形成〉，頁 31。
[108] 〈民族工程學中的客家論述〉，網址：http://taup.yam.org.tw/PEOPLE/961116-3.htm；檢索日期：2010 年 8 月 2 日。

六、「中原客家」論述的影響

客家族群意識形成於受辱的過程，直至清末民初一仍如此，而這也是羅香林客家學產生的環境因素。在羅香林以前與客家相關的論述，多始終停留在族群身份的辨析，羅香林則將爭議提昇至學術層面，建構了一個客家人源自中原，經過五次遷徙，最後於宋代在閩粵贛邊形成獨立民系的學說體系，而透過這種學術研究的方式，羅香林也成功地在 20 世紀平反了客家人的形象與歷史地位。

然自 1980 年代後，由於政治局勢緩和，許多對羅香林論述內容的論辯檢討才得以開展，質疑盛行數十年的「中原客家」論述，並加以解構。然戰後以來漫長的時間中，經「中原客家」論述在臺灣的引介傳布，對臺灣及臺灣的族群關係也產生了一些深刻的影響，以下分述之。

（一）層累堆疊的誤解

戰後以來臺灣的中原客家論述，多採借引用羅香林的論述內容，但引經據典進行學術論證，而能自成一家之言的少之又少，一再的採借，一再的引用，甚至過度詮釋，因而造成對客家誤解的層累堆疊。以羅香林爲主的「中原客家」戰後以來一直居於權威論說之地位，少有質疑聲浪，然自 1980 年代後，由於政治局勢緩和，許多對羅香林論述內容的論辯檢討才得以開展，才發現以往被認爲顛撲不破的真理，其實存在相當多誤解的堆疊，以下分述之。

1. 文獻上的「客」之書寫與客家的關係

羅香林考定的客家界說對客家研究貢獻不小，但論述中也有嚴重失誤，許多人誤以爲客家之稱謂來自客戶，即與之相關。首先提出客戶說的是溫仲和《嘉應州志》，指出「主客之名疑始於宋初戶口冊。故寰宇記九域志所載，戶皆分主客，……至於元初，大抵無慮皆客。元史所載，亦不分主客，疑其時客家之名已成無主之非客矣」。[1]

客戶與客家的關係在戰後臺灣的「中原客家」論述中出現頻率相當高，

[1] 溫仲和，《嘉應州志》，卷七，頁 121-122。

且幾乎是以下定制式的文字：

> 「客」、「客族」、「客家」的名稱，在唐書食貨志，及宋初樂史之太平寰宇記，宋神宗敕撰之元豐九域志諸書中，已屢見不鮮。[2]

首先要指出的是，無論是溫仲和《嘉應州志》或羅香林〈客家源流考〉，皆只提及客家可能源於《太平寰宇記》等文獻中的「客戶」，在那些唐宋文獻中，只有「客戶」之名，而無「客族」、「客家」的說法。故上述引文無疑是一種誤解，被頻繁流傳的誤解。

《嘉應州志》以宋之客戶爲客之來源已是見樹不見林的偏差，而羅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一書中又把「客戶」從宋代前推至晉元帝「給客制度」的詔書。認爲客家的「客」字是沿襲晉元帝詔書所定，至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戶」專稱，客家一詞，則是民間通稱。

針對客家源於客戶說，已有學者加以駁斥，因爲，究其實，歷史上的「客戶」就是漢魏以來因逃避戰亂和地主壓榨而流離失所的農民，又稱流民、流人。「客戶」在戶籍管理上指的是無地或少地的流亡佃農，這種客戶，各朝都有，且流布全國。[3] 因此論者多認爲把客家和客戶混爲一談，可說是犯了一個知識性的錯誤，是一個很大的誤解。[4]

或許由於溫仲和、羅香林等人嘗試從文獻上「客」之書寫尋找客縱的論證方式，使得後來的研究者多傾向將文獻上的「客」與「客家」族群劃上等號，成爲詮釋客家歷史的有力證據，造就二者之間曖昧難明的糾葛關係。清代臺灣客家的相關研究也有此傾向，即多將史籍中的「客」全用以解釋客家源流或客家之歷史經驗，然究其實，清代臺灣史籍中的「客」應是對照「閩主粵客」而來，即「客」爲「粵」之意，非指方言人群的「客家」。

饒偉新研究贛南的客家時也發現此現象，即研究者多習慣從近代以前的文獻中搜尋出帶有「客」字的歷史術語作爲論據，來說明「客家」稱謂的由來。[5] 但是就其對贛南客家的了解，無論是明清文獻中的「客佃」、「客籍」

---

[2] 郭壽華，《客族源流新志──客家精神及文獻》，頁 4；謝漢烈，〈從客家源流談到蕉嶺人在臺灣〉，《臺北市蕉嶺同鄉會 23 週年年刊》，頁 5-7；黎耀新，〈客家源流及其播遷〉，《中原文獻》，第 2 卷第 4 期，頁 8。

[3] 張衛東、劉麗川，〈論客家研究的幾個基本問題〉，頁 94-118。

[4] 蔣炳釗，〈試論客家的形成及其與畲族的關係〉，頁 285；陳智勇，《中國古代社會治安管理史》（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85-186；陳支平，《客家源流新論：誰是客家人》（臺北：臺原出版社，1998 年 5 月），頁 154。

[5] 饒偉新，〈區域社會史視野下的「客家」稱謂由來考論──以清代以來贛南的「客佃」、「客籍」

等術語，還是後來的「客家」，其實都是不同歷史脈絡下的產物，有其特定的歷史內涵，不能相提並論。[6] 陳永海研究清代廣東新安縣土客學額爭議時，也表示將文獻上的「客籍」解釋爲客家是很有問題的。「客籍」與「客家」是不一樣的概念，那些在「移民登記」意義上爲客籍的人，未必是客家人。[7]

「客家人」並不是本來就存在的，在這個具有貶意的族群稱呼普遍流傳直到被接受之前的數百年間，存在的是個別的地方社群，它們各自表現出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他們往往以汀州、大埔或嘉應、程鄉人自稱。[8] 清代的文獻記錄也很清楚地以籍貫爲分類結構，因此有閩粵之分，有嘉潮惠之分，但是尚未有客家意識。[9] 因此不僅文獻上的「客」未必與「客家」直接相關，此外，若要追索客方言人群的早期歷史，也必須在「客」之書寫以外，從地域文化的脈絡去探索。早期臺灣從事客家研究的歷史學者，曾表示臺灣方志中能如實反映客家史的少之又少，故曾感嘆「在臺灣的地方志中發現有關客家史的論述，就令人有彌足珍貴之感」。[10] 此情形多少反映欲從文獻書寫之「客」追索客家歷史之侷限性。

近代的「客家人」意識，是清至民初廣東地區社會經濟和地域文化發展的特定歷史文化環境下，由廣東的知識精英通過運用各種政治權力和文化資源而「建構」出來的，在此過程中，特別是由於近代西方人種學的民族觀念傳入的影響，使得「客家」一詞，成爲了一個以血統、語言習俗等來界定人群的種族範疇和民系範疇。[11]

雖然客家士子們強調南遷源流與中原正音，看似爲客家文化取得源遠流長的歷史，取得文化本質恆長不變的假象，但客家意識畢竟是逐漸在不同人

與「客家」為例〉，《民族研究》2005 年第 6 期，頁 92。

[6] 饒偉新，〈區域社會史視野下的「客家」稱謂由來考論──以清代以來贛南的「客佃」、「客籍」與「客家」為例〉，《民族研究》2005 年第 6 期，頁 92。

[7] 陳永海，〈作為中國國族事業的客家言說──從香港看近代客家文化認同性質的變遷〉，收入劉義章主編，《香港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9 月），頁 24。

[8] 高怡萍，〈徘徊於聚族與離散之間—粵東客家的族群論述與歷史記憶〉（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年），頁 206。

[9] 楊聰榮，〈從族群關係史看臺灣客家的分類範疇與獨特性〉，發表於「臺灣史學客家研究研討會」，2004 年 5 月 26 日。

[10] 尹章義，〈臺灣客家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文獻》，第 48 卷第 2 期（1997 年 6 月）；陳運棟，〈五十年來的臺灣客家研究〉，《臺灣文獻》，第 49 卷第 2 期（1998 年 6 月），頁 171。

[11] 饒偉新，〈區域社會史視野下的「客家」稱謂由來考論──以清代以來贛南的「客佃」、「客籍」與「客家」為例〉，《民族研究》2005 年第 6 期，頁 98。

群互動過程中建構出來的，若未了解此一經過，而欲從文獻書寫的客追索歷史上的客家，則可能無法了解歷史可能的真象。

2. 以族譜追溯客家來源

羅香林要以學術方式論證客家源流時，遇到了與 1860 年代 Eitel 一樣的問題，歷史文獻中甚少有與客家直接相關的資料，在沒有現成資料的情形下，羅香林亦採取與 Eitel 一樣的策略，多方運用各家譜牒，以建構出一個客家人祖先來源於中原地區的學說體系。羅香林曾表示，「客家研究，……其歷史發展，與其種性之創演言之，則除爲實地調查與測驗外，仍須就其各姓譜牒，而爲分析歸納。蓋不如此，則不足以明其上世遷移轉徙之所由與其種性遺傳與演進之所在也」。[12]

於是，羅香林運用客家譜牒中的記載，指出客家係中原世胄，以及客家遷徙的動機，或由於外患與飢荒，或由於政府的召募與安置，或由於外地經濟的引誘，總共歷經五次的遷徙，逐漸自中原輾轉遷到南方。其五次遷徙，首先是受五胡亂華的影響，中原避難的漢族開始向南遷徙到豫鄂南部與穎淮汝漢諸水之間。其後遭黃巢之亂，便從河南、安徽遷徙到江西或閩南，或是從贛北或贛中遷徙到贛南、閩南或粵北。不久因元人入侵，宋室南渡，客家先民迫於外患，再度由贛南、閩南遷徙到粵東、粵北。明清之際滿清入關，加上客家內部人口的膨漲，故自粵東、粵北遷徙到粵中，及四川東部、中部和廣西、臺灣部份地區，或是自贛南、閩西而徙於贛西。最後一次則是在清同治年間，因人口激增，乃再向外發展，故自廣東中部與東部遷徙至廣東全境，或是到海南島。

以上運用譜牒資料建構出來的客家（先民）南遷史，反映的其實只是中國歷代北方人因亂逐步南徙的過程，因爲若進一步分析客家與非客家人對其中原先祖的記述，可以發現他們的中原居地差別不大，甚至他們所尊崇的中原先祖有相當一部分竟是同爲一人。至於標榜爲中原世族，也並非只出現在客家人的譜牒當中，閩南福佬人、興化人、福州府人、建寧府人，都有這種習慣。[13]

譜牒的發達與中古世族政治及門第社會的興起有關。中古世族藉著編纂譜牒證明其世族身份，以維持政治的優勢地位。[14] 以譜諜自我標榜自宋以來

[12] 羅香林，《客家史料匯編》（臺北：南天書局，1992 年），頁 2-3。
[13] 陳支平，《客家源流新論：誰是客家人》（臺北：臺原出版社，1998 年 5 月），頁 30-31。
[14] 黃秀政、李昭容、郭佳玲，〈羅香林與客家研究〉，《興大歷史學報》，第 18 期（2007 年 6 月），頁 307。

歷代皆然，因此族譜的編纂並不是來自歷代祖先存時的記錄累積，而是進行編纂工作的後代子孫，利用可能的資料、傳說爲依據，進一步依其社會、文化的自我認知而作的詮釋，故運用族譜進行地域或宗族歷史的研究時，要留心族譜本身的特質。日人瀨川昌久因此認爲羅香林視族譜爲過去的事實，把族譜作爲分析客家過去遷移路線的主要材料，多少有些天真。[15]

3. 以住居地追溯客家歷史人物

在討論「中原客家」論述中常以純客或非純客住地上溯歷史人物之前，先了解羅香林對純客住地與非純客住地的調查與分類。根據羅香林自己的說法，以當時縣區爲單位，視各縣居民是否全數爲客，抑或若干爲客，少數爲客，而將各省屬縣，分純客住縣與非純客住縣。[16] 至於判斷是否爲客家的標準，一爲志書與譜諜資料，二則是與各地客家人士的訪談。[17] 羅香林對於純客住縣與非純客住縣之討論，首見於 1933 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導論》，1950 年的〈客家源流考〉中又作了部分的增修（參見下表）。

表 6-1 純客住縣與非純客住縣

省分	純客住縣	非純客住縣
江西省	尋鄔、安遠、定南、龍南、虔南、信豐、南康、大庾、崇義、上猶	贛縣、興國、雩都、會昌、寧都、石城、瑞金、廣昌、永豐、萬安、遂川、吉安、萬載、萍鄉、修水、吉水、泰和
福建省	寧化、長汀、上杭、武平、永定、（將樂、沙縣、南平）	清流、連城、龍巖、歸化、（明溪、平和、詔安、崇安）
廣東省	梅縣、興寧、五華、平遠、蕉嶺、大埔、豐順＊、和平、龍川、紫金、河源＊、連平、始興、英德、翁源、仁化、赤溪	南雄、曲江、樂昌、乳源、連縣、連山、陽山、惠陽、海豐、陸豐、博羅、增城、龍門、寶安、東莞、花縣、清遠、佛岡、開平、中山、番禺、從化、揭陽、饒平、信宜、徐聞、陽春、三水、防城、合浦、臨高、陵水、欽縣、廣寧、惠來、儋縣、定安、崖縣、化縣、澄邁、萬寧、潮陽、新豐、羅定、臺山＊
廣西省		武宜、馬平、柳城、籐縣、桂平、平南、貴縣、博白、鬱林、陸川、北流、賀縣、象縣、（蒼梧、橫縣、武鳴、宜山、柳州、融縣、昭平、平樂、永淳、鍾山、荔浦、三江、羅城、柳城、來賓、陽朔、蒙山、興業、隆山、遷江、東蘭、南丹、信都、修仁、鳳山、那馬、榴江、崇春、宜北、綏渌、中渡、寧明、明江、河池）

[15] 賴旭貞，〈佳冬村落之宗族與祭祀──臺灣客家社會個案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1998 年），頁 16。

[16]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書局，1992 年 7 月，1933 年原刊）

[17] 黃志繁，〈什麼是客家？──以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為中心〉，《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2 卷第 4 期（2007 年），頁 93。

湖南省		汝城、郴縣、瀏陽、平江、（宜章）
四川省		涪陵、巴縣、榮昌、隆昌、瀘縣、內江、資中、新都、廣漢、成都、（華陽、新繁、灌縣）
臺灣		彰化、諸羅、鳳山（改稱彰化、新竹、高雄、屏東、苗栗）

說　　明：1. 根據羅香林的解釋，以當時縣區為單位，視各縣居民是否全數為客，抑或若干為客，少數為客，而將各省屬縣，分純客住縣與非純客住縣。
2. 括號（ ）內之縣名，係指 1933 年未納入，1950 年新增者，但臺灣的部分由於行政區劃已截然不同，故將 1950 年所錄皆標出；
3. 廣東省之豐順、河源 1933 年歸於純客住縣，1950 年歸於非純客住縣；
4. 廣東省臺山 1933 年未納入，1950 年則納入非純客住縣。

資料來源：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書局，1992 年 7 月，1933 年原刊），頁 94-97；羅香林，〈客家源流考〉，收入香港崇正總會編，《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1950 年 12 月），頁 52-56。

接下來，試從兩個面向討論以純客或非純客住地上溯歷史人物的可議性。其一，對於純客住縣與非純客住縣，合七省百餘縣的地域範圍，羅香林在幾年的時間中依文獻資料與走訪加以判定歸納，此非立基於普遍性的調查與分析的判別其實頗有問題。如日人瀨川昌久所言，純客住縣並非全是客家，也有少數外來者或操其他方言者，非純客住縣就更難斷定。[18] 如 1933 年《客家研究導論》中未列，1950 年〈客家源流考〉補入爲「純客住縣」的福建省的將樂、沙縣、南平三縣，許多當地人或學者都表示不合事實，[19] 一位曾在福建服務十餘年的寄寰曾爲文表示，「上列三縣都曾去過，從未聽說居住在那些縣份的全部或大部分是客家人」，並且指出南平一帶居民講的是不易聽的「土官話」，並非客家話。[20]

[18] 瀨川昌久，〈客家アイディティ―形成過程の研究――中華民國初期の著名政治家・軍人の出自をめぐる議論を中心に〉，《東北アジア研究》，第 9 號，頁 16。

[19] 張周，〈永定縣居民源流的探討〉，收於檳榔嶼客屬公會四十週年紀念刊編輯委員會編，《檳榔嶼客屬公會四十週年紀念刊（1939-1979）》（馬來西亞：檳榔嶼客屬公會，1979 年），頁 441；陳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頁 113。

[20] 寄寰，〈客家人〉，《中央日報》，1973 年 10 月 12 日，版 10。

圖 6-1 客家分布地圖

資料來源：羅香林，〈客家源流考〉，收入香港崇正總會編，《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1950 年），附圖。

其二，羅香林在提及歷史或當代名人與客家之關係，多以該人之住居地爲依據。這種傾向，在香港《崇同同人系譜》，以及戰後臺灣「中原客家」的論述當中發揮得更澈底，於是唐代的薛仁貴、郭子儀，宋代的文天祥、朱熹，明代的袁崇煥、王陽明都一併入列，成爲歷史上的客家人物。然而，如本文之前的討論可知，以「客」或「客家」自稱，進而產生與同方言人群團結的意識，放在中國歷史的脈絡中來看，其實是十分晚近的事。在客家意識尚未普及之前，人與人之間互稱的是原籍或地望，即可能是大埔人、興寧人、……。如道光《廣東通志》中，將廣府一帶的人稱爲「粵人」，屬潮州府者，稱爲「潮人」，屬惠州府者，稱爲「惠人」，屬韶州府者，稱爲「韶人」。客家人大本營的嘉應州在雍正 11 年自潮州府劃分出來之前，也常被稱爲「潮人」。[21]

綜之，若我們單從住居地上溯歷史人物的客家身分，其實是預設了客家

[21]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頁 49-50。

意識自古（或自宋代以後）皆然的前提，忽視客家意識是晚近才形成的事實，這些被稱爲客家的歷史人物，我們無法從文獻上找到任何證據證明他有客家意識，且所謂的客家意識也不合於宋元明歷代廣東各地域文化的發展脈絡。以住居地上溯歷史名人，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在於客家的自我標榜與附麗，那些歷史名人也只能啞口無言。

4. 客家爲純正之漢人

陳運棟於 1989 年再次寫作《臺灣的客家人》，修正 1978 年著作《客家人》中羅香林式源流論觀點，承認之前承襲羅氏認爲客家爲純正之漢人的說法值得商榷。[22] 陳運棟表示：

> 以前是繼承羅香林先生研究的路線，我把客家當成一個民系，那是純粹從血統來的。不對，應該站在我現在所謂的族群，族群是從文化面來看這群人，它是可以變的，所以族群理論是現代人類學可以採取的。[23]

於是在該書中特闢〈客家源流的另一觀點〉一章，詳細描述如何接受日人中川學的觀點，進而修正自己過去採用羅香林觀點之緣由。陳運棟認爲，以純血、混血爲人種區分標準的一種「人種主義」爲其出發點，因而在論點上很難擺說民族自我中心偏見的陰影。[24]

究其實，羅香林在 1933 年《客家研究導論》中，並無客家血統純正之觀點，認爲西人 Charles Piton、George Campbell、Ellsworth Huntington 等人主張客家爲純粹漢族的說法，在論證上也只是說明了客家爲漢族的分支，且對「客家的優性，亦似乎有揚揄太過的地方」。羅香林並指出，說客家是「純粹的華人」，「殊可不必」，因爲從史實觀察，所謂華人根本上就沒有「純粹」的血統可言，至於客家，雖與外族混化的程度較少，但也只是少點而已，到底與「純粹」有別。更值得注意的是，羅香林還試圖回答「客家究與何種異族曾發生相當的混化？」的問題，他的答案是，「客家初到閩贛粵的時候，不能不與畲民互相接觸，接觸已多，就想不與他們互相混化，亦事勢所不

---

[22] 林吉洋，〈敘事與行動：臺灣客家認同的形成〉，頁 31。

[23] 陳運棟，〈文獻資料和田野資料的距離：以彰化地區客家族群的墾拓為例〉評論，刊於《史學與文獻》（臺北：學生書局，1998 年）。轉引自陳板，〈族群與地域：臺灣客家在地化的文化觀察〉，收入徐正光主編，《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聚落、宗族與族群關係》（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0 年 12 月），頁 314。

[24] 陳運棟，〈五十年來的臺灣客家研究〉，《臺灣文獻》，第 49 卷第 2 期（1998 年 6 月），頁 178。

許」。[25]

然而此種觀點卻在 1950 年出版的〈客家源流考〉中有了大轉折。他不再用專門的篇幅論述客家的血緣問題，並將《客家研究導論》中涉及畲族的文字盡數刪除，並在論述客家民系的形成年代時，補充了如下一段話：

> 客家民系的形成雖與五代時候各個割據政權無涉，然以其在當時所處的地域為南唐以南，王閩以西，馬楚以東，南漢以北的地帶，即閩粵贛三省交接的三角地帶，各個割據政權的融化勢力，既不能支配他們，而適以環繞他們，使他們保持了道統的語言和習俗，而與其四圍的民系相較，則一者已為各別混化，一者仍為純粹自體，對照起來，便覺二者有點不同。因此而他人遂覺其為另一系統，而其人亦自覺其是另一系統，這樣在意識上和理念上便成了客家這個民系。

並認爲客家民系是一群「強者」、「優者」、「適者」、「勇者」，「其爲強者的遺傳，那是不刊的事實」，放棄了《客家研究導論》中在講述「客家的特性」時，對客家人「剛愎與自用」的批評。由此可知，羅香林在 1950 年放棄了原於 1933 年時的開放態度，轉而認爲客家是血統最純粹的漢人，從「客畲混化」到「純粹自體」，學者多認爲這實是羅香林思想上的一個倒退。[26]

關於客家爲血統純粹漢人的說法，已有多位學者立論質疑，如房學嘉認爲客家人並不是中原移民。他既不完全是蠻，也不完全是漢，而是由古越族殘存者後裔與秦統一中國以來來自中國北部及中部的中原流人，互相混化而形成的人們共同體。[27] 吳松弟也表示，無論從史料或家譜都可以發現，客家不可能是北方移民後裔，而只能是當地的土著，這在遺傳學的研究上也可得到印證點。[28]

謝重光則認爲「客家是一個文化概念，而不是一個種族概念」[29]，不贊成羅香林用種族的概念來說明客家的形成。他認爲單有南移的漢人，還不足以形成「客家」，還有待南移漢人在某一特定時期，遷入某一特定地區，以其人數、文化、經濟的優勢，同化當地原住居民，吸收原住居民固有文化中

---

[25]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書局，1992 年 7 月，1933 年原刊），頁 14、72-74。

[26] 冷劍波，〈羅香林客家源流觀的再認識〉，《嘉應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5 卷第 4 期（2007 年 8 月），頁 13-17；周雪香，〈從客畲混化到「純粹自體」——羅香林客家源流觀的演變〉，《貴州民族研究》，第 27 卷第 3 期（2007 年），頁 81-86。

[27] 房學嘉，《客家源流探奧》（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年），頁 1。

[28] 吳松弟，《中國移民史 第四卷 遼宋金元時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頁 363。

[29] 謝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年）

的有益成分，彼此融合形成一種新的文化，一個新的民系才得以形成。

蔣炳釗亦認爲客家形成的過程，必是入遷的漢人與當地畲族融合的過程。[30] 客家民系是在特定地域、特定時間與特定的民族，即畲族的密切關係中形成的，客家雖是漢族的一個民系，但與漢族不能等同。客家的形成，必須以畲文化與漢文化交融爲前提，表現在畲民族意識的逐漸消失。[31]

（二）中原客家文化質素的雜揉融合

《中原》月刊在臺灣的發刊，除了引介「中原客家」論述外，也對客家文化，如客家語、客家山歌的保存貢獻卓著。如在客家山歌方面，由月刊集結出版的《中原文化叢書》一至七集，蒐羅、整理並紀錄各地客家歌謠的歌詞與曲譜，還鼓勵創作改良山歌，連載客家語言，爲今日留下不少珍貴資料。[32]

戰後初期，客家民謠與山歌一直未獲重視，直到 1960 年代初期，經《苗友》、《中原》月刊的爲文提倡，並鼓勵有志之士組織客家歌謠研究會，客家民謠才獲得振興。

從 1962 年下半年開始，謝樹新一直以《苗友》與《中原》之名義，主導、支持、報導或評論各種有關客家音樂的改進與推廣活動。作爲一個客家音樂的改進與推廣機構，19 年來《苗友》、《中原》的工作大致可分爲：（一）客家民謠新舊作品的徵集與出版；（二）客家歌劇《山歌緣》的製作與演出；（三）客家歌曲的改進與發表；（四）客家音樂活動的報導、評論與贊助等四方面。[33]

1962 年，更在苗栗舉辦第一屆全省客家民謠比賽，全臺參加比賽的歌手近兩百人參觀的觀眾多達三萬人，盛況空前，在臺灣有客家人的地方，各地也都開啓了山歌比賽的風潮，於是開啓了客家山歌的推廣、整理及研究。

---

[30] 蔣炳釗，〈試論客家的形成及其與畲族的關係〉，收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4 年），頁 289、297。

[31] 蔣炳釗，〈試論客家的形成及其與畲族的關係〉，《閩臺》，頁 297。

[32] 陳逸君，〈眾裡尋「客」千百度——一個需要重新書寫臺灣族群史的時代〉，收入陳逸君主編，《臺灣客家關係書目與摘要〔專書、論文、研究報告類〕》（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 10 月），頁 35。

[33] 許馨文，〈戰後臺灣客家音樂的建制化歷程：以《中原（苗友）》月刊（1962-1981）的再現為例〉，《民俗曲藝》，第 171 期（2011 年 3 月），頁 143-144。

[34] 並在往後十年間苗栗、桃園、新竹陸續成立客家民謠愛好社團，並組成客家民謠訪問團赴日宣慰僑胞三次。[35]

鄭榮興的研究亦提到，1960 年代初期在臺灣北部幾個客家人群居的縣市中，曾出現客家民謠研究會與民謠比賽的成立風潮，他指出這股風潮是臺灣客家民歌發展史上的一個關鍵轉折，因爲這些活動與因其發展的客家民謠唱片工業，以及歌本與相關出版品的刊行，促成了客家民謠在客家鄉鎮、學校、社教團體的盛行，以及社區「民謠班」的成立。[36] 許馨文的研究也顯示，1962 年苗栗縣民謠歌唱比賽不僅是稍後臺灣各地客家民謠比賽、演唱會如雨後春筍般興起之濫觴，也是引領臺灣戰後客家社群音樂實踐朝向建制化發展的重要事件。[37]

除了客家山歌與民謠之外，來臺的外省客家也帶來了其家鄉特殊的生活文化，經數十年與臺灣人地的互動之後，終也沈澱爲今日客家文化的元素之一。如擂茶文化就是從光復後來臺的陸豐客家人飲食中採借，進而加以更改以適應本土的飲食習慣。據了解，擂茶原是流行於粵東北揭陽河婆一帶及廣東省陸豐縣的特殊客家飲食習慣。[38] 他們食用擂茶的方法和臺灣現在所見的擂茶相去甚遠，擂茶是鹹的，而且要炒菜配飯。由於臺灣客家人並沒有擂茶的飲食文化，當初他們來到南庄，讓人覺得最特別的就是他們的擂茶，其他風俗習慣，似乎與本省人沒有太大的差異。擂茶是他們本有的生活習慣，而一開始臺灣人對此皆感到陌生，臺灣人沒有這樣的飲食習慣，所以，形成他們這群客家人的特色。客家文化的興起前，其他的客家人都不曾聽聞有擂茶這件事。[39]

中原月刊中也有一些外省客家對原鄉擂茶的介紹，如陳拱初〈陸豐鄉土談片〉中提到：

> 習俗喜吃鹹茶，賓客往來，尤其婦女，都以鹹茶招待，咸同間學人沈肇邦有竹

---

[34] 張嘉文，〈客家傳統山歌三大調在花蓮地區的傳承與現況 〉（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頁 28-29。

[35] 參見賴碧霞，《臺灣客家民謠薪傳》，頁 20。

[36] 參見鄭榮興，《臺灣客家音樂》，頁 90-96。

[37] 許馨文，〈戰後臺灣客家音樂的建制化歷程：以《中原（苗友）》月刊（1962-1981）的再現為例〉，《民俗曲藝》，第 171 期（2011 年 3 月），頁 141。

[38] 藍清水，〈被遺忘的外省客家移民──戰後河婆客的集體記憶與認同之分析〉（桃園：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1 月），頁 101；陳明宏，〈臺灣客家擂茶初探〉，《客家雜誌》，第 126 期（2000 年），頁 18。

[39] 彭芊琪，〈臺灣擂茶興起的過程及省思〉，《第四屆「客家研究」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頁 141-142。

> 枝詞云：「陸豐習俗重鹹茶，牙缽敲來處處家，厚薄人情何所見？看他多少下油麻」，現在臺灣的陸豐同鄉，還是保持了這傳統的習慣。[40]

阿衝的〈客家的食衣住行〉中也說：

> 客家人又喜歡吃鹹茶，普通人家，日常必用，遇有親友過訪，且用以款客，所謂鹹茶，就是把茶葉放在牙缽裡擂碎加鹽沖開水，泡以炒米、芝麻、花生、生菜，講究的還用豬肉、蝦子、綠豆、紅豆、眉豆等做料。據說鹹茶不但可口，而且功能消滯化氣開胃健脾，是很有益的。[41]

而此一本省客家原無沒有的飲食文化，由於北埔爲推廣客家文化，進而將擂茶加以改良，不斷創新，由鹹而甜，最後成了我們在擂茶館中所吃到的甜口味的擂茶。[42] 擂茶成爲客家人的傳統之後，美濃、公館等客家地區，擂茶館也一家跟著一家開，提到客家，沒有人不會想到擂茶，提到擂茶，沒有人不會聯想到客家。[43] 而這個客家飲食文化，如果了解原委，可能不清楚它並非臺灣本土的，而是戰後經外省客家引進的。

（三）客家族群處境的劣勢化與客語的隱形化

中原客家論述在戰後臺灣的引介宣揚，以及緣於中原客家論述而得以成立「世界客屬總會」號召海外客屬華僑，這些過程，客家認同意識及客家文化，乃至於客家族群之地位理應得到提升，然究其實，卻造成了客家族群處境的劣勢化及客語的隱形化，於是在臺灣歷經本土意識覺醒及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終演成 1988 年在臺北的「還我母語運動」以及隨後而來的「新个客家人」新客家論述的形成。

1. 客家族群處境的劣勢化

中原客家在戰後臺灣的形塑，其實是重中原而輕客家，於是在提到客家緣於中原時，也會一併提到「不論福建人、廣東或其他各省人，都是衣冠望

---

[40] 陳拱初，〈陸豐鄉土談片〉，〈客人婦女的優良風俗〉，《中原文化叢書》第二集，「客家風土」，頁 38。

[41] 阿衝，〈客家的食衣住行〉，〈客人婦女的優良風俗〉，《中原文化叢書》第二集，「客家風土」，頁 9。

[42] 黃一民，〈文化與商品：擂茶的社會學考察〉（臺北：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頁 43。

[43] 彭芊琪，〈臺灣擂茶興起的過程及省思〉，頁 177-197，《第四屆「客家研究」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族的後裔，……同是一個炎黃祖先，同是一個一脈相傳的血脈，同是一個中華民國的地緣領土」。[44] 或言「福建、廣東之居民，亦多數由中原遷來，故中原與臺灣自始實一家也」。[45] 於是在臺的客家、福佬以及外省移民皆來自中原，強調中原淵源的同時，臺灣的客家被整合到一個以中國爲中心的歷史文化系統中，論述內容皆爲客家源流、原鄉風土及與中國密切之關係，也因此，《中原》月刊在發刊八週年時會認爲，該刊物「已經盡到了作爲宏揚中州文化及復興中華文化馬前卒的責任」，[46] 然而，久而久之，這些脫離本土的反覆論說，逐漸地模糊了臺灣客家在不同區域的在地殊異性。

在中原客家形塑的歷程中，是外省客家與半山客家站在與執政當局相同的立場，以中原客家論述召喚本省客家，其所強調的是中原系屬，本省客家卻多因「客家」之名而接受召喚，甚至加以傳介。

由於客家在臺灣是相對的少數，自易接納省外的同方言群的成分，尤其，他們舉著客家是中原正統的旗幟而來。如戴國煇曾言「臺灣的客家嘗盡了雙重邊緣的滋味。日本占領時期使得臺灣客家對於屈服於殖民地統治而倍感羞恥，做爲臺灣客家的父親而言，中原和邊境早已不是地理學和地政學意義上的專有名詞的代用品。中原被賦予了價值、價值的核心及象徵著客家對於根的信仰之重大意象」。[47] 而這也印證了楊長鎮的說法，即過去因閩客歷史情結和少數弱勢而自卑的客家人，因爲可以在這樣的中原論述中得到較高的象徵地位和安全感，因此在中國化的大背景下產生了「中原正統」的認同意識。[48]

1973 年第二次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在臺召開，及 1974 年世界客屬總會在臺北成立，進一步吸納了臺灣所有省內外的客家族群及客家社團。中原客家的論述取得官方公開的支持與背書，看似提升了在臺客家族群的地位。然而，對官方而言，客家只是一個可供操作運用的圖騰，可以用來號召本省客家成爲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地方選舉時可以用來吸納本省客家的票源，甚至也可以用來號召海外客屬支持代理祖國。依附官方立場的同時，客家流於工具性，而缺乏主體性。

---

[44] 鴻，〈談客人的祖籍〉，《中原文化叢書》第五集，「客家掌故」，頁 124-128。
[45] 周樹聲，〈中原文獻與臺灣關係之感想〉，《中原文獻》，第 4 卷第 5 期，頁 29。
[46] 謝樹新，〈本刊創刊已八個週年〉，《中原》，第 76 期（1970 年 6 月），頁 5。
[47] 戴國煇，〈中国人にとっての中原と辺境〉，收入橋本萬太郎編，《漢民族と中国社会》（東京都：山川出版社，1983），頁 407。
[48] 楊長鎮，〈認同的辨證──從客家運動的兩條路線談起〉，網址：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274956510474，檢索日期：2010 年 8 月 2 日。

中原客家論述對於本省客家存在吸引力，在於希望擺脫邊陲地位，然而在重中原而輕客家的論述脈絡中，客家與其他族群一樣都是中原世胄、炎黃子孫，客家沒有因此而特別。而且，在大中國意識之下，臺灣處於邊陲，本省客家相對於福佬族群，則更是邊陲中的邊陲。此外，本省客家因「客家」而接受「中原」之召喚，且與官方關係看似良好密切，卻被本省福佬認爲背離本土，本省客家就如三明治的夾心，受到兩方族群勢力的擠壓，在政治、教育層面不及外省籍同胞優勢，民間財經實力又不敵本省福佬，本省客家身處其中，愈顯左右爲難，進退維谷，加上被官方反覆操作運用的工具性角色，使得客家的族群處境愈顯劣勢化。

2. 客語的隱形化

經過日本五十餘年的統治，戰後初期，臺灣青年多以日語爲主要語言，已無法使用流利的方言交談，中年人則雖仍能說流利的母語，但思考與書寫皆以日文爲主，傳統的閩南語與客家話退到僅在家庭中使用，也只有老年人會完全使用。[49] 即使如此，面對新政府的統治，臺灣民眾仍是喜悅期待，因此戰後初期，曾經有過一陣子主動學習國語的熱潮，街頭巷尾到處掛滿了補習國語的招牌，熱情地詰屈聱牙學說國語。[50] 而政府領臺之初的國語政策也頗尊重臺灣原本的方言，希望以臺人的方言復原出發，透過方言學習國語。[51] 當時擔任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何容即言，當時的國語運動有兩個重要口號，即「排除日文日語」與「恢復本省方言」。[52]

然而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讓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及啣命來臺查處的國防部長白崇禧、閩臺監察使楊亮功、何漢文等人認爲，本省人深受日本化是導致二二八之遠因，因此陳儀事後曾呈報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強調需改造臺人思想，使其完全中國化，何漢文也指出應強迫推行國語、國文。使得事件後政府當局對國語運動逐漸改採剛性政策。1949 年政府遷臺後，國語運動也進入一個全新的局面，除了繼續禁絕日語、日文之外，學校開始廣泛利用《國語日報》與注音符號來推行國語，另一方面，對臺灣本土方言則採取壓抑、禁絕之手段，如學校利用規訓與懲罰的手段，迫使學童習慣說國語，進

---

[49] 吳守禮，〈臺灣人語言意識側面觀〉，《新生報．國語》，第 1 期（1946 年 5 月 21 日），轉引自梅家玲，〈戰後初期臺灣的國語運動與語文教育──以魏建功與臺灣大學的國語文教育為中心〉，《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7 期（2010 年 2 月），頁 130-131；張博宇，《臺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頁 28。

[50] 李西勳，〈臺灣光復初期推行國語運動情形〉，《臺灣文獻》，第 46 卷第 3 期，頁 175-176。

[51] 蔡明賢，〈戰後臺灣的語言政策（1945-2008）──從國語運動到母語運動〉（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6 月），頁 29。

[52] 何容，〈臺灣的國語運動〉，頁 29。

而壓抑了臺灣本土方言。[53]

雖然，隨著國語運動的推動，臺灣方言已逐漸從學校退出，廣播的方言節目也在 1964 年受到法令的限制，不得超過 50%，[54] 即使如此，1970 年仍有立法委員對臺灣仍有方言與國語並存的情形感到不滿。認爲「公民營電臺及電視的閩南語廣播節目很多，里民大會或縣市議會的發言，常有用閩南語的，學生說國語只限於在教室內上課時間，教師在辦公室裡滿口方言，學生回家後也是各講方言，各機關的辦公室中，也是方言滿耳」的情形，會讓民眾產生國語不重要的錯誤觀念，以及在推行國語運動 20 餘年後，仍有「閩南語羅馬字拼音的聖經存在，甚至有羅馬字型詩及羅馬字刊物在教會中使用，今天仍然有一部分神父或牧師在教堂中用閩語南傳教」的情形，對推行國語運動是一種諷刺。因此提出八點建議：

> （一）公開集會發言，都限用國語；（二）軍公教及其他公職人員在辦公處所，非不得已，盡量減少 使用方言；（三）教職員學生在校，以講國語為主；（四）各級選舉競選演說，限用國語；（五）方言影片及唱片限期淘汰；（六）廣播電視的方言節目，盡量減少；（七）普遍舉行國語演講比賽，從優給獎；（八）用方言拼成羅馬字的學校或公司名稱，由政府通令改拼國音。

由此可知，這位外省立委，其實有意全面禁絕臺灣方言的使用，文末還提到，「講方言的臺灣同胞，都是從大陸遷移而來的優秀漢族，而不是異族，只是保持著古老語言的方言而已，爲什麼不可以放棄落後的古老的方言呢？」。[55] 以上觀點基本上頗能反應大部分戰後來臺的外省移民與政府當局的想法與立場。由於戰後的臺灣，仍以閩南及客家居絕大多數，因此全面的禁絕方言不太可能，但對方言的限制仍有增無減。如 1976 年的「廣播電視法」規定「廣播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爲主，方言應逐年減少」。[56] 1974 年新聞局以「妨害農工正常作息」與「推行國語」爲由，禁止所有電視布袋戲的播出，甚至要求布袋戲改爲國語配音。[57]

除了政府在方言政策的壓縮外，臺灣在 1960 年代以後經歷都市化與工

---

[53] 蔡明賢，〈戰後臺灣的語言政策（1945-2008）──從國語運動到母語運動〉（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6 月），頁 23。

[54] 李福鐘、楊秀菁、薛化元編註，《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八）新聞自由》，頁 85。

[55] 新勒力，〈推行國語運動址人歧途（一）〉（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十日對行政院長之質詢），第 22 卷第 3 期，頁 11-12。

[56] 李福鐘、楊秀菁、薛化元編註，《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八）新聞自由》，頁 212。

[57] 蔡明賢，〈戰後臺灣的語言政策（1945-2008）──從國語運動到母語運動〉（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6 月），頁 67。

業化變遷，造成大量客家人離開原先居住的傳統客家村，進入都市就學或就業，對於客家族群在語言文化傳承方面的影響甚鉅。[58] 工業化、離農，與土地切斷關係，離開故鄉到都市讀書、謀生，所謂的發展，就是要和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鄉，甚至和自己的文化切斷關係。當然這也是一種外來的、移植的現代化過程，所內含的異化命運。這種現象雖非針對客家族群，然而客家卻正好是這段時間偏遠地區集體命運的主角。[59]

當時國語是官方語言，客家人相對於福佬而言又是相對弱勢，於是在社會上的交往，無論是爲了做生意和或與他人作良好的溝通，皆多以國話或是閩南語作爲交談的優先語言，使得客語逐漸淪爲家庭語言，此種隱忍身份的適應能力，反而成爲了客家文化傳承的重大危機。[60] 戰後至 1990 年代期間，在臺的客家人雖身爲所謂的臺灣第二大族群，但長期在公共論域中隱形噤聲，幾乎是不爭的事實。

3. 省籍突顯的差異

客家人的族群認同在「中原客家」論述下似乎受到庇護與守護，強調漢族血統，強調種種優良傳統，不論總體客家族群的形象如何，臺灣的客家族群仍是保有中原的論述觀點，具有重視傳統文化美德的族群，這種認知可以視爲羅香林「中原客家」論述的效果。[61] 但從事實發展來論，臺灣客家確保他在過去歷史的正面形象，如義民信仰之爭議。

「義民問題」的發端肇始於連雅堂在日本統治時期撰寫的《臺灣通史》一書，其在大漢民族主義的思維下，認爲滿清的異族統治爲不義，因此當時臺灣社會出現的許多民變就被視爲具有民族意識的「起義」事件，而協助朝廷平亂的「義民」，便成爲幫助異族政權打壓漢民族起義的「幫兇」，被質疑爲「義民不義」。[62] 此爲客家對福佬因歷史經驗對義民信仰產生對立觀點的看法。此外，義民的認知與信仰，本外省客家因歷史經驗的不同，詮釋與

---

[58] 林信丞，〈從客家雜誌分析臺灣客家形象之變遷〉（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1 月），頁 17。

[59] 張維安，〈族群記憶與臺灣客家意識的形成〉，收入莊英章、簡美玲主編，《客家的形成與變遷》（下）（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0 年 12 月），頁 729。

[60] 林信丞，〈從客家雜誌分析臺灣客家形象之變遷〉（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1 月），頁 27。

[61] 張維安，〈族群記憶與臺灣客家意識的形成〉，收入莊英章、簡美玲主編，《客家的形成與變遷》（下）（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0 年 12 月），頁 727。

[62] 李慶華雖聲言為教科書忽略客家義民廟而不平，但事實上在其 32 點質疑中，卻為教科書一字未提《臺灣通史》而大表不滿（參見李慶華，1997：22）。由此亦可見爭議事件發動者提及客家議題的工具導向性質，以及客家議題在教科書爭議中的邊緣位置。

感受想必也截然有差。臺灣的客家人，在清領臺灣時期，以義民自居，協助清廷平亂是顯著的歷史事實，因此客家聚落中，多有懷忠、褒忠之匾，義民的信仰經清而日治而戰後，持久不衰。但戰後卻因中華民國是排滿而成立的政權，需時時聲張以漢爲尊的立場，如此一來，臺灣客家所信奉，所標舉的義民之義，反被認爲是不義之舉，甚至被指義民之稱不符其實。[63] 此一隱伏的矛盾，日後即成爲臺灣客家人意識的發軔。[64]

彼此歷史經驗不同，也顯見在對日語的感受。鍾肇政曾表示，一次宴會中，半山客家林海音與夫婿參加，頓時讓當場氣氛凝結：

> 尷尬情形，兄當可想像，閩粵雜處，幾個年紀較大的，國語又不能暢所欲言，自然就大談日本話了。海音一來，融洽氣氛便破壞無遺。文心喜走編輯門，弟頗不以為然。……我覺得林海音也可能沒有對我們留下了好印象，尤其何凡更可能如此，臺人談日語，久為外省人詬病，而站在臺灣文化先鋒地位的作家們竟亦未能免此，他們或者還要慨歎一番吧。[65]

對於自身與土地未來的想望不同，也可明顯看出。不可否認的，當時大部分外省人抱持的仍是「過客心態」，在心理上，反正遲早都將重返家園。因此會表示，「海峽兩岸，一衣帶水，咫尺之遙，猶若關山遠隔，想念家鄉之情，無時或忘，尚望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早日實現，大家及時歸回故鄉，共享天倫之樂，快何如之」。[66] 在桃花、李花盛開的時候，會想念對岸的家鄉「但願我有生之年，能隨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重返故國」。[67]

戴國煇認爲，光復 40 年來本省人和外省人，如講得不好聽，雙方一直是處在「同床異夢」狀況下。由於大陸移民的傳統思考模式，無法擺脫「百

---

[63] 1956 年，屏東六堆地區即曾發生一位海軍教官投書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提及「據本省唯一正史連雅堂先生手著『臺灣通史』記載：朱一貴之役為反清復明之革命行動，然則擊敗朱一貴之人，何能稱為忠義？所謂忠義亭、尚何有重樹新模之價值？屏東縣修建所謂忠義亭，有污蔑革命歷史情事，請屏東縣議會詳徵史料，以定行止……」。由於時值六堆忠義祠重修之時，造成「六堆民眾聞之憤慨，群起反駁」。後來經由屏東縣文獻委員會主任鍾桂蘭將相關資料條呈上峰，以及在此之前，羅卓英已將重建忠義祠之意義上函報告副總統陳誠，始稍微解決此一紛爭。參見鍾壬壽，《六堆客家鄉土志》，頁 126。

[64] 施正鋒，〈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的客家運動〉，臺灣客家研究學會、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等主辦，「臺灣客家運動 20 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 年 12 月 8、9 日，頁 4。

[65] 錢鴻鈞編，《臺灣文學兩鍾書》（臺北：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 2 月），第一二七信，鍾肇政致鍾理和函，1960 年 3 月 21 日。

[66] 廖英鳴，〈同鄉會成立三十週年祝詞〉，臺北市興寧同鄉會編，《臺北市興寧同鄉會會刊》，第 1 期（1985 年 2 月），頁 27。

[67] 李益群，〈綠蔭深處是故鄉〉，臺北市興寧同鄉會編，《臺北市興寧同鄉會會刊》，第 1 期（1985 年 2 月），頁 54。

代過客」的想法，一直站在國府當局的立場，高舉「同舟共濟」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錦旗。本省人對於這種狀況，其實並不容易接受。[68]

由另外一個面向來看，本土的客籍作家在戰後，國語當道的局勢下，創作其實面臨相當大的挑戰。鍾理和在他的自傳中有提到自己的寫作經過:「我在學校讀的是日文，學校畢業後緊接著的一段時間所接觸的又幾乎是日文，這是一；其次，我的中文（應該說是白話文）又是無師自通，用客家音來拼讀的，便是這兩點使我後來的寫作嚐受到許多無謂的苦惱，並使寫出來的東西生硬和混亂。我初習寫作時一邊執筆在手，一邊在心中用日文打好底稿，再把這些底稿譯成國文，然後方始用筆寫到稿紙上。日文文法和客家音的國文，這是我的兩大對頭。現在前者的影響已漸漸淡薄，至於後者——用客家音讀和寫，則至今不改」。可知客語一直是他的思考語言，而日文、北京話則是工具語言。

鍾理和與鍾肇政曾於《文友通訊》中溝通方言與文學之關係。鍾理和表示不贊成純粹方言的文學，但贊同「把方言作爲其中一環」，也就是「擷取閩、粵通用的方言，而且又能用漢字表達出來」。[69] 關於這一點，鍾肇政表示相同立場，認爲「描寫吾臺民，尤其客家人，似應有客家人語氣，否則鄉土氣息深則深矣，卻缺乏地方色彩」。[70]

彭瑞金對於戰後以來的客家作家加以評介，認爲除了客語詩外，鮮有以客家民族意識爲職志的文學，亦即以描寫客家源起、遷徙經驗、奮鬥歷史、族群特性，反映客家民情之文學。[71] 然而，我們回頭看鍾理和的小說，或許少去觸及客家源起，或遷徙經驗，但如實地描繪出在地的風土人情，並且融入許多客家諺謠或山歌。[72] 何嘗不是提早突破了中原客家的氛圍，讓臺灣的客家風貌隱約現身。

在中原客家的氛圍裡，主要標舉的是中原而非客家。戰後臺灣首次標舉臺灣客家旗幟的，也最先出現在文學領域當中。1982 年 7 月，張良澤應紐約「臺灣客家聯誼會」之邀，從日本到美洲，講演〈臺灣客家作家印象〉，

---

[68] 戴國煇，〈漢族系住民的語言與歷史〉，戴國煇全集 9，《史學與臺灣研究》，卷九（臺北：遠流，2011 年 4 月），頁 29。

[69] 錢鴻鈞編，《臺灣文學兩鍾書》，第十一信，鍾肇政至鍾理和函，1957 年 6 月 21 日，頁 42-43。

[70] 錢鴻鈞編，《臺灣文學兩鍾書》，第二十信，鍾肇政至鍾理和函，1957 年 10 月 9 日，頁 57。

[71] 彭瑞金，〈從族群特性看客家文學的發展〉，收於徐正光主編，《徘徊於族群和現實之間》（臺北：正中書局，1991 年 11 月），頁 142。

[72] 鍾怡彥，〈鍾理和文學語言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7 月），頁 117。

在當時動輒被冠上分離主義的罵名的敏感時代，張良澤坦言，這恐怕是戰後第一次有人提出「客家文學」的說法。介紹了龍瑛宗、吳濁流、鍾理和、林海音、鍾肇政、鄭煥等二十餘名客家作家。[73]

因爲彼此的歷史記憶不同，前者有中華民國肇建、對日抗戰、跟隨國民黨退走臺灣的共同經驗；相較之下，後者雖然來自原鄉不同地方，分別聚居高屏六堆、桃竹苗、花東等地，卻有開疆闢土、閩客械鬥、馬關條約、太平洋戰爭等共同經驗。尤其是經過 1980 年代「客家運動」的洗禮，領導者揭櫫「新義民精神」、「新的客家人」，就是努力著去塑造「臺灣客家人」的族群認同。[74]

歷史經驗，未來想望的截然不同，如果兩岸的局勢未變，外省客家的心態未變，則即使在臺宣揚了數十年的中原客家論述，在一波波本土化、民主化、多元化的浪潮沖刷後，本土意識逐漸甦的臺灣客家族群，選擇與中原客家論述告別，似乎勢所難免。

畢竟，羅香林的中原客家論述是因應華南土客相爭的環境建構而成，只是在臺發揚的數十年中，以擬似本質性的客家文化加以宣揚。然而土壤不同，終也會開出不同的花朵。

---

[73] 彭瑞金，〈從族群特性看客家文學的發展〉，收於徐正光主編，《徘徊於族群和現實之間》（臺北：正中書局，1991 年 11 月），頁 136-137；張良澤編，《肝膽相照：鍾肇政．張良澤往返書信集〔張良澤卷〕》（臺北：前衛出版社，1999 年 11 月），第 168 信，張良澤寄自筑波，1982 年 6 月 15 日，頁 215-216。

[74] 施正鋒，〈客家人由中國遷徙臺灣──臺灣客家族群認同的打造〉，收入氏著，《臺灣人的民族認同》（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 年 8 月），頁 140。

七、結論

由本文的討論可知，由清代文獻可知，清代臺灣之客方言人群，有被以「閩主粵客」而稱爲客，自稱則爲粵人。到了日治時期，客方言人群被認定爲「廣東人」，說的客語被稱爲「廣東語」，且日本治臺期間，幾乎同時與華南同一脈動，吸收對「客家」的理解。日本領臺之初已了解臺灣有一群說客話的人在華南稱爲「客家」，日人的文獻上在早期也稱這一群人爲客家，但由其對所認識「客家」的論述可知，多源於西人在華南對 Hakka 的認知，尙存不少的歧異與矛盾的看法。

然而即使意識到所統治的臺灣也有一群與華南一帶說著客方言的人，但日本在臺進行戶口調查之初，卻將臺灣住民以「種族」爲名，將說客方言的人群定名爲「廣東族」，或稱粵族。該種族的分類並非近代人種學的意涵，而是基於尊重清代治臺的分類以及對臺灣社會風習的了解。無論如何，日治臺灣的客方言人群，一直以「廣東人」自居，日治後期即使對廣東的「客家」有較多的了解，但仍止於將其視爲廣東方面的說法，當時的臺灣客方言人群，似乎並不認爲自己是「客家人」。

因此，我們可以了解，戰後臺灣的客方言人群，不僅經歷了由「日本人」變成「中國人」，也同時由「廣東人」變成了「客家人」。這樣的轉換並非經過官方公開表述，比較可能是戰後來臺的新客方言人群所帶來的認知。1945 年之後新加入臺灣的客方言人群，可分爲戰後初期陸續反臺的半山客家，及分別於 1945 年及 1949 年後陸續遷臺的外省客家二種。

由戰後本省外客家的相處情形來看，多少可以看出方言的認同力量，而初步歸納戰後省內外客家彼此能容易產生族群親親感的原因可能有三。其一是由於所屬方言是特殊，且在臺灣是居於少數的，使得彼此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拉近陌生的距離。其二，許多臺灣客家雖經歷次兩次改朝換代，卻仍保有對原鄉及原鄉宗族的認同觀念，這也是戰後省內外客家容易跨越長期隔離的時間作用，而輕易拉近彼此距離的因素之一。其三，由於客家在臺灣是相對的少數，自易接納省外的同方言群的成分，尤其，他們舉著客家是中原正統的旗幟而來。而這也印證了楊長鎮的說法，即過去因閩客歷史情結和少數弱勢而自卑的客家人，因爲可以在這樣的中原論述中得到較高的象徵地位和安全感，因此在中國化的大背景下產生了「中原正統」的認同意識。而也因此容易對戰後來臺的客家人產生親近感。

然而，隨著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以及政府遷臺後進行一系列情治系統整頓、黨改造，以及派系削弱重整等一系列的威權重建工作，以及面臨許多在政府施政過程中體會出不同省籍族群的不對等待遇，也可能使方言的認同跨不過省籍的邊界。由本文的討論可知，以往對臺灣族群的相關研究當中，往往逕以省籍作爲人群的主要分類，卻因此忽略了戰後來臺的外省籍移民當中，有相當多數量與臺島原有福佬、客家使用同方言的一群人。

1945 年之後由大陸各省市遷臺的外省客家人，既被外省人研究所忽略，也完全不在客家研究的視野之中。這個部分是日後進行相關研究可以特別著重的部分。就本外省客家而言，方言與省籍究竟如何發揮認同效用，可能除了要考量在哪個時間區段外，也與如何來臺（自行來臺的平民或隨政府遷臺的軍公教）及能否與本省群眾溝通（通客家話或閩南語否）有密切關係，因此，日後的相關研究，應從不同面向，以更細緻的方式來分析，而不是單純以省籍分，或強調方言的認同。

論者皆謂，羅香林的中原客家論述參與了「中華民族工程學」在臺灣的建構。或言其客家源流說構成了臺灣早期客家研究傳統，且持續影響至 1990 年代才逐漸受到臺灣客家論述的挑戰。然究其實，1949 年的羅香林雖仍致力於客家研究，但發展重心在香港，1950 年在《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發表〈客家源流考〉，在 1933 年的《客家研究導論》基礎上補充或者修正。之後，〈客家源流考〉陸續於 1971 年被收入《香港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及 1973 年在臺北的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中受邀發表，經由不同地區客屬重要組織及官方之肯定，從而逐步建立其在客家論述的權威地位。戰後臺灣的「中原客家」論述，則是在 1960 年代初期透過外省客家謝樹新創刊《苗友》，後改爲《中原》爲園地而發聲。

《苗友》、《中原》中的客家論述除引介羅香林等人的說法外，更多的是外省客家人的原鄉記憶，由對客家原鄉的介紹，牽起客家與中國地理的關係，由客家歷史人物的記述及客家與國民革命，牽起客家與中國歷史的關係，丘逢甲、羅福星等人物記述，牽起臺灣與中國之關係。除《苗友》、《中原》外，戰後外省客家所組成的同鄉會，頗致力於以同鄉爲主刊物之發行，或原籍方志之重刊。在各同鄉會的刊物中，也常可看到許多中原客家的相關論述，其內容亦多偏重原鄉記述，及同鄉人物傳略，反映的仍是外省客家的原鄉記憶。

1973 年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在臺北舉行，翌年世界客屬組織在臺北成立，在當時國家外交處境艱難的情況下，在臺不論省內外的客家，皆希

望透過「客家」這個圖騰，向國家證明客家有號召海外華僑的強大力量，也進一步提升客家族群之政治力量與社會能見度。然而，若言大陸時期的「客家」是用於在被污名化環境中凝聚我族認同及向其他族群證明自己的歷史身分，戰後以來的「客家」是國家與外省族群藉以拉攏本省客家之媒介，則1970 年代客屬總會的成立，又再一次突顯「客家」的工具性。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自 1978 年，陳運棟的《客家人》問世，1980 年代以來在臺出版的客家專著，多承襲羅香林的論述架構和內容，幾乎原封不動地接收羅香林觀點與民系遷徙描述，也同樣宣稱客家繼承中原的先裔，成爲漢族之精華。更重要的是，在論述中增補了臺灣客家在地的祖籍空間分布、移入時間等，直接將「中原客家」的論述嫁接於臺灣客家的歷史之上，從而基本上完成了將臺灣客家編入中國客家的手續。

戰後以來在臺灣進行的「中原客家」論述，以及外省客家與本省客家的互動，經數十年來，對臺灣及客家的研究皆造成深刻的影響。諸如造成客家誤解的層累堆積、中原客家文化質素的雜揉融合及客家族群處境的劣勢化與客語的隱形化等等。由於中原客家在戰後臺灣的宣揚，其實是鑲嵌在符合國家政策的脈絡底下，於是雖言是中原客家論述，重的是中原，是中國，而非客家，遑論臺灣。

於是相同的方言跨不過彼此承載不同歷史的記憶，也跨不過期待不同的未來。外省客家與本省客家（含半山客家）的歷史經驗不同，其所關心的客家內涵的重點也不同。由於歷史經驗的不同，外省客家始終在意被污名化爲非漢，也就是羅香林客家論述的發起因緣。相對而言，臺灣的客家，重視義民認和與信仰的被污名化。

中原與臺灣兩種不同歷史經驗的客家在臺灣交匯，產生了持續很久的中原客家論述的主調，但卻不能忽略二者間實仍有消弭不去的扞格之處。如對臺灣義民的認知，臺灣的客家人，在清領臺灣時期，以義民自居，協助清廷平亂是顯著的歷史事實，因此客家聚落中，多有懷忠、褒忠之匾，義民的信仰經清而日治而戰後，持久不衰。但戰後卻因中華民國是排滿而成立的政權，需時時聲張以漢爲尊的立場，如此一來，臺灣客家所信奉，所標舉的義民之義，反被認爲是不義之舉，甚至被指義民之稱不符其實。

此一隱伏的矛盾，日後即成爲臺灣客家人意識的發軔。對於未來，外省客家始終流露回歸原鄉的想望，因此中原客家裡有許多內容是在強調臺灣與中原之不可分，臺灣的未來在對岸，一如其所來自。然而，隨時時勢流轉，

數十年來，兩岸的局勢未變，而外省客家的心態未變，臺灣客家卻在中原客家的論述脈絡中模糊了面貌，在強調中國歷史，中原歷史的大論述中，客語隱形化，客家邊緣化，臺灣客家開始回過頭思考自己的定位。也察覺了彼此的差異。

畢竟，羅香林的中原客家論述是因應華南土客相爭的環境建構而成，只是在臺發揚的數十年中，以擬似本質性的客家文化加以宣揚。然而土壤不同，終也會開出不同的花朵。則即使在臺宣揚了數十年的中原客家論述，在一波波本土化、民主化、多元化的浪潮沖刷後，本土意識逐漸甦的臺灣客家族群，選擇與中原客家論述告別，似乎勢所難免。

徵引書目

Bartlett F. C.著，李維譯

1998　《記憶——一個實驗的與社會的心理學研究》（臺北：桂冠，1998）。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

1999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

Clifford Geertz 著，楊德睿譯

2002　《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臺北：麥田。

E. J. Eitel,

1873　"An Outline History of Hakkas," *China Review*, vol. II, No. 3 (1873), pp. 160-164.

E. T. Eitel,

1867　"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 Article II., The Hakka Dialect compared with the dialects of the. other races inhabiting the Canton Province," *Notes and Queries on Chna and Japan*, Vol. 1, No. 6 (1867/6), pp. 65-67.

Eric Hobsbawm 等著，陳思文等譯

2002　《被發明的傳統》。臺北：貓頭鷹出版社。

Hellmuth Panchow,

1895　"Die Bevölkerung Formosas" [The population of Formosa], Aus allen Welttheilen XXVII (1895), pp. 33-40; 65-76.

Kirsten Hastrup 編，賈士蘅譯

1998　《他者的歷史：社會人類學與歷史製作》。臺北：麥田。

Le Gendre, C.W.

1871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aul Connerton 著；納日碧力戈譯

2000　《社會如何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Peter Stalker 著，蔡繼光譯

2002　《國際遷徙與移民：解讀「離國出走」》。臺北：書林。

Stephan Corcuff（高格孚）

2004　《風和日暖：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臺北：允晨文化。

Thomson, J., F.R.G.S.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A series of two hundred photographs, with letterpress descriptive of the places and people represented.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Low, and Searle, 1873-1874.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

2006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

《大埔會刊》，創刊號，頁 2。

《中原文化叢書》，第一集，頁 2。

《中原文獻》，第 3 卷第 12 期，頁 38-44。
《六堆集刊》，第 1-7 集。
《客家風雲》。
《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冊號 9785，文號 8，明治 30 年（1897）。
《聯合報》，1951-1987 年。
小川尚義
1906 〈臺灣語に就て〉，《臺灣協會會報》，第 90 期。
1907 《日臺大辭典》。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課。
1928 〈漢民族移住之沿革〉，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北市：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
小川琢治
1896 《臺灣諸島誌》。東京：東京地學協會。
山口哲男
1982 〈新加坡華人同鄉會與宗親會之研究〉。臺北：文化大學民族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不著撰人
1905 〈客家とは何ぞ〉，《臺灣慣習記事》，第 5 卷第 6 號。
1910 〈廣東語練習〉，《法院月報》，第 4 卷第 12 期，頁 216-217。
中川学編
1980 《客家論の現代的構図》。東京：アジア政経学会。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1992-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國一週編輯部編
1950- 《中國一周》。臺北：中國新聞出版公司。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
1984 《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中國新聞週刊社編
1947- 《中國新聞》。南京；臺北：中國新聞週刊社。
中華民國宗親譜系學會編輯委員會
1985 《譜系與宗親組織》。臺北：中國地方文獻學會。
尹章義
1997 〈臺灣客家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文獻》，第 48 卷第 2 期。
2003 《臺灣客家史研究》。臺北：臺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
五華文獻編輯委員會
1981 《五華鄉土述林》。臺北：五華文獻委員會。
1978 《五華人物傳稿》。臺北：五華文獻編輯委員會。
王甫昌
2000 《臺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計畫執行報告》。臺北：中研院社會所。

2002　〈族群接觸機會？還是族群競爭？本省閩南人族群意識內涵與地區差異模式之解釋〉，《臺灣社會學》4：11-74。
2003　《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
2005　〈由「中國省籍」到「臺灣族群」：戶口普查籍別類屬轉變之分析〉，《臺灣社會學》，第 9 期。

王東
1998　《客家學導論》。臺北：南天書局。

王重民編
1969　《太平天國官書十種》。臺北：華文書局。
2000　《太平天國》（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雯君
2005　〈客家邊界：客家意象的詮釋與重建〉，《東吳社會學報》18：117-156。

王瑛曾
1764　《重修鳳山縣志》，文叢第 146 種，1962 年重刊。

王德威、黃錦樹編鎮
2004　《原鄉人：族群的故事》。臺北：麥田。

世界丘氏宗親總會編
1987　《丘念臺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紀念特刊》。臺北：世界丘氏宗親總會。

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實錄編輯委員會編
1974　《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實錄》。臺北市：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實錄編輯委員會。

世界客屬總會編
1974-　《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實錄》。臺北：世界客屬總會。

世界新聞雜誌社編
1956-　《世界新聞》。臺北：世界新聞雜誌社。

丘念臺
1981　《我的奮鬥史》。臺北：中華日報社。

丘昌泰、蕭新煌主編
2007　《客家族群與在地社會：臺灣與全球的經驗》。臺北：智勝文化。

丘昌泰
2005　〈從「科學」與「學科」析論「客家學」的建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電子報》25。網址：http://140.115.170.1/Hakkacollege/big5/network/paper/paper25/40.html，2010 年 8 月 2 日檢索。

丘權政
1997　《客家與香港崇正總會》。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末成道男編
1999　《中原と周辺：人類学的フィルドからの視点》。東京都：風響社。

任育德
2008　《向下紮根：中國國民黨與臺灣地方政治的發展（1949-1960）。臺北：稻鄉

出版社。
朱文伯
1985 《朱文伯回憶錄》。臺北：民主潮社。
朱峰
2009 《基督教與海外華人的文化適應——近代東南亞華人移民社區的個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何炳棣
1966 《中國會館史論》。臺北：學生書局。
何義麟
〈媒介真實與歷史想像：解讀 1950 年代臺灣地方報紙〉，《臺灣史料研究》，第 24 期。
何壽康、葉脈、鍾偉光編
1968 《香港崇正總會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
何舉帆
1976 〈所謂省籍問題〉，《中央日報》，1979 年 6 月 5 日。
余偉雄等編
1979 《羅香林教授紀念集》。出版地不詳：羅香林教授紀念集編委會。
吳乃德
1996 〈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臺灣族群政治理論的初探〉，收入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臺北：業強出版社。
吳子光
《臺灣紀事》，文叢第 36 種，1959 年重刊。
吳克泰
2002 《吳克泰回憶錄》。臺北：人間出版社。
吳松弟
1997 《中國移民史 第四卷 遼宋金元時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吳密察、張炎憲
1993 《建立臺灣的國民國家》。臺北：前衛出版社。
吳福文
2004 〈客家與政治〉，《客家縱橫》39：48-53。2004 〈臺海兩岸有關客家活動的差異〉，《客家雜誌》163：16-25。
吳濁流
1977 《臺灣文藝與我》。臺北：遠行出版社。
1978 《亞細亞的孤兒》。臺北：遠行。
1980 《南京雜感》。臺北：遠景出版社。
1988 《臺灣連翹》。臺北：前衛出版社。
1989 《無花果：臺灣七十年的回想》。臺北：前衛出版社。
1991 《吳濁流集》。臺北：前衛出版社。
2000 《吳濁流致鍾肇政書簡》。臺北：九歌出版社。
宋學文、黎寶文

2006　〈臺灣客家運動之政策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8(3)：501-540。

巫範等編輯

1978　《三藩市崇正會金禧慶典世界客屬第四次懇親大會特刊》。美國三藩市：三藩市崇正會金禧慶典世界客屬第四次懇親大會特刊編輯委員會。

李文良

2003　〈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臺大歷史學報》，第 31 期。

李永熾

1995　〈客家人與臺灣政治〉，收入江文瑜主編，《人文社會主動出擊》，頁 357-360。臺北：前衛。

李亦園

1984　《東南亞華人社會研究》。臺北：正中書局。

李西勳

〈臺灣光復初期推行國語運動情形〉，《臺灣文獻》，第 46 卷第 3 期，頁 175-176。

李志剛

1994　〈香港客家教會（巴色會）之設立及其在廣東與北婆羅洲之傳播〉，收入《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社。

李效玲

1978　〈民間社會之研究：以臺北地區同鄉會組織為例〉。臺北：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逢蕊

1996　〈客家學潮與客家情潮〉，《客家雜誌》78：30-32。

2005　〈客家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客家縱橫》43：44-48。

李喬、許素蘭、劉慧真主編

2004　《客家文學精選集・小說卷》。臺北：天下文化。

李喬

2001　《文化、臺灣文化、新國家》。高雄：春暉出版社。

李道緝

〈建構「新祖國」——鄭彥棻時期（民國 39-47 年的僑務工作）〉。

李筱峰

2004　《臺灣全志卷首・戰後臺灣變遷史略》。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李廣均

1996　〈從過客到定居者——戰後臺灣「外省族群」形成與轉變的境況分析〉，《社會文化學報》3：367-390。

1999　〈什麼是族群身份？三種不同取徑的提出和討論〉，《中大社會文化學報》9：67-94。

李翼中

1953　《臺灣社政憶述》。臺北：清水商行印刷工廠。

李麗玲

1995　〈五〇年代國家文藝體制下臺籍作家的處境及其創作初探〉。新竹：清華大學

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福鐘、楊秀菁、薛化元編註
2002 《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八）新聞自由》。臺北：國史館。
汪彝定
1991 《走過關鍵年代：汪彝定回憶》。臺北：商周文化。
町田則文
1903 〈臺灣に於ける創業時代の教育（承前）——言語研究の創始（承前）〉，《臺灣協會會報》，第 53 期。
周元文
《重修臺灣府志》，文叢第 10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重刊。
周宗賢
1985 〈臺灣會館的研究〉，《淡江學報》24：237-252。1985 《血濃於水的會館》。臺北：行政院文建會。
周英雄、劉紀蕙主編
2001 《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臺北：麥田。
周振鶴、游汝杰
1986 《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
林吉洋
2007 〈「臺灣客家認同」與其承擔團體——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1990-1995）的發展與政治參與〉，臺灣客家研究學會、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等主辦，「臺灣客家運動 20 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 年 12 月 8、9 日，頁 1-31。
2007 〈敘事與行動：臺灣客家認同的形成〉。新竹：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秀幸
2001 〈臺灣北部客家地區民間社團組織與地方社會發展之關係〉，《臺灣文獻》52(4)：341-376。
林果顯
2005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立與轉變》。臺北：稻鄉。
2008 《文化、政治與時代：國家文化總會四十年》。臺北：國家文化總會。
林金樹主編
2005 《中華心・客家情——第一屆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吉隆坡：馬來西亞客家學研究會。
林信丞
2008 〈從客家雜誌分析臺灣客家形象之變遷〉。新竹：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彥亨
2003 〈客家意象之形塑：臺灣客家廣播的文化再現〉。新竹：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崇熙

2001　〈誰是客家人？作為一種意識型態的族群認同〉，「第一屆文化山海觀：文化資產維護研討會」論文。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

林達泉

〈客說〉，《林太僕文鈔》卷上，收於溫廷敬輯，《茶陽三家文鈔》。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重刊。

邱珮萱

2003　〈戰後臺灣散文中的原鄉書寫〉。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邱榮舉、謝欣如

2003/12　〈論臺灣客家人的社會與政治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馨築文教基金會主辦，「全球客家地域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雨青

1985　《客家人尋根：深具勸儉，團結之精神，而達其日後之成就》。臺北：武陵出版社。

客家雜誌社編

1987-　《客家雜誌》（前為《客家風雲》。臺北：客家雜誌社。

施正鋒

1998　《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臺北：前衛出版社。

2000　《臺灣人的民族認同》。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 年 8 月。

2004　《臺灣客家族群政治與政策》。臺北：翰蘆。

2006　《臺灣族群政治與政策》。臺北：翰蘆。

2007　〈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的客家運動〉，臺灣客家研究學會、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等主辦，「臺灣客家運動 20 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 年 12 月 8、9 日，頁 1-22。

施正鋒編

2007　《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臺北：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施振民

1985　〈菲律賓華人文化的持續——宗親與同鄉組織在海外的演變〉，收於《東南亞華人社會研究》。臺北：正中。

洪泉湖等

2005　《臺灣的多元文化》。臺北：五南。

2002　《百年來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臺北：東大圖書。

洪惠冠總編輯；蘇繼光等執行編輯

1998　《一位令人感念的將軍：蘇紹文》。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胡慧玲

1995　《島嶼愛戀》。臺北：玉山社。

范振乾

2002　《存在才有希望——臺灣族群生態客家篇》。臺北：前衛出版社。

范雅梅

2005　〈「代理」的祖國？從在地知識與冷戰結構論國民黨與僑務政策（1949-1990）〉，「臺灣社會學會年會暨研討會：社會學與臺灣社會的反思」，

臺北：臺灣社會學會，2005 年 11 月 19 日。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
1994 《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臺北：月旦出版社。
香港崇正總會
1921 《崇正同人系譜》。香港：香港崇正總會編印，1995 年重刊。
1950 《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
1995 《香港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
香坂順一
《廣東語の研究》。臺北：古亭書屋，1974 年重刊。
倪炎元
2003 《再現的政治：臺灣報紙媒體對「他者」建構的論述分析》。臺北：韋柏文化國際。
唐立宗
2002 〈敬恭桑梓：近代廣東志書的編纂活動與「客家」途述〉，「第二屆客家研究研究生論文研討會」，頁 83-118。
2005 〈清代廣東方志的「客民」、「客匪」與「客家」論述〉，「第四屆青年學者論壇」，北京，頁 93-107。
徐正光、宋文里編
1996 《臺灣新興社會運動》。臺北：巨流。
徐正光、彭欽清、羅肇錦主編
1994 《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徐正光、蕭新煌主編
1996 《臺灣的國家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
徐正光
1994 〈臺灣的族群關係——以客家人為主體的探討〉，收於行政院客委會策劃主辦、客家雜誌社協辦，《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頁 381-399。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7 《臺灣客家研究概論》。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徐正光召集
2002 《臺灣客家族群史——社會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徐正光編
1991 《徘徊於族群和現實之間》。臺北：正中書局。
2000 《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歷史與社會經濟》。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0 《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聚落、宗族與族群關係》。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徐智德
2004 〈從政治過程論的觀點探討臺灣客家運動〉。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煥堂

1994　〈廣播客語節目的現況與發展〉，刊於《客家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珠海文史研究所學會主編

1992　《羅香林教授紀念論文集》。臺北：新文豐。

秦孝儀

1985　《中華民國社會發展史》。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荊子馨著，鄭力軒譯

2006　《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

高怡萍

2000　〈客家族群意識與歷史的文化建構——客家社區在原鄉與移民地之比較研究〉，《客家文化研究通訊》3：50-72。

高格孚

2004　《風和日暖：外省人與國家認同轉變》。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涂春景

1994　〈臺灣客家期刊的過去與未來〉，收於鍾肇政、徐正光，《客家文化論叢》（臺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1994 年 10 月），頁 81-98。

參謀本部

1895　《臺灣誌》。東京：八尾書店。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

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

國史館藏，《個人史料》。

寄寰

1973　〈客家人〉，《中央日報》，1973 年 10 月 12 日，版 10。

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

1971　《香港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

張侃

2004　〈從社會資本到族群意識：以胡文虎與客家運動為例〉，《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 年(1)：73-77。

張昆山、黃政雄主編

1996　《地方派系與臺灣政治》。臺北：聯合報社。

張炎憲

1996　《臺灣史論文精選》（上）。臺北：玉山社。

張炎憲主編

2008　《二二八事件辭典》。臺北：國史館。

張柏仲

1997　〈外省族群的社會心理分析：族群觀點、我群認同與社會距離〉。臺北：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碩士論文。

張茂桂主編

2010　《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臺北：群學出版社。

張茂桂等著

1996　《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臺北：業強出版社。

張英明、周璐

2005　〈西方學者早期對客家與太平天國關係之研究〉，《廣東教育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6 期。

張容嘉

2008　〈閑聊（Gossip）中客家常民的歷史意識〉。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泰祥主編

1961　《中華民國五十年來民眾團體》。臺北：中華民國民眾團體活動中心。

張強

〈客家文化傳揚者——謝樹新先生〉，《苗栗文獻》，第 8 期。

張博宇編

1974　《臺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張嘉文

2004　〈客家傳統山歌三大調在花蓮地區的傳承與現況〉。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維安、徐正光、羅烈師主編

2008　《多元族群與客家：臺灣客家運動 20 年》。新竹：臺灣客家研究學會。

張維安

2010　〈族群記憶與臺灣客家意識的形成〉，收入莊英章、簡美玲主編，《客家的形成與變遷》（下）。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張衛東、劉麗川

1989　〈論客家研究的幾個基本問題〉，收入張衛東、王洪友主編，《客家研究》，頁 94-118。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梅家玲

2010　〈戰後初期臺灣的國語運動與語文教育——以魏建功與臺灣大學的國語文教育為中心〉，《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7 期。

莊初升、劉鎮發

2002　〈巴色會傳教士與客家方言研究〉，《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3 卷第 7 期，頁 1-8。

莊英章、簡美玲主編

2010　《客家的形成與變遷》（下）。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莊英章

1998/10　〈客家研究的人類學回顧〉，《客家文化研究通訊》創刊號：22-29。2003/12〈客家研究之我見〉，《客家文化研究通訊》6：33-40。

2004　《田野與書齋之間》。臺北：允晨。

莊澤宣

1979　〈中國同鄉團體的研究〉，《嶺南學報》6(4)。

許馨文

2011　〈戰後臺灣客家音樂的建制化歷程：以《中原（苗友）》月刊（1962-1981）

的再現為例〉，《民俗曲藝》，第 171 期，頁 121-179。

郭雅瑜

2000 〈歷史記憶與社群建構——以鹿港郭姓為例〉。新竹：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郭壽華

1964 《客族源流新志——客家精神及文獻》。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陳支平

1998 《客家源流新論：誰是客家人》。臺北：臺原出版社。

1999/06 〈大陸客家研究的功利與學術趨向〉，《客家文化研究通訊》2：108-116。

2001 《福建六大民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陳支平主編

2006 《邊際族群：遠離帝國庇佑的客人》。合肥：黃山書社。

陳世松、劉義章

2006 〈劇烈社會變動下都市客家文化走向探討——以成都沙河客家為中心兼與香港客家作對比考察〉，發表於中央大學客家學院主辦，「族群、歷史與文化亞洲聯合論壇：人物與地域研究」研討會。

陳世松

2007 〈中國近代以來學術建構對客家研究的影響——以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為例〉，《社會科學研究》，2007 年第 6 期。

陳石山

1997 〈客家社團的凝聚與衝突〉，收於《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陳佳慧

2008 〈臺灣地方派系與宗親會互動關係之研究-桃園縣個案分析〉。高雄：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明通、朱雲漢

1992 《區域性聯合獨佔經濟、地方派系與省議員選舉：一項省議員候選人背景資料分析》。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會刊。

陳明通

1998 《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臺北：月旦。

陳奕麟著，中谷春譯

1993 〈國民の創造から想像の國民——戰後臺灣の的未完成の革命〉,《思想》823：108-126。

陳春聲

2004/01 〈兩岸客家社會與文化環境的若干差異〉，《客家雜誌》163：26-27。

2007 〈地域社會史研究中的族群問題——以「潮州人」與「客家人」的分界為例〉，《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3 卷第 2 期。

陳香如

2006 〈多元文化主義實踐的考察：臺灣本土化潮流下的客家運動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國家事務與管理碩專班碩士論文。

陳康宏
1998/03 〈臺灣客家社團的概況研究（上）〉，《客家雜誌》93：11-16。
1998/04 〈臺灣客家社團的概況研究（下）〉，《客家雜誌》94：50-52。
2004 〈被遺忘的客家人——臺灣外省客家人及其社團〉，《客家縱橫》37：37-39。
陳紹英
2005 《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臺北：玉山社。
陳雪玉
2002 〈桃園閩客族群與地方政治關係的歷史探討（1950-1996）〉。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智勇
2003 《中國古代社會治安管理史》。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
陳逸君
1998 〈眾裡尋「客」千百度——一個需要重新書寫臺灣族群史的時代〉，「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臺北：中研院民族所，1998 年 11 月 4-7 日。
1998 〈眾裡尋「客」千百度——一個需要重新書寫臺灣族群史的時代〉，收入陳逸君主編，《臺灣客家關係書目與摘要〔專書、論文、研究報告類〕》。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陳萬益主編
2004 《八十大壽紀念文集（下）大河之歌——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桃園縣政府。
陳運棟
1988 《客家人》。臺北：東門。
1998/06 〈五十年來的臺灣客家研究〉，《臺灣文獻》49(2)：171-189。
1998 《臺灣的客家人》。臺北：臺原出版社。
陳翠蓮
1995 《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臺北：時報文化。2008 《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臺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遠流。
2008 〈想像與真實：臺灣人的祖國印象〉，收入許雪姬編，《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上冊，頁 167-220。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章英華
2005 〈臺灣民眾的文化取向：兼論臺灣的族群關係〉，收入喬健等主編，《文化、族群與社會的反思：第八屆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麗文文化。
傅仰止
1995 〈臺灣族群的意象與位階：比較他群與我群〉，《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78。
彭芊琪
〈臺灣擂茶興起的過程及省思〉，頁 177-197，《第四屆「客家研究」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彭芊琪

2005　〈外省客家人的本土化：以廣東陸豐莊氏宗親會為例〉。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彭阿木

1930/1　〈客家に就いての研究〉，《支那研究》，第 22 號，頁 77-183。

1930/7　〈客家に就いての研究（續）〉，《支那研究》，第 23 號，頁 113-217。

彭素枝

2003　《臺灣六堆客家山歌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

彭欽清

2002　〈臺灣客家社團之發展〉，收於徐正光等，《臺灣客家族群史・社會篇》，頁 118-184。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曾少聰

2004　《漂泊與根植：當代東南亞華人族群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曾金玉

2000　〈臺灣客家運動之研究（1987-2000）〉。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瑞媛

1993　〈桃竹苗客家童謠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運乾、朱希祖

1933　〈審查客方言報告書〉，《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 1 卷第 4 期。

湯熙勇

2005　〈脫離困境：戰後初期海南島之臺灣人的返臺〉，《臺灣史研究》，第 12 卷 2 期，頁 167-208。

湯錦臺

2010　《千年客家》。臺北：如果出版社。

程美寶

2006　《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華田

1967　〈「客家」考〉，《中央日報》，1967 年 5 月 20 日，版 10。

鈕司週刊社編

1949-　《鈕司》。臺北：鈕司週刊社。

飯島典子

2007　《近代客家社會の形成：「他称」と「自称」のはざまで》。東京都：風響社。

黃一民

2005　〈文化與商品：擂茶的社會學考察〉。臺北：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黃宇和

2004　《兩廣總督葉名琛》（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年）。

黃秀政、李昭容、郭佳玲

2007　〈羅香林與客家研究〉，《興大歷史學報》，第 18 期（2007 年 6 月），頁 291-314。

黃育嵐

2008 〈東部客家？花蓮玉里二個客家社區的族群關係與認同之研究〉。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辰濤

2009 〈爭取海外力量：中華民國外交、僑務、黨務在新馬的運作（1945-1957）〉。南投：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宣範

2001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臺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臺北：文鶴，2001。

黃釗

1970 《石窟一徵》。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882 年原刊。

新勒力

〈推行國語運動址人歧途（一）〉（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十日對行政院長之質詢），第 22 卷第 3 期，頁 11-12。

新聞天地社編

1945- 《新聞天地》。香港：新聞天地社。

楊日超主編

1971 《香港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出版部。

楊長鎮

〈民族工程學中的客家論述〉，網址：http://taup.yam.org.tw/PEOPLE/961116-3.htm；檢索日期：2010 年 8 月 2 日。

1993 〈羅香林的客家描述——重建臺灣客家論述的一個起點〉，收於《臺灣客家人新論》，頁 85-89。臺北：臺原。

1994 〈在民族國家邊緣——臺灣反對運動中的「客家意識」問題〉，收於《客家文化研討會》。臺北：客家雜誌社。

2006 〈認同的辨證——從客家運動的兩條路線談起〉，收於施正鋒編，《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臺北：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楊國鑫

2005 〈現階段客家學的定位：從方法論的角度探討〉，《思與言》43(2)：11-41。

2007 〈臺灣的客家問題、客家運動與客家學〉，臺灣客家研究學會、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等主辦，「臺灣客家運動 20 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 年 12 月 8、9 日，頁 1-38。

楊照

1995 《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文學史散論》。臺北：聯合文學。

楊聰榮

1992 〈文化建構與國民認同：戰後臺灣的中國化〉。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4 〈從族群關係史看臺灣客家的分類範疇與獨特性〉，發表於「臺灣史學客家研究研討會」，2004 年 5 月 26 日。

溫仲和

1898 《嘉應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年重刊。

溫秀雲

1962　〈客家人〉，《徵信新聞報》，1962 年 8 月 3 日，版 7。

葉日嘉

2006　〈兩岸客家研究與客家社團之政治分析——以「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為中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蓉

1978　〈臺北市宗親組織的研究——由傳統的宗法到現代的宗親會〉。臺北：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葛永光

1991　《文化多元與國家整合——兼論中國認同的形成與挑戰》。臺北：正中。

詹素娟

2005　〈臺灣平埔族的身分認定與變遷（1895-1960）——以戶口制度與國勢調查的「種族」分類為中心〉，《臺灣史研究》，第 12 卷第 2 期。

廖赤陽

2007　〈日本有關客家問題的研究與著述：漢族觀、中國觀、華僑觀與亞洲觀交錯的譜系〉，收入丘昌泰、蕭新煌主編，《客家族群與在地社會：臺灣與全球的經驗》，頁 437-459。臺北：智勝文化。

廖忠俊

1998　《臺灣地方派系的形成發展與質變》。臺北：允晨文化。

2000　《臺灣地方派系及其主要領導人物》。臺北：允晨文化。

廖炳惠等編著

2004　《「重建想像共同體——國家、族群、敘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巨流。

臺北市大埔同鄉會

1964-　《大埔會訊》。臺北：臺北市大埔同鄉會。

臺北市五華同鄉會編

1977　《臺北市蕉嶺同鄉會二二週年特刊》。臺北：臺北市五華同鄉會。

臺北市梅縣同鄉會

1987-　《臺北市梅縣同鄉會會刊》。臺北：臺北市梅縣同鄉會。

臺北市惠州同鄉會會刊編輯委員會編

1985-　《臺北市惠州同鄉會會刊》。臺北：臺北市惠州同鄉會。

臺北市嘉應五屬同鄉會編

1986-1998　《嘉應五屬年刊》。臺北：臺北市嘉應五屬同鄉會。

臺北市福建長汀同鄉會編

1974-　《長汀文獻》。臺北：臺北市福建長汀同鄉會。

臺北市興寧同鄉會會刊編輯委員會

1985-　《臺北市興寧同鄉會會刊》。臺北：臺北市興寧同鄉會。

臺灣事務局

1898　《臺灣事情一班》，下卷。臺北：臺灣事務局。

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編

1991　《新个客家人》。臺北：臺原。

1993　《臺灣客家人新論》。臺北：臺原。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59　《安平縣雜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52 種（以下簡稱文叢）。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895 年原刊。

1960　《福建通志臺灣府》，文叢第 8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1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文叢第 10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編

1905　《戶口調查用語》。臺北：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收於六角恒廣編，《中國語教本類集成第十集第一卷》。東京：不二出版，1998 年。

趙春晨、雷雨田、何大進

2002　《基督教與近代嶺南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劉文斌

1993　〈臺灣國家認同變遷下的兩岸關係〉。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劉其英、劉其瑗編

1975　《劉兼善先生八秩大慶祝壽冊》。出版地不詳：劉其英、劉其瑗。

劉秋美

1997　〈旅日客家人之社會適應研究：以關西崇正會為例〉。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惠玲

2005　〈臺灣客家文化運動與族群建構之研究〉。臺北：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劉義章主編

2005　《香港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廣東同鄉會

1971-　《廣東文獻》。臺北：廣東同鄉會。

蔣炳釗

1994　〈試論客家的形成及其與畲族的關係〉，收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蔡明惠

1998　《臺灣鄉鎮派系與政治變遷：河口鎮「山頂」與「街仔」的鬥爭》。臺北：洪葉文化。

蔡明賢

2009　〈戰後臺灣的語言政策（1945-2008）——從國語運動到母語運動〉。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蔡芳玲

1997　〈一九四九年前後遷臺作家之研究〉。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淑玲

1998　〈社會地位取得：山地、閩客及外省之比較〉，收於楊國樞、瞿海源編，《變遷中的臺灣社會》。臺北：中研院民族所。

鄭天澤主持
2002 《全國客家社團基礎資料調查與登錄研究》。臺北：行政院客委會委託研究案。
鄭赤琰編
1994 《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鄭明娳主編
1994 《當代臺灣政治文學論》。臺北：時報文化。
鄭榮興
2004 《臺灣客家音樂》。臺北：晨星。
鄧迅之
1982 《客家源流研究》（臺中：天明出版社，1982 年 5 月）。
橋本萬太郎編
1983 《漢民族と中國社會》。東京都：山川出版社。
盧建榮
1999 《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臺北：麥田。
蕭高彥、蘇文流主編
1998 《多元主義》。臺北：中研院社科所。
蕭新煌、黃世明
2000 〈臺灣地方社會與客家政治力：客家族群派系的類型、發展及限制〉，收錄於徐正光編，《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歷史與社會經濟》。臺北：中研院民族所。
2001 《臺灣客家族群史（政治篇上下）》。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蕭新煌
2002 《臺灣社會文化典範的轉移》。臺北：立緒出版社。
賴秀真
1994 〈臺灣都市型地方派系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
賴碧霞編著
1993 《臺灣客家民謠薪傳》。臺北：樂韻。
賴際熙主編
1995 《崇正同人系譜》。香港：香港崇正總會。
賴澤涵編
1993 《臺灣光復初期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戴國煇
1983 〈中国人にとっての中原と辺境〉，收入橋本萬太郎編，《漢民族と中国社会》（東京都：山川出版社，1983），頁 407。
1999 《臺灣史探微：現實與史實的相互往還》。臺北：遠流、南天書局。
2002 《臺灣史研究集外集》。臺北：遠流、南天書局。
2002 《臺灣史對話錄》。臺北：遠流、南天書局。
2002 《臺灣近百年史的曲折路——「寧靜革命」的來龍去脈》。臺北：遠流、南天書局。
2002 《臺灣史探微——現實與史實的相互往還》。臺北：遠流、南天。

2011 《史學與臺灣研究》，戴國煇全集 9。臺北：遠流。

戴國煇編

1991 《もっと知りたい華僑》。東京都：弘文堂。

薛雲峰

2009 〈臺灣客家史觀：以義民與 1895 乙未抗日戰爭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年 7 月）。

謝文華

2002 〈客家母語運動的語藝歷程（1987-2001）。臺北：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世忠

1997 〈族內異觀與類種族主義的族群關係：三種界定臺灣漢人主體族群的論述〉，黃應貴、葉春榮主編,《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王崧興先生紀念論文集》，頁 205-234。臺北：中研院民族所。

謝新樹主編

1965 《中原文化叢書》，第 1-7 集。苗栗：苗友中原雜誌社。

謝劍

2002 〈為有源頭活水來：客家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賴澤涵編，《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9。臺北：行政院客委會。

鍾壬壽

1973 《六堆客家鄉土志》。屏東：常青出版社。

鍾怡雯

2001 《亞洲華文散文的中國圖象（1949-1999）》。臺北：萬卷樓出版。

鍾皓如

2004 〈論電視新聞中客家「義民」之建構〉。臺南：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肇政、徐正光編

1994 《客家文化論叢》。臺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鍾肇政

1993 《原鄉人：作家鍾理和的故事》。高雄：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

1999 《肝胆相照：鍾肇政、張良澤往返書信集》。臺北：前衛。

2001 《書簡集》。桃園：桃園縣文化局。

2004 《八十大壽紀念文集》。桃園：桃園縣文化局。

2004 《年表、補遺、演講大綱》。桃園：桃園縣文化局。

2004 《臺灣客家族群史・總論》。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鍾肇政主編

1994 《客家臺灣文學選》。臺北：新地文學出版社。

鍾艷攸

1999 《政治性移民的互助組織（1946-1995）——臺北市之外省同鄉會》。臺北：稻鄉

檳榔嶼客屬公會四十週年紀念刊編輯委員會編

1979　《檳榔嶼客屬公會四十週年紀念刊》。馬來西亞：檳榔嶼客屬公會。

藍清水

2011　〈被遺忘的外省客家移民——戰後河婆客的集體記憶與認同之分析〉。桃園：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藍博洲

2003　《紅色客家人》。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藍鼎元

《平臺紀略》，文叢第 14 種，1958 年重刊。

魏永竹主編

1992　《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瀨川昌久

〈客家アイディティ—形成過程の研究——中華民國初期の著名政治家・軍人の出自をめぐる議論を中心に〉，《東北アジア研究》，第 9 號，頁 1-33。

羅志飛

《七十回憶錄》。出版資料不詳。

羅卓英將軍紀念編輯委員會編

1971　《羅卓英將軍紀念集》。臺北：羅卓英將軍紀念編輯委員會。

羅香林

1965　《乙堂文存》。香港：中國學社。

1992　《客家史料匯篇》。臺北：南天書局。

1992　《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書局，1933 年原刊。

羅香林編

1950　《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

羅烈師

2001　〈朝向「結構與原動力」的客家研究新典範——讀勞格文等編《客家傳統社會叢書》〉，《客家文化研究通訊》4：102-116。

2007　〈客家研究之反思：學術與運動的雙重觀點〉，「城流鄉動：2007 文化研究協會年會」論文。臺北：臺大城鄉研究所。

羅敬之

1995　《羅香林先生年譜》。臺北：國立編譯館。

羅肇錦

2003　〈客語祖源的非中原現象〉，收於《中國語文學研究會國際學術大會論文集》，頁 175-192。首爾：延世大學。

羅鏑樓

1995　《羅卓英先生年譜》。臺北：羅偉郎。

羅翹雲

《客方言》。臺北：古亭書屋，1972 年重刊。

譚樹林

2010　〈近代來華基督教傳教士與客家源流研究——以歐德禮、畢安、肯比爾為中心〉，收入特木勒編，《多元族群與中西文化交流——基於中西文獻的新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178-193。

嚴忠明

2004 〈「豐湖雜記」與客家民系形成的標誌問題〉，《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 25 卷第 9 期，頁 36-39。

竇季良

1946 《同鄉組織之研究》。上海：正中書局。

蘇裕玲

1995 〈族群社區與族群書寫——當代臺灣客家意識展現的兩個面向〉。臺北：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饒偉新

2005 〈區域社會史視野下的「客家」稱謂由來考論——以清代以來贛南的「客佃」、「客籍」與「客家」為例〉，《民族研究》，2005 年第 6 期。

龔宜君

1998 《「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1950-1968）》。臺北：稻鄉出版社。